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Military Academic Work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Military Academic Work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战略学

战 略 学

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战略学

(2013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80237-650-2



9 787802 376502 >

定价:37.00元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当代价值》
- 《创新发展的军事指导理论》
- 《世界军事革命史》（上、中、下卷）
- 《战略指挥论纲》
- 《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
- 《朝鲜半岛危机管理研究》
- 《台海危机管理研究》
- 《台湾意识与台湾战略思维》
- 《作战力量建设概论》
-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概论》
- 《军队后勤宏观管理机制论》
- 《军队政治工作学》
- 《兵役学》
- 《军事管理学》
- 《新编军事运筹学》
- 《作战建模与仿真》
- 《国防后勤学》
- 《军事装备保障学》
- 《联勤概论》
- 《司令部工作与建设新论》
- 《国防经济学》
- 《冷战后外国新军事思想研究》
- 《印度军事思想》
- 《美军未来后勤概念》
- 《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概论》
- 《控局》
- 《国防建设资源配置制度研究》
- 《战略学》（2013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Military Academic Work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战 略 学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

(2013年版)

© 军事科学出版社

战

略

学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科学院·军事理论著作

战略学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学/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80237 - 650 - 2
I. ①战… II. ①军… III. ①军事战略—战略学
IV. ①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653 号

书 名: 战略学

作 者: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责任编辑: 孙兆利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650 - 2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37.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hs.com>

电子邮箱: jskxch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战略学》编写组

主 编:寿晓松

编写人员:寿晓松 皮明勇 邓红洲 常 伟
谢朝辉 赵德喜 潘友木 张忠良
周新胜 贺宏礼 温 冰 王桂芳
熊玉祥 鲍 斌 肖敬民 于 森
王兴旺 王新俊 师小芹 黄迎旭
袁德金 钟少异 魏 鸿 郭志刚
于淑杰 赵晓卓 江新风 丁 皓
刘 琳 彭征明 程晓春 王明亮
王鸿章 岳贵云 柴军健

前 言

《战略学》是我院长期坚持打造的学术品牌,无论是1987年版还是2001年版,都在军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新版《战略学》既以前两版《战略学》为基础,又不拘泥于前两版《战略学》的体例内容,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是紧紧抓住新世纪新阶段关系我军建设和运用的重大战略问题,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大力推进战略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的指示精神,突出军事战略这一主题,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战略指导,以及和平时军事力量运用问题,力求系统总结和创新军事战略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新的军事实践。

全书在基本架构设计上注重体现三大特色:第一,按照一般学科理论专著的基本要素构成,建构战略的基本理论,保持理论体系框架的相对完整性;第二,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使之具有战略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能够从理论上阐释与解答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战略指导方面的重大问题;第三,突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战略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学术主线。

全书约24万字,按战略基本理论→战略形势判断→战略思想创新发展→军事力量运用战略筹划→军事力量建设战略筹划的内在逻辑,分为基本理论、形势分析、力量运用、力量建设等四大部分内容。全书共12章:第一章,战略;第二章,战略之演进;第三章,中国的战略环境与军队历史使命;第四章,当代战争的发展与我国可能面临的战争;第五章,丰富与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第六章,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第七章,军事威慑行动的战略指导;第八章,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第九章,核、天、网领域军事斗争;第十章,

军种战略和战区战略;第十一章,战略空间和布局;第十二章,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与我院前两版《战略学》相比,新版《战略学》适应世情国情军情的发展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板块,比如: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战略筹划与指导;核、天、网重大领域军事斗争的战略筹划与指导;军种战略与战区战略;战略空间与战略布局;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建设的筹划与指导;等等。

新版《战略学》注重以“论”带“学”,努力适应我国战略形势、我军使命任务、战争形态的新发展新要求,围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实现强国强军的战略目标,紧紧抓住关系当前和未来我军建设和运用的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研究和筹划,力争成为融时代性、针对性、创新性于一体的战略理论著述。主要学术创新点和突破点如下:

1. 在梳理传统的战略概念基础上,提出战略是对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筹划指导,明确战略需以筹划和指导未来战争为指向重点解决的10个方面的问题,提出我国战略体系应由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战区战略、重大安全领域(核、太空、网络空间)战略三级五类构成。

2. 系统梳理了我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丰富发展历程,概括提出了几十年来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精神,同时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俄、日、印等国军事战略的发展及其最新动向和特点。

3. 从政治和技术两个角度论述了今后10~20年战争形态的可能发展,概括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战争7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并对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可能面临的战争威胁进行了总体判断。

4. 着眼丰富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时代内涵,从实行前沿防卫、突出有效控制、坚持多样运用3个方面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战略指导问题。

5. 系统阐述了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军事威慑、非战争军事行动、核天网军事斗争的战略筹划与指导问题,突出了在相对和平时期

军事力量运用的筹划,进一步拓宽了军事战略视野和军事力量战略运用的范围。

6. 从建设和运用两大基本方面论述了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战略的基本问题,对军种未来建设和运用的方向提出了战略性思考;对战区战略的主要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7. 提出依托本土适度向外拓展军事行动的战略空间,拓展积极防御战略纵深,瞄准打赢未来战争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需要,由国土防御型战略布局向信息化条件下的前沿防卫型战略布局转变等重要问题。

8. 从全局高度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战略筹划,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取向、建设原则、结构和功能特征以及建设途径,体现了实现强军目标的重大战略思想。

新版《战略学》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的战略研究成果,进行了创新性理论升华,在战略基本理论研究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思想深度,有视野广度,有理论辨识度,风格简约、文风朴实、特色突出。新版《战略学》的出版,对于全军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关于强国强军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战略研究,发挥战略学在军事科学体系中的龙头作用,推进军事战略基础理论的发展,加强现实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将产生应有的学术效益和积极作用。

《战略学》编写组

2013年9月24日



目 录

第一章 战 略	(1)
第一节 什么是战略	(1)
第二节 战略的构成	(5)
第三节 战略的特性	(8)
第四节 影响战略的重要因素	(13)
第五节 战略的制定	(20)
第二章 战略之演进	(28)
第一节 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	(28)
第二节 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41)
第三节 当代世界大国军事战略	(50)
第三章 中国的战略环境与军队历史使命	(69)
第一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	(69)
第二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74)
第三节 全面履行军队历史使命	(81)
第四章 当代战争的发展与我国可能面临的战争	(87)
第一节 当代战争发展的主要动因	(87)
第二节 当代战争的基本特点	(93)
第三节 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	(98)
第五章 丰富与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103)
第一节 实行前沿防卫	(103)

第二节	突出有效控制	(109)
第三节	坚持多样运用	(116)
第六章	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	(122)
第一节	严控战争目的	(122)
第二节	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	(124)
第三节	坚持非对称作战	(127)
第四节	夺取战争主动权	(129)
第五节	妥善结束战争	(132)
第七章	军事威慑行动的战略指导	(134)
(1) 第一节	当代军事威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134)
(1) 第二节	我军军事威慑体系建设	(140)
(2) 第三节	军事威慑的战略指导思想 and 原则	(149)
第八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	(154)
(1)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154)
(1)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类型和特点	(161)
(2) 第三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原则	(166)
第九章	核、天、网领域军事斗争	(169)
(1) 第一节	核领域军事斗争	(169)
(1) 第二节	空间领域军事斗争	(178)
(2) 第三节	网络领域军事斗争	(188)
第十章	军种战略和战区战略	(198)
(1) 第一节	陆军战略	(198)
(1) 第二节	海军战略	(206)
(1) 第三节	空军战略	(218)
(1) 第四节	第二炮兵战略	(228)
(2) 第五节	战区战略	(236)
第十一章	战略空间和布局	(241)
(1) 第一节	战略空间的时代特性	(241)
(2) 第二节	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	(244)

第一章

战 略

第一节 什么是战略

战略源于战争,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战略概念在对战争指导的全面深入认识中形成、丰富和发展。

战略思想及相关著述先于战略概念的产生。历史上很早就有对战争的整体筹划,有众多关于战争的理论著述,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战略思想。中国的战略思想源远流长。产生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这部流芳千古的兵书,集中国古代兵学大成,在筹划和指导战争方面就有“庙算”“先胜”等概念。“战略”一词最早见于3世纪末晋代司马彪所著的《战略》一书。在外国,“战略”一词可溯源至古希腊语的“诡计”或“将略”。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毛莱斯著有军事教科书 *strategicon*,用的就是“将略”这个概念,主要是指“统帅艺术”,作为“作战谋略”来使用。在古代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尚未将战略和战略、战略和战术明确区分开来。

18~19世纪,随着战争物质基础的变化和军事行动规模的扩大,以及对战争认识的深化,人们对战略和战术进行了明确区分,战略的内涵从战斗范畴扩展到战争全局范畴,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概念随之产生。18世纪,普鲁士的比洛提出,“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19世纪,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提出,“战略是为了达成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瑞士的若米尼提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

术”。这都反映了当时对战略概念新的认识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飞机、军舰、坦克等现代武器的广泛应用,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机械化战争的战略理论趋于成熟,比如英国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意大利杜黑的“制空权”论、德国的“闪击战”理论、苏联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等。世界大战的实践深刻揭示了武装斗争对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后方保障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的规律。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首倡“大战略”的观念,富勒撰写了《战争指导》,德国的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理论,法国的博弗尔创造了“总体战略”的概念,对战争的指导和筹划明显超出了单纯军事领域,更加突出国家整体力量的运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战争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们认识战争的视野进一步拓展,战略概念外延扩大,战略体系更加完善。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给军事战略下的定义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各项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强调运用武力不只是为了达到战争胜利的目标,而且是为了最终达成国家战略目标。1972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再版的《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辞典》中,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的定义,从而明确把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区别开来。俄总参军事学院的战略教程认为,军事战略是“军事艺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是关于现代战争性质和以军事手段防止战争的途径、关于国家和武装力量对于抗击侵略的准备、关于进行整个战争和战略规模军事行动的方法和样式的一整套科学知识体系,也是国家领导和最高军事领导在防止战争、使国家和武装力量做好战争准备并在实施军事行动时领导其抗击进攻和粉碎入侵者的实践活动领域”^①。这一概念较之苏联的战略概念,增加了防止战争的内容。在和平与发展的时

^① А. С. Сквозлов, Курсы по вое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ГШ ВС РФ, М., 1995.

代,战略概念也被其他领域广泛借用,突出强调其对本领域“全局、高层、长远的筹划和指导”作用,如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战略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指导下,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战略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采用了“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概念,明确提出了“战略学”和“战略问题”等概念,指出战略学的任务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战略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

战略是军事学术的最高部门,是研究整个武装斗争的领导和进行战争的方法。(1956年《军语划一》)

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197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85年《战略学教程》)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1987年军事科学院《战略学》)

战略亦称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战略亦称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1999年国防大学《战略学》)

我国新时期的战略(即军事战略)是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导,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建设与运用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而对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全局、全过程的运筹与指导。(2001年军事科学院《战略学》)

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及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略。(2005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总领条和门类领条分册)

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及军事斗争全局的方略。简称战略。(2007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军事战略分册)

战略:①军事战略的简称。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分为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②泛指关于全局性、高层次、长远的重大

问题的方针和策略。如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时代特点、战略环境、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战略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战略的核心内涵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始终是围绕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建设和使用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量,筹划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全局的方略。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有了新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牵引的新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变,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斗争的关联日益紧密。党和人民赋予军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军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能够在各种复杂形势下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军事实践的发展,对战略的内涵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拓展。基于此,战略的概念应当界定为:对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筹划指导。或者说,战略是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策略。

尽管战略的概念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拓展,但其本质始终是“战之方略”,核心任务是研究未来战争,筹划和指导战争。战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研究战争的条件和性质,把握战争的特点和指导原则;判断战略形势,评估战略威胁、战略对手和主要作战对象,研究敌人的作战形式和方法;明确战略空间,划分战略方向,确定战略布局;确立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主要作战形式和方法;明确各军种、战区的基本军事任务和运用原则;明确战争保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明确战略领导和指挥的原则和方式;明确军事威慑的指导原则和运用方式;明确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和运用方式;明确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重点、路径、指导思想和原则。

我们把研究战略学问的科学称为战略学。作为军事科学的重要学科之一,战略学亦称军事战略学。它是研究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

全局性问题及其规律的学科。战略学是战略理论体系的集中反映。战略理论产生于战略实践,战略学随着战争及其他军事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国家和军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战略学理论体系。

战略学的理论构成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战略基础理论和战略应用理论。战略基础理论是战略学最基本的知识,是战略这门学科构建的基础,内容相对稳定,具有较为普遍的指导意义。战略应用理论则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指向,是一定时间和空间或特定条件下关于战争准备与实施、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国防建设与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它受战略基础理论特别是本国传统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也影响着战略基础理论的发展。

战略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战略的内涵及特性,认识影响战略的主要因素,总结以往战略实践的经验教训,把握不同时期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规律,为筹划与指导战略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构建适应时代特点的战略理论是我军战略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二节 战略的构成

一、战略的构成要素

关于战略的构成要素,由于概括的角度不同,有多种提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战略由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军事实力构成;战略由战略目的和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手段构成;战略由战略目的、战略方针、战略力量、战略原则、战略措施构成;等等。从战略的特性和功能来看,战略目标、战略指导、战略手段这三个要素在任何一种战略中都不可或缺,是构成战略的基本成分。

战略目标,是国家(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赋予武装力

量的基本任务,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方向和重点。应依据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着眼国家安全和利益需求,立足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能力水平,确定一定时期内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一旦制定就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成为确定战略指导、建设战略能力的基本依据。

战略指导,是围绕实现战略目标对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的筹划、领导和指挥,是战略行动的基本准则。战略指导的基本内容,包括明确战略指导思想、确立战略指导原则、制订战略规划计划、指导战略实施。战略指导贯穿于战略行动的全过程,关乎战争全局,决定战争成败。战略指导要统揽全局,注重坚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从战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战略指导的能动作用,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

战略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物质力量及其运用方式。这种力量是以武装力量为主,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在内的综合力量,其表现形式既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力量运用的基本方式,包括战争行动、军事威慑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一切战略目标,只有通过有效的战略手段,才能得以实现。科学的战略筹划和指导,需要以现实的战略手段为基础,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战略手段的可能发展。

战略的三个要素共同构成战略的基本框架,战略目标主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战略指导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战略手段主要解决“用什么做”的问题。

二、战略的体系

战略体系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战略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可以按层次划分为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军种(战区)战略。从军事战略的体系上,可以按类型划分为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也可以按领域划分为核战略、

太空战略、海上战略、网络空间战略等。

世界大国战略体系的基本构成大体一致,但其体系划分各有特点。美国的战略体系由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等构成。俄罗斯的战略体系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英国的战略体系包括大战略(或高级战略)和军事战略。日本战略体系包括国家战略(或国家政策)、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和军事战略三个层次。

我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明确划分战略层次,明确制定的只有军事战略方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战略体系层次结构的划分上先后提出了多种设想,比如划分为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三个层次。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我国的战略体系可由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战区战略、重大安全领域(核、太空、网络空间)战略三级五类构成。

国家战略,是对我国安全与发展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是战略体系结构的第一层次。我国虽然没有正式发布国家战略,但它体现在我们党和国家制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之中。其任务是依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国家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发展,达成国家目标。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两个部分,基本着眼点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创造有利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良好环境,确保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国家战略是制定军事战略的依据。

军事战略,是战略体系结构的第二层次。它受国家战略的制约与指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通常由军事战略方针来确定,核心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军队使命任务的历史性拓展,军事战略不仅要注重完成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核心任务,还要注重完成其他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要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要维护领土的安全,还要维护海洋、太空和网络电磁

空间的安全,强有力地支撑国家利益拓展;不仅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
维护国家综合安全,还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

军种(战区)战略,是对军种(战区)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筹划
和指导,是战略体系结构的第三层次。军种(战区)战略是军事战略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军事战略。我国的军种战略包括陆军、
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战略,主要任务是在军事战略的统一指导下,
解决各军种的建设发展和力量运用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
明确制定战区战略。未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应依据军事战略,确
定各战略方向的战区战略。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制定军种战略和
战区战略,都要围绕统一的战略目标,着眼联合作战的战略需求,形
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重大安全领域战略,是对关乎国家安全、战争胜负的重大领域军
事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它既是军事战略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双重属性。
现阶段重大安全领域战略主要包括核、太空和网络空间战略,其主要
任务是在军事战略的统一指导下,解决核、太空、网络空间建设发展
和力量运用的重大问题。有限可靠的核力量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
战略基石,太空、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国际军事竞争新的战略制高点。
统筹核、太空、网络空间战略,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完整的战略体
系、推进战略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重大安全领域战略是开放的动
态的发展的战略,将随着经济、科技、军事活动的不断拓展而增添新
的内涵。

第三节 战略的特性

一、政治性与军事性

战略是强军胜战之道,更是治国安邦之策。战略的政治性是由
军事对政治的从属性决定的。战略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满足政治的

要求,完成政治赋予的任务。战略从属于政治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的性质是由政治决定的。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这种性质规定了战略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影响到战略的取向。霸权主义国家的战略通常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二是战略的目标是由政治赋予的。政治主导战略,规定战略的目标,明确战略的任务。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战略都不能超越国家的政治目标,都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任何战略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目的而已。战略的能动作用在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的态势,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慑来达成政治目的。三是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受政治的支配。政治集团的、民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政治设计是战略的依据,战略不能偏离政治设计的轨道。究竟采用何种战略,如打与不打、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战争、借助同盟力量还是单打独斗、采用威慑还是实战、采取进攻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何时停止战争等,都由政治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导致战略的变化。政治的优劣往往决定战略的成败。

战略的军事性是指其具有特殊的军事属性,这是由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特有的规律,特别是战争特有的规律所决定的。战略具有指导全局的独立完整的系统使命与功能,并且有其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与规律。它不仅从属和服务于政治,而且也积极影响政治,对政治有很强的反作用力。平时战略对政治起着积极的辅佐和促进作用,战时战略的成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而战争的胜负又决定着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的命运。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可能要根据战略实践作出局部调整,在全面战争状态下战略甚至可能成为政治的主角。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政治要为战略创造有利条件,要能充分动员和综合运用人力物力资源来保证军事行动的实施,要善于在外交、经济和精神上为打赢战争凝聚最大的战略合力。

二、全局性与枢纽性

战略是对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其全局性体现在从政治高度出

发,统筹兼顾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和各个阶段,发挥总体的全面的筹划指导作用。把握战略的全局性具有以下内涵:一是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出发,更加坚决地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更加自觉地在這個大局下行动;二是军事战略统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全局,各军种、各战区都要自觉服从服务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保持战略全局稳定的整体要求;三是军事战略关照战争、军事威慑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全局,各个战区、各个战场、各个参战力量都要按照统一的部署协调行动,要恰当区分战略阶段,明确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并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向发展;四是军事战略要关注与其他领域斗争的关系,要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斗争有机结合、密切协调,为打赢战争、维护和平、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战略的枢纽性,是指在战略全局中存在具有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重心和关节。这些重心和关节,是战略指挥、战略力量、战略保障的关键所在,也可能是战争体系和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所在,或者是敌我双方军事对抗的焦点所在,比如信息网络空间的重要节点、战略指控中心、主要作战方向、关键作战平台、战略保障通道等。正如毛泽东所说,抓住战略的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的枢纽部署战斗。所谓关照全局,核心是要找准和把握枢纽,围绕枢纽问题部署和运用力量,通过解决枢纽问题赢得与掌控战略全局的主动权。

三、对抗性与控制性

战略的对抗性,是指战略筹划和指导始终针对主要威胁、战略对手和主要作战对象,围绕敌我双方的斗争和博弈,运用军事力量和手段赢得胜利。可以说,战略集中地反映了国家矛盾或阶级矛盾的军事关系,因为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政治集团之间矛盾

斗争的一种最高形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战略具有特殊的对抗性质。战略的对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对抗目标。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战略，任何军事战略都是针对特定威胁、挑战和对手提出来的。二是有对抗性的力量运用指导。在战略指导上力求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针对敌体系的弱点和关节点实施重点破击。三是有针对性的力量体系发展模式。在武装力量特别是关键性战略武器系统（非常规与常规系统）的结构、数质量的建设上，既注重成系统成体系，也始终瞄准战略对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力争形成克敌制胜的非对称军事能力。

战略的控制性，是指在战略上紧紧围绕军事对抗行动、战局发展等实施主动调控，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确保军事行动不偏离既定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局部战争政治目的的有限性，信息化作战手段的高度精确性，以及当代战争的高消耗性和巨大破坏性，决定了军事对抗行动特别是战争行动的有限性和必控性。就我们自身而言，为维护战略机遇期，保证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受重大干扰，必须避免单纯的为对抗而对抗，而应主动控制战争手段运用的规模和方式，注重军事力量的“软”运用和非战争运用，力争以小战、巧战而屈人之兵。

四、现实性与预见性

战略的现实性，是指对当前时间段内正在进行的军事实践的战略指导，强调针对国家面临的现实威胁、立足军队现有力量和武器装备状况，来筹划指导战争、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战略的现实性规定了在执行既定战略决策、落实战略规划计划、实施战略行动的过程中，必须着眼应对最现实最紧迫的威胁，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军情去奢求难以企及的战略目标。

战略的预见性，是指在立足应对现实威胁解决当前问题的基础上，关照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筹划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

争,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强调战略的预见性,主要是预测时代特征、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预测世界军事特别是军事科技的发展趋势,预测潜在的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预测敌我力量对比的可能变化,预测潜在威胁的性质、方向和程度,预测未来战争可能的爆发时机、样式、方向、规模、进程和结局,揭示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从而为制定、调整和实施战略提供客观依据,更好地牵引国防和军队建设,引领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战略预置。战略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战略预见越准确,战略筹划和指导的针对性就越强,产生的战略效果就越显著。

五、稳定性与应变性

战略的稳定性,是指战略一旦确立,在一定的时期内就要保持其基本内涵的相对稳定和贯彻执行的连续。战略的相对稳定性,是由战略的全局性、长远性和重要性所决定的,它关乎战争胜负,影响国家存续,不能轻易变更。否则,就会出现方向不清、目标不定的问题,造成战略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国家安全和利益带来重大危害。同时,军事科技的发展周期、武器装备的更新周期、战争形态的演变周期、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周期等,客观上也都要求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在相应时间段内保持稳定和连续。只要全局情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或在全局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双方力量对比和斗争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战略所确定的主要战略对手、主要作战对象、主要战略方向和基本作战形式,就会保持相对固定。

战略的应变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战略基本内涵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要具备适度的灵活性和可调性。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常变常新。顺势而为,因敌而变,量情用兵,是一个基本的军事规律。战略会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充实和完善,借以保持战略活力,增强战略指导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第四节 影响战略的重要因素

战略是在既定条件之上对战争及其他军事实践活动的能动驾驭。所谓既定条件,就是一定时期内世情、国情和军情的综合体现,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人文、自然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深入、准确地研究影响战略发展的条件因素,是正确制定战略、合理实施战略的基础与前提。

一、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能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政治意志和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统领和规范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个领域。国家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决定着军事力量运用的取向和方式,决定着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模和投入,决定着军事资源的时间和空间配置。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手段支撑保障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始终坚持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下筹划军事力量建设,始终坚持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军事斗争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可以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核心利益是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都需要坚决捍卫。在战略上必须把核心利益是否受到严重危害,作为决定战与和的“红线”,而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留有余地,尽可能避免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冲击。

国家战略能力是营造态势、应对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进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性、支撑性能力。它源于综合国力,由综合国力要素在国家统筹下经过动员、组织转化而来。战略更直接地取决于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国家决策层的领导指挥能力、政府机构的组织协调能力、武装力量的威慑和实战能力、经济社会的战争支持能力,是战略应优先和重点考虑的能力条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着眼于国家战略能力中军事与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能力的综合运用,需要着眼于统筹兼顾当前能力运用和长远能力发展,需要着眼于提高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能力的效率。

军事战略的制定,要着眼为国家经济建设、增强国家战略能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也要考虑经济发展特别是国家战略能力提升对军事力量发展的支撑,在国家战略能力可承受的范围,确定军事战略目标和武装力量的建设标准,使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发挥应有作用,确保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二、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发展位势

近代文明国家和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与国家发展位势对各国军事战略的影响日益增强。当今世界进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国家之间的联系更趋紧密,博弈也更趋复杂。

国际战略格局是世界各战略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有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形态,不同形态塑造不同的战略类型。国际战略格局中存在并孕育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基本力量,是和平力量发展大于战争力量发展,还是战争力量发展大于和平力量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时代特征,从而影响到战略的起点和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正是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准确把握,才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适时将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从应对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调整到重点准备应付局部战争的轨道上来,并且定下裁军百万的决心。国际战略格局因大国力量此消彼长的不断积累,而发生重大乃至根本性的变动。这种变动必然造成国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爆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各国都需要在战略上进行相应调整,以求维护和利用机遇,规避和降低风险。

国家发展位势是国家因综合国力特别是战略能力消长而导致的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相应态势。不同的发展位势决定不同的战略追求。譬如,美国由一个北美地区性大

国发展为世界性大国之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本土战略、加勒比海战略和太平洋战略,其真正的全球战略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战略位势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社会中的敌我友关系的变动,带来所承受的国际压力的性质和强度的变动。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一个国家快速崛起,容易成为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容易遭到霸权国的遏制、其他大国的挤压和周边国家的疑惧,军事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这是处于崛起关键阶段的国家制定和实施军事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发展位势密不可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调整,必然牵涉国际体系内不同国家权力地位的再配置,而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位势的重大变化,往往对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战略筹划和指导者而言,既需要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动态发展中把握国家发展位势,也需要立足国家发展位势来审视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对自身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政治和经济的,也必然是军事的。

三、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家地理环境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战争领域中远程作战手段和方式的发展,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家地理环境对军事的直接影响相对下降,但仍然是制定和实施军事战略的基础条件。

国际地缘政治是国家之间利用地理关系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所形成的政治生态,可以区分为海洋、大陆和陆海复合三种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国家,其军事战略都或多或少表现出相应的特质。近代以来,国际地缘政治斗争长期表现为海权和陆权之争,斗争的实质是对战略要地、战略资源、战略通道的争夺,斗争的热点位于环绕欧亚大陆外缘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巴尔干半岛陆海交接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大多发生在这一地带,美国提出需要控制的16个重要海峡大多数也处于这一

地带。未来,这里仍将是国际地缘政治角逐的重要舞台。同时,围绕控制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全球公共空间的新的地缘政治斗争将趋于激烈,必将对大国军事战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国土幅员、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气候条件等,对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具有最为稳定的制约作用。任何国家制定军事战略,都需要全面考虑本国的地理环境因素,尽可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理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努力克服地理环境中的不利影响,更加有效地建设战场体系、部署军事力量、配置军事资源,更好地达成“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地理环境对于军事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是相对的可变的,与国力军力强弱、战略取向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我国面向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弧形凸出的地理特点,在过去国力军力较弱、以抵御外敌入侵为主的情况下,加大了战略防御的难度,而在今天国力军力不断提升、战略上强调要为“走出去”的国家利益提供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则具备了多个可供选择的方向和通道。

国际地缘政治动态发展,国家地理环境基本稳定。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动,可能带来国家地理环境中某些要素战略权重值的上升或者下降。如何依托和利用国家地理环境,如何在复杂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争取主动,不仅是国家战略的任务,也是军事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科学技术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也是推动军事领域产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力量。科技进步一旦广泛运用于军事目的,必然引起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结构的变化甚至变革,也就必然引起军事战略的深刻调整。利用科技进步谋求军事能力优势,进而压倒和战胜对手,是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竞争与较量的主轴。进入信息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呈现加速发展趋势,而且与军事相结合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越来越深,领先国家与追赶国家之间扩大

与缩小军事技术“时代差”的斗争更趋激烈。客观上要求军事战略更加重视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更加依靠科技进步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更加主动地适应科技发展创新作战方式和改革军队组织形态。同时,又必须防止“科技迷信”和“唯武器论”,将科技要素对军事战略的影响僵化绝对化。科技进步所展现的战争前景与战争的实际发展不可能完全一致,技术优势不等于战争胜势,“战争迷雾”和“战争阻力”仍将存在,非对称作战、以劣胜优依然是弱势一方战略筹划和指导的重要基点。

以军事技术标准来区分,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战争形态,经历了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和信息化四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需要把握所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形态的基本特点,遵循这种形态下的战争客观实际和战争指导规律。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烈要求创新发展军事战略,顺之者胜,逆之者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与英法对于机械化战争认识的不同战略反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战争初期的不同命运。海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预见到战争形态将发生重大变化,及时调整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增加了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内涵,进入 21 世纪后,又明确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聚焦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是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选择。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战争形态的演变开辟了前进道路。科技进步推动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形态从量变到质变,并最终引发战争形态的划时代变革。今后一个时期,信息化战争形态将日趋成熟,在军事战略上需要将科技创新、战法创新和军队体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寻找未来战争的制胜之道。

五、安全威胁和军事能力

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基于安全威胁而制定。关注的焦点在于谁正在或将要威胁自己,威胁的地点在哪里,威胁的性质怎样,威胁

的方式如何,威胁的强度有多大。掌握了上述情况就可以在战略上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筹划和准备。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安全威胁仍然是制定军事战略最直接的依据,所不同的是安全威胁的来源、性质、方式更加复杂多变。军事战略在关注战争威胁的同时还要关注非战争威胁,在关注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还要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关注陆、海、空威胁的同时还要关注太空和网络空间威胁,在关注现实威胁的同时还要关注潜在威胁。也就是说,安全威胁的多元多样,要求军事战略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突出战争筹划和指导的基础上,还需要把有效应对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多种威胁纳入军事斗争准备的范畴。

如果说安全威胁是制定军事战略的外在牵引,那么军事能力就是制定军事战略的内在基础。军事能力对军事战略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立足现有军事能力确定战略企图和战略方案,也就是当前有什么能力打什么仗;另一个是针对未来可能的战争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军事能力,也就是长远打什么仗发展什么能力。所谓基于军事能力,是指鉴于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上升,把重点转到以己为主、以确保发展为主、立足于长远军事能力建设上,以未来军事能力的拓展增强军事战略的弹性。

作为制定和实行军事战略的基础,安全威胁和军事能力对军事战略影响的着力点不一样,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军事战略需要统筹兼顾威胁和能力两方面的因素,在二者之间寻找到近期和远期的契合点,实现应对现实威胁和发展长远能力之间的最佳匹配。

六、战略文化与战略思维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社会、经济等长期作用下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战略文化则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战略服从服务于政治,同时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被打上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烙印。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为里,战略为表;文化为种,战略

为植。战略文化的特性,尤其是其内核——价值观的特性,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战略实践具有深远而稳定的影响。中华民族延续 5000 多年,其战略文化的灵魂集中体现为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求和平,表现为贵和尚同、兼爱非攻、慎战节武,非万不得已不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必须有所节制,力求以较低战争创伤来维护和平、恢复和平。谋统一,自秦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实现天下一统、九州共贯作为最高最神圣的政治理想,并在统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坚持文武兼用、刚柔相济、剿抚结合,强调收心重于收土。重防御,就是不以兵强天下,秉持自卫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种战略文化传统的内在特质,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相融合,形成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战略选择,坚决维护和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追求,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

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思考,而军事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从战争筹划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① 古今中外战略决策,除基于客观条件之外,还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水平。战略思维的本质,是要运用一定的认识论方法论,从纷繁芜杂而又对抗激烈、瞬息万变的战争运动中发现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以之筹划指导战争实践。不同的战略文化,孕育不同的战略思维。比如近代以来西方以自我为中心、以冲突—暴力—强权为主轴的霸权主义文化,催生了扩张性战略思维,惯于以武力为支撑和手段进行“民主”输出和经济掠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具有朴素而又深厚的哲学基因,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还是兵家,都从不同角度为战争筹划指导提供了哲学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特别是《孙子兵法》,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哲学的经典,其十三篇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芒。毛泽东作为中国历代兵学和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为我们矗立起一座现代战略思维的高峰。比如他强调有理有利有节,强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

^① 参见李际均:《新版军事战略思维》,第 1 页,长征出版社 2012 年版。

走,强调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其中蕴含的思辨性战略思维,至今仍是战争筹划指导的精髓所在。

战略是历史文化的结晶,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战略带有本国本民族鲜明的文化特性,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多元文化中汲取养分。当今中国正在由大变强,正在成为全球影响不断扩大的新兴战略力量。这就要求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战略文化传统的同时,拓展视野,胸怀世界,借鉴各国战略文化之所长,熟知国际法体系对军事力量运用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塑造出适应国家崛起的新型战略思维。

第五节 战略的制定

战略作为军事科学与军事艺术的最高体现,源于军事实践,指导军事实践。以战争为核心的军事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特殊的运动方式,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必然性与盖然性的辩证统一,需要在遵循一般军事规律的基础上掌握特殊军事规律。军事实践领域的特点与规律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制定军事战略具有一些共性的思维、程序和方法。

一、制定军事战略的思维取向

前瞻思维。前瞻性思维是战略筹划和指导的能动性的重要源泉。孙子说:“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①毛泽东能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关键阶段,指引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坦途,得益于高度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得益于基本符合形势发展的战略预见。他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发展阶段的预判,以及对每个阶段的战略筹划和指导,都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但在军事实践中,许多人容易因循守旧、刻舟求剑,习惯搬用过去战争胜利的经验,指导未来的军事

^① 《孙子兵法·用间篇》。

斗争,结果导致失利或失败。军事战略思维首要的是立足现实问题,瞄准未来需要,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贯起来作为战略考察的时间架构,依据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脉络,把握军事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运动,准确或大体准确地揭示未来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可能的走向、阶段和特征。特别是要能够大体描绘出未来战争形态和主要作战形式的基本轮廓,有针对性地制定遏制未来战争和打赢未来战争的战略构想。这是军事战略活的灵魂。

整体思维。战争是交战双方动用几乎全部力量要素的暴力对抗。战争的系统性、综合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军事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取向。毛泽东强调,战争指导者要把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现代条件下战争体系对抗的特征更加凸显,国家安全领域斗争中军事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更加紧密,军事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取向越来越突出。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国家战略全局和军事战略全局观察、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采取自上而下、从大到小、先统后分、以远带近的思维程序,统筹兼顾好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各部分、各阶段对全局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我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需要统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统筹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统筹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统筹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也就是要着眼实现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总体目标,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搞好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整体筹划。

主动思维。在敌我互动中夺取主动和优势,是军事战略筹划和指导的关键。孙子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①,毛泽东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②,都强调在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中争取主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动,把主动思维作为战略思维的至高境界。主动思维,既要善于因敌而动、因势而动,又要力戒“刺激—反应”式的被动思维,在战略思维取向上必须突出立足于己、求其在我,调动对手而不是被对手所调动,营造态势而不是被态势所束缚。在战时,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地点、方式与敌作战,而不是在敌人限定的时间、地点,按敌人限定的方式与之交锋。在平时,你搞你的现代化,我搞我的现代化,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军事力量体系,而不是与对手尤其是强敌进行对等的军备竞赛,力求瞄准敌之弱点发展我之强项,确保关键时能够克敌制胜,以争取与保持主动地位。

忧患思维。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保障,战争是解决国家、政治集团间矛盾的最高也是最后的手段,军事战略筹划指导需要有防患思维。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①。1950年毛泽东决策出兵抗美援朝之际,就对可能后果作出多种估计,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②,并对此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军事战略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争取最好的可能。无论是战争还是军事威慑或者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思考和筹划的基点不能只放在对己有利的条件上,而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③。唯其如此,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才能防患未然,立于不败之

① 《孟子·告子下》。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地,也才能先胜而后战。

二、制定军事战略的基本程序

一个好的军事战略,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而是产生于对战争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诸方面情况的全面了解与掌握,产生于“侦察—判断—决策—行动”这一客观流程中。无论军事任务和行动如何复杂多样,无论战争形态和战法如何发展变化,这个流程的基本环节和顺序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主要是流程的循环周期。这就是说,制定战略的基本程序是相对稳定的。

战略判断。战略判断作为制定军事战略的首要环节,从全局上分析战略形势,明确战略需求,为战略决策提供基本依据。战略判断主要包括时代特征与主题、国际战略格局演变走向、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战争形态及特点、国家利益需求、国家安全环境、现实和潜在战争威胁、战场空间和战场条件、敌我力量对比等。战略判断的根本要求是在具体的战略形势下做到“知彼知己”,“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①。这就需要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掌握敌方情况,并将各种情况连贯起来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再将己方的情况加上,研究敌我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判断结论。由于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和敌我双方的动态博弈,不能祈求主观判断与客观实际完全相符,而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重点和关键环节,把握重大的特别是起支撑作用条件的变化,使作出的判断大体适合客观情况,特别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要适合情况,从而为争取军事行动的胜利奠定基础。

战略决策。战略决策是制定军事战略的中心环节,主要是围绕战争、军事威慑、非战争军事行动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的全局性问题定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下决心。其核心是从战略上解决好为什么行动、针对谁行动、在哪里行动、怎么行动、用什么力量行动的问题。首先是明确战略目标。依据国家利益的变化,依照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总体要求,将国家战略任务转化和体现为军队的历史使命,确定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所要实现的目标,确定战争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其次是制定战略方针。通常包括确定主要战略对手、主要作战对象、主要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基本战略指导思想、基本作战形式和主要战法,以及军事力量非战争运用指导原则等。战略方针的主体内容相对稳定,但需要根据战略形势、战略目标和任务以及战争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而适时调整充实,赋予其新的内容,使其始终保持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再次是筹划战略布局和军事力量建设。依据战略方针,考虑战时与平时两种战略需求,确定各战略区、诸军兵种、战略预备队的编成、配置和任务,确定战略前沿和战略纵深的空间区分、力量配置和战场配系,确定国防动员体系、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国防基础设施体系的基本架构和主体功能,确定军事力量建设的目标体系、实现途径、阶段步骤以及保障举措。

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是将战略决策转化为战略行动的中间环节,其实质是着眼落实既定战略目标而预先进行的宏观构想、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其基本功能是根据战略目标选择战略路径、配置战略资源,形成未来战争的战略构想,引领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军事斗争准备进程。随着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信息化、体系化、高投入化趋势的日益显著,战略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大幅度提升,规划对象由重点筹划战备转向统筹军事力量建设和发展的全局,规划的类型由单项设计转向以总体设计为主、总体设计与单项设计相结合,规划的时效指向由注重近期转向着力把握长远方向,牵引中期和近期发展,规划的方式由定性为主的概略设计转向人机结合的精细设计。战略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事资源的投向和投量,决定着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效益,需要做到权威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其制定应在战略决策部门的主导下,综合集成各战略实施部门的意见,按照“信息收

集—方案设计—信息反馈—方案修订”的基本程序进行,并在规划执行过程中适时予以调整,确保规划符合战略需求的动态发展。战略规划的龙头是对未来战争的战略构想,包括全局性的战争战略构想,也包括针对不同战略方向、不同作战对象的战争战略构想。只有把未来战争的战略构想定准了,才能切实牵引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全盘战略规划的制定。

战略评估。战略评估是制定论证与检验修订军事战略的重要基础环节,其基本功能是在一定的战略价值评判体系内,对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规划以及战略行动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比较优劣高下,权衡利弊得失,从而为制定或修订战略提供参考依据。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在当代就集中体现在战略评估上。战略评估贯穿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主要从战略需求、战略能力、战略效果、战略风险四个方面进行评判估量。既要对需求、能力、效果、风险分别进行具体分析,更要将它们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行系统考量,其要义在于需求与能力相匹配、效果与风险相权衡、可行性与可靠性相一致,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提供尽可能合理、尽可能有利的战略选择。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评估广泛引入计算机模拟仿真、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等方法,量化评估、动态评估、博弈评估的前景日益广阔,为增强战略评估的精确性和时效性提供了重要条件。

把握制定军事战略的基本程序,从战略判断到作出决策、制定规划、进行评估,要依据客观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之。

三、制定军事战略的根本要求和方法

军事战略从根本上来讲是强军胜战之道。赢得战争是军事战略的基本着眼点。研究战争、研究对手、研究未来如何行动,是制定军事战略的根本要求和方法。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毛泽东指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

我们的主要方法。”^①只要战争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要军事战略“战之方略”的核心功能没有改变,那么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制定军事战略根本的要求和方法。对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的战略研究和决策者而言,一是要善于研究历史上的战争。“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②应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战争,借鉴仍然有益的东西,规避可能重复的错误,抛弃已经过时的经验。尤其不能陶醉于自己过去战争胜利的辉煌之中,必须看到过去的胜利可能就是未来失败的种子。二是要善于研究当代他国的战争。在和平条件下直接战争实践机会较少,一定意义上,更需要关注间接战争实践,把当代他国进行的战争作为自己制定军事战略的参照物,从中把握战争形态、作战形式、作战方法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发现和总结当代具有主导性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再把自己的国情、军情加上去,有针对性地筹划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指导军队现代化建设。1993年我军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其基本的动因就是从海湾战争中预见到了高技术战争时代的来临。

师敌以制敌。军事战略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运筹,制定军事战略就不是漫无目的和边际的纸上谈兵。平时争夺优势、战时谋求胜利的敌我对抗,决定了制定军事战略需要瞄准现实和潜在对手,以学习的态度来认真琢磨其军事理论、军事体系、军事能力和作战特点。学习和研究对手,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克制对手为目的,“熟识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努力探寻战胜对手的规律和办法。一方面要研究对手之所长,平时为我借鉴吸收,战时“以其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0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0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研究对手之所短,从作战体系和战争体系两个层面寻找其弱点,既包括军事上的不足,也包括政治、经济及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软肋”,从而在制定战略时更加有的放矢,扩大战略运筹空间,丰富战略方式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实现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的战略意图。

注重战争预实践。战争预实践是根据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超前设计战争,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长远发展,赢得未来战争主动权的科学方法。其实质是面向未来,设计未来,赢得未来。首先是在仿真模拟的实验中创新作战理论和战法,然后在训练和战争中付诸实施。在信息化条件下,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战争预实践的手段和方法大为拓展,仿真、模拟和基地演练已经从战役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战略构想、战略预案和战略理论将在战争预实践环境中生成、检验并完善。如美军已形成了完整的作战创新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空地一体战”到前不久提出“空海一体战”等高端作战理论,都广泛运用高科技手段开展相关实验论证,为其发展完善提供牵引支撑。适应这一新趋势,我军应当把创新作战概念和理论的研究部门、演示作战概念和理论的实验部门、验证作战概念和理论的实验部队、实际生成战斗力的作战部队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人机结合、环路闭合的新型战争预实践机制,变被动适应未来战争为主动设计未来战争,为制定军事战略、创新军事战略提供先进的科学的方法支撑。

第二章

战略之演进

从历史发展中学习与掌握战略知识极为重要。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战略是伴随着战争实践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战争实践是战略理论形成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历史的起点探寻战略的变化轨迹，把握其发展趋势和演进规律并加以归纳与总结，是战略学的逻辑基础和重要内容。

第一节 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

几千年来，中外战略思想，主要体现于战略谋划与战略实施的过程，记录在战略理论的著述中。上古至 20 世纪中叶战争和军队发展的历史，可以区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即：古典时代（5 世纪以前），中古时代（5 ~ 17 世纪），近代（17 ~ 19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20 世纪上半叶）。

一、古典时代战略思想的奠基（5 世纪以前）

世界历史的古典时代，经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其一是国家的诞生和早期文明的孕育，在旧大陆先后出现了巴比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 页，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埃及、印度、爱琴海沿岸和中国夏商周等古文明中心；其二是东西方的思想大爆发、大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在东方有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西方有古希腊的学术繁荣；其三是早期帝国的形成及其由盛而衰，最为重要的，在东方有秦汉王朝的建立、强盛和崩溃，在西方有罗马帝国的建立、扩张和解体。这三大历史阶段中，都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战争实践，演绎着丰富多彩的军事谋略，一系列经典理论著述奠定了东西方战略思想的基础。

古典时代的中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谱写了宏伟的战争画卷。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大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都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战争。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古人的战略谋划能力和战略思维水平逐步提高，战略思想也逐步萌芽和发展。在殷商甲骨卜辞以及《周易》《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如：“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允当则归”“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争异常频繁，谋略实践异彩纷呈，形成了系统的战略理论。这一时期，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的后发制人，晋楚邲之战中楚军的先发制人，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军的围魏救赵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战略指导。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纷纷对军事问题发表看法。儒家倡“义战”，法家重“耕战”，墨家主“非攻”，道家提出“柔弱胜刚强”等，都对战略理论的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应运而生，《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孙臆兵法》等一批经典兵书，建构起中国古典时代战略理论的大厦。

《孙子兵法》以十三篇、六千字左右的篇幅，精要地总结了战争指导的要素和基本原则，如：战争与政治关系密切，“上下同欲者胜”；战争对经济影响巨大，“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兵贵胜，不贵久”；战略的最高目标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安国全军”“不战而屈人

之兵”；战略准备至关重要，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战略决策的基点是“利”，“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战略决策的前提是“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战略指导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战略欺骗是获胜的必要手段，“兵以诈立”，要善于隐真示假；战略的重点是集中兵力，“以众击寡”；战略部署要“奇正相生”；战略进攻要避免实击虚，战略行动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其他兵家也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战略理论，如吴子提出“以治为胜”，孙臧提出“富国”乃“强兵之急者”、“战胜而强立”，等等。总之，春秋战国兵家深刻揭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确立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品格，在世界战略理论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围绕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以及保卫边疆安全的实践，战略思想和理论得到了广泛运用和丰富发展。在统一战略方面，建立与巩固后方基地、选择正确战略方向、创造有利战略态势，以及准确把握战略时机成为共性特征。如：秦统一战争，远交近攻，军事战略与政治谋略密切配合，逐次推进；秦末楚汉战争，刘邦立足汉中，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东汉统一战争，刘秀先取关东为根本，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等等。在边防战略方面，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修筑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汉武帝时，为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外交上联合西域诸国，军事上大力发展骑兵，先后三次派大军深入漠北，重创匈奴诸部。此后，以骑兵主动出击的进攻战略与依托长城守边的防御战略，成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内侵的两种基本模式，王朝强盛时以攻为主，衰落时以守为主。

3世纪后，随着汉朝覆亡，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纵横捭阖的战略实践，再次促进了战略思想的发展，涌现出曹操、诸葛亮等一批具有卓越战略运筹能力的军事家，出现了诸葛亮的《隆中对》、羊祜的《平吴疏》等战略谋划名篇。

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相呼应，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战略思想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西方战略思想的萌发，体现

于一系列战争的谋划和指导之中。在公元前13世纪古埃及与赫梯帝国的卡迭石之战中,赫梯军采取了隐真示假、诱敌冒进、突然袭击、退守要塞等战法,挫败拉美西斯二世率领的优势兵力的古埃及军队,体现了要塞守军与城外部队、步兵与战车兵相配合的特点。埃及与巴比伦衰落后,希腊崛起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主导了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在希波战争中,希腊诸城邦面对波斯的进攻,充分发挥希腊军队的质量优势,坚决发起决定性会战,取得了马拉松、普拉提亚等战役的胜利。由于波斯跨海远征,海上补给成为波斯军队的生命线,制海权的战略意义得以凸显。在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海军重创波斯海军,波斯陆军因补给困难而不得不撤军。这些战略指导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希腊,还有一些著名战术也被后世升华为普遍的战略思想。如埃帕米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所采取的集中兵力于一翼实施主要攻击的战法,后来就成为西方的一个基本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恩格斯语)

频繁的大规模战争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西方战略思想。罗马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和罗马统帅西庇阿都采取了战略迂回的进攻方式,被后世的利德尔·哈特总结为“间接路线战略”。在著名的坎尼会战中,汉尼拔以两翼包抄迂回战术,聚歼7万多罗马军队,创造了辉煌的战绩。罗马统帅费边则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避免决战,采用了不断袭扰、以拖待变的战略方式,被后世称为“费边战略”或“迁延战略”。在此前后,西方军事家还认识到政治对军事的重要影响,将争取盟友和瓦解对方联盟作为战略指导的重要内容。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的恺撒都以此而闻名,恺撒在向欧亚非等地区的军事远征中还获得了“政治将军”的称誉。

在古典时代,东西方从各自的战争实践出发,不约而同地触及了军事战略的本质和许多核心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环境的不同,东西方战略思想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其一,在战略类型上,中国以陆地战略为主,西方则兼具陆地与海洋战略。中华文明兴起于东亚,以农耕为根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西、南等陆地边疆,东部海疆千余年间并无强敌,因此,中国古典时代的战略完全是陆地型的。西方文明兴起于地中海地区,界邻欧亚非三大洲,商贸发达,海洋不仅是战略要道,也是经济命脉。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拥有了制胜的关键。因此,争夺制海权往往成为战略重点。这在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和布匿战争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其二,在战略文化上,东西方明显不同。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古希腊的学术繁荣确立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规定并影响着东西方战略思想的不同取向。中华文明突出的大一统观念,以德治为本的政治思想,以礼义为基础的伦理学的发达,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战略理论。如:对战争持慎重态度,认为兵凶战危,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为最高战略目标;战略的重点往往是内部整合而非外部扩张;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强调王者之师、义兵、义战;对于利与害、胜与败辩证中和的态度;等等。西方古希腊文明以城邦制为基础,城邦之间的冲突、征服及殖民扩张成为文明演进的鲜明主题。西方文化中的冲突和斗争意识,使得崇尚战争、歌颂战争成为一贯的传统,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成为西方战略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同外部威胁的斗争与扩张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成为战略的重点。

其三,在战略理论的阐发上,中国远远领先于西方。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春秋末年,中国就产生了《孙子兵法》这样的兵学经典。而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有关战略的思想散见于各种历史著作中,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等。这些历史著作分析战略得失,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如:希罗多德认为,国家的主要利益是维护自身安全和自主,面临的共同威胁是建立和维持同盟关系的基础,“欺诈”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正常手段;修昔底

德认为,统治者必须着眼国家长远利益,将帅对战争胜负具有重要意义,战胜之后应该乘胜追击;恺撒认为,要政治、外交手段与军事打击并用,应通过切断对方后勤补给迫敌就范,作战指挥的要旨在于选择时机、集中兵力、迅速行动、果敢进攻、击敌要害;等等。但这些思想并未凝练成系统的理论阐述。直到1世纪,西方才开始出现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弗龙蒂努斯的《谋略》和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是其中的代表。

二、中古时代战略思想的演进(5~17世纪)

中国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相继瓦解,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纷乱动荡的中古时代。中国历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周期性特征,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基本战略取向是追求大一统。在西方,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大一统的局面一去不返,涌现出众多部族和国家,陷入了长期纷争战乱的“黑暗时代”。在中古时代,东西方的军事家针对各自面临的新环境新情况,继承运用古典时代伟人圣哲创造的思想成果,不断加以补充、改造和引申,从而使战略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军事技术发展引起了军事变革,使战略理论出现重大发展。中古时代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帝国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兴起,也为战略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因素。

中古时代,中国封建文化持续发展,直到明代中期,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军事领域,争取与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战争一直是两大战略主题,二者又经常与农民起义战争、王朝更替战争等相互交织。历代军事家面对各种复杂情势,将传统战略理论运用于战争指导,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战略筹划。如:赵普与宋太祖“雪夜问对”,提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刘整向忽必烈上《平宋策》,主张建设水军,中路突破,攻灭南宋,统一中国;朱升、刘基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先楚后吴,各个击破”的进取方略;等等。这些战略筹议,不仅成功指导了重大战争

实践,而且提供了战略分析和谋划的正确方法,构成了中古时代中国战略思想发展的重要方面。

与先秦时期创造的辉煌相比,中古时代中国战略理论的发展明显趋缓,缺乏系统创新,大量理论成果都是对古典时代特别是先秦战略思想的阐发、补充和深化。这一阶段军事战略最值得注意的新发展,一是蒙元的骑兵战略。成吉思汗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突击性强的优势,远程奔袭、大纵深迂回、分进合击,把骑兵集团大规模远征的战略方式发展到了极致。二是明代的海防战略。中国的海防战略源于抗倭。明初立足于海上御敌,同时与岛屿、沿岸防御相结合,有效遏制了倭寇的侵扰。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都以“御敌于海上”为上策,主张大力发展海军。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是第一部论述海防战略的专著,主张建立“守之于海洋,守之于海岸,守之于内河,守之于城镇”的多重防御体系,相互维系,攻守结合,对于指导抗倭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嘉靖中期以后,军政败坏,海防废弛,海防战略逐渐萎缩为以陆路歼敌为主,日趋保守。

在边防战略上,中唐以前,基本延续了秦汉边防攻守结合的模式,但中唐以后,由于丧失了西北养马地区,难以组建强大骑兵,加之统治者的战略短见,以及儒家尚和反战、重内轻外思想的消极影响,战略防御成为宋、明两朝边防战略的主导倾向。

与中国以统一为趋向的历史发展不同,西方的中古时代以分裂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思想发展的重心是罗马帝国残余的一个分支——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东部为中心,地跨欧、亚、非三洲,长期处于众多异族的包围侵袭之中。它在战略指导上注重防御,强调发挥内线作战优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成功抵御了异族的多次入侵,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存续了近千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毛莱斯所著《将略》(*strategicon*),是此时期西方最重要的战略理论著作。该书主张建立强大的骑兵,在战争指导上强调行动的突然性,认为战争胜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攻击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强调将帅的个人才能,认为高超的指挥艺术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

件。18世纪70年代,《将略》一书被法国军事家梅齐乐译成法文,并由此创造出了“strategy”一词,即“战略”。

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西方文明挣脱了基督教神学的枷锁,走上创新发展之路。在军事领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由冷兵器向火器过渡,引起了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的变革。西班牙、荷兰、瑞典等欧洲强国积极推进军事改革,建立以本国民众组成的常备军,根据使用火器的需要调整军队编制,采用线式战术,实行新的军需供给制,等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布列腾菲尔德会战,被称为“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引发了注重冲击力的方阵战术向注重发挥火力的线式战术的转变,被西方军事界称为“第一场现代战争”。

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军事变革的影响下,西方战略理论出现了突破性进展。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所著的《战争艺术》和《君主论》堪称代表作。马基雅维利总结了古罗马时代的战略观念,与当时的战争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政治与军事关系密切,政治制度必须符合军事需要;只要能战胜,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将帅必须要有战略远见,有战略筹划和合理手段;要对各种因素作精密的分析和判断;要重视专家意见和情报搜集;要善于争取同盟;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战略战术;要重视战略预备队的作用;要慎重初战;要做好充分的物资储备;要严格保守军事机密;等等。马基雅维利的战略思想在西方影响很大,被誉为西方“现代战略之父”。

17世纪,奥地利军事家蒙特库科利著有《论战斗》《战争论》《论军事艺术》《战争艺术格言》等书。他认为,战争像其他科学一样,具有普遍而根本的法则,恰当运用这些法则,就能准确预测战争,并降低战争的损失。他指出,任何战争的胜利都有赖于周密的准备、审慎的计划和秘密、迅速、坚定的作战行动。他倡导机动战,同时也不否认会战的决定意义。他非常强调指挥和后勤的重要性,将保持“预备队”作为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称“到最后谁还能握有一支比较完

整的兵力,则谁就能赢得会战”。

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中部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帝国逐渐兴起,阿拉伯陆军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强,攻坚力弱,在作战中强调快速机动和对敌有生力量的杀伤,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重。在与地中海国家的争霸战中,阿拉伯海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略上,强调陆海军相配合,共同夺占滨海城市。穆罕默德在统一阿拉伯半岛的过程中,运用伊斯兰文明的宗教施加影响,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军事进攻与政治谋略并用的战略思想。

三、近代战略思想的跃变和转型(17~19世纪)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接踵而至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武装和战力,资本攫取的内在动力掀起了殖民侵略的浪潮。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利益争夺,使世界历史进入了“铁”与“火”的强权时代,并对东方国家的固有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促使其不得不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此历史背景下,战略思想迎来了革命性的大发展,在西方表现为质变飞跃,在东方表现为因应转型。

17世纪中叶,欧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生产,枪、炮等武器的产量和性能都大幅提升。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出现,大大增强了军队的远洋作战能力。无线电报、电话、铁路等新通信和交通手段的出现,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指挥效率大大提高。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军队组织编制、战略战术都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战略理论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强国是西方战略实践的领跑者。法国军事家拿破仑倡导攻势战略,主张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集中兵力,快速机动,大纵深迂回,以坚决勇猛的突然进攻歼灭敌人。在乌尔姆会战中,他以超乎意料的急行军出其不意地到达战场,仅以伤亡1500余人的代价歼敌5万余人。其后,又乘胜追击,正确选择作战地区,快

速抢占并扼守战场要点,速战速决,取得奥茨特里茨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拿破仑建立的总参谋部也为后来普鲁士建立现代总参谋部制度提供了“模板”。但拿破仑在大举入侵俄国时,被库图佐夫以空间换时间的撤退、迁延战略所败。拿破仑战争后,歼灭战思想被继续发扬,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军队机动能力的提高,“先集中后会战”的方式被淘汰,代之以普鲁士军事家毛奇推崇的“分进合击”战略。

这一时期,西方军事战略理论与实践交互影响,涌现出一批卓越的战略理论著作。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是西方近代战略理论的经典。其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将战略要素归为五类,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强调数量优势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强调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敌人的“重心”,“重心”可能是敌人的军队、首都、同盟国的军队,也可能是主要领导人或民众的情绪;等等。瑞士的若米尼所著《战争艺术概论》,总结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他认为:战争艺术首先要考察国家的战争政策和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各种不同类型战争的规律是有区别的,全民参加的民族战争具有可怕的力量;战略的重要任务在于正确判断敌方的战争区,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决定点,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机动和快速性取得优势,集中主要兵力协调一致地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敌军中央或一翼实施攻击。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海权战略理论兴起,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总结西方海战史,认为:建立强大的海权是战略的核心,强调建立强大的海权有赖于优势的海上力量,包括强大的舰队、商船队以及发达的基地;夺取制海权的手段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海军战略的要素是集中、中央位置、内线、交通线;集中优势兵力是取胜的关键,应避免在两个方向上同时作战;要确保己方海上交通线安全,同时破坏和封锁敌人的海上交通线;等等。马汉还指出,海军的存在是

为了进攻,防御只是进攻的准备,即使全局处于防御态势,海军舰队也必须积极出击。

在西方资产阶级战略思想大发展的同时,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战略理论也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关于战争起源与本质的科学论断,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影响,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学说,强调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军队,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积极防御战略和无产阶级的作战方法等崭新的内容,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世界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当西方资本主义狂飙突进之际,中国仍然重复着封建社会王朝的周期更替。清朝前期,在战略上融合了游牧民族和中原文化传统,体现出一定的创新。在边防战略上,一改历代备边多靠长城的传统,对边疆地区的叛乱分裂活动坚决打击,维护了国家统一。但是,清王朝战略上的调整并非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变化,其根底仍然是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差距越拉越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应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9世纪60~7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以“练兵”“自强”为口号,从创办军事工业,到按照西洋操法编练军队,中国军事的近代化逐步展开。

近代中国战略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海洋方向威胁的应对上。19世纪70年代,国家边海防出现全面危机。经过反复讨论和权衡,清廷最终决定海防塞防并重,一面分南北洋筹建海防,一面派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在清朝统治者的思想上,海防战略的核心是海口防御,海军的作用不是争夺制海权,而是增强海口防御的稳定性与机动能力。因此,尽管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舰船规模号称亚洲第一,但成军之后未新增一舰,在武器装备、战术训练等方面也逐渐与东邻

日本拉开了差距,最终在 1894 年的甲午海战中惨遭全军覆灭的厄运。

战略环境的剧变与战略形势的恶化,也使中国传统的军事理论面临严峻挑战。如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所说:“今之战事非二十一史之战事所有也,今之战术非孙吴兵书中战术可尽也。”^①在军事理论领域,向西方学习成为风尚所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译介了一些西方军事学论著,如《火器略说》《临阵管见》《中西兵略指掌》等,但这些论著大多局限于武器装备和战术层面。马汉的《海权论》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西方优秀战略论著,直到 20 世纪初才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近代战略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影响有限。

四、两次世界大战与战略思想的发展(20 世纪上半叶)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发展,引起战争手段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世界大战使国家集团的军事对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飞机、坦克、巨舰大炮、航空母舰等新式武器装备广泛运用于战场,战略思想空前活跃,视野更加宏大,内容更加丰富,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世界大战引起的全球战略格局的剧变,为东方国家摆脱殖民化,走向独立复兴提供了战略性机遇。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融汇中西方战略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与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军事战略,对世界战略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这一时期西方战略理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制空权理论。1909 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就预见到了制空权的战略意义,在所著《制空权》一书中,首次系统论述了空军建设和作战理论。主要观点有:建立与陆、海军并列的独立空军;建立强大的轰炸机部队;把歼击机与轰炸机的任务分开;摧毁敌空军基地、空军物资储备和航空工业中心比空中交战更有效;协调

^① 《郑观应集》,第 84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陆、海、空三军作战关系;等等。

间接路线理论。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著有《战略:间接路线》,认为: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军事战略从属于国家大战略;军事战略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精确计算;“间接路线”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战略目的。

机械化战争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少军事家开始思考以坦克为代表的机械化装备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英国富勒的《装甲战》、德国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坦克——前进!》、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现代战略问题》《战役的重要配合》《卓有成效地消灭航空兵》《当前德军的军事计划》以及法国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机械化战争的战略理论。他们认为,未来战争将是机械化战争,战场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战争节奏进一步加快,各军、兵种的协调配合对作战的胜利有重要意义。参战各国都将尽可能地以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以往战争中清晰的防线将被打破,代之以双方高速流动的机械化部队进行的大纵深的穿插、切割、迂回、包围等作战行动。在机械化战争理论中,德国“闪击战”理论和苏联“大纵深作战”理论具有代表意义。“闪击战”理论强调:以突然袭击开始军事行动;在主要打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兵器,速战速决;实施高速度大纵深密集突击。“大纵深作战”理论强调: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集中兵力兵器于该方向,力求达成战略战役突发性;实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连续或同时发起几个进攻战役。

此外,德国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理论。他在《总体战》一书中指出:现代战争不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全体国民的对抗;要取得总体战争的胜利,本民族必须精诚团结,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总体战”理论虽然是德国法西斯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战争特别是全面战争中敌对双方动员综

陆、海、空三军作战关系;等等。

间接路线理论。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著有《战略:间接路线》,认为: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军事战略从属于国家大战略;军事战略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精确计算;“间接路线”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战略目的。

机械化战争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少军事家开始思考以坦克为代表的机械化装备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英国富勒的《装甲战》、德国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坦克——前进!》、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现代战略问题》《战役的重要配合》《卓有成效地消灭航空兵》《当前德军的军事计划》以及法国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机械化战争的战略理论。他们认为,未来战争将是机械化战争,战场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战争节奏进一步加快,各军、兵种的协调配合对作战的胜利有重要意义。参战各国都将尽可能地以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以往战争中清晰的防线将被打破,代之以双方高速流动的机械化部队进行的大纵深的穿插、切割、迂回、包围等作战行动。在机械化战争理论中,德国“闪击战”理论和苏联“大纵深作战”理论具有代表意义。“闪击战”理论强调:以突然袭击开始军事行动;在主要打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兵器,速战速决;实施高速度大纵深密集突击。“大纵深作战”理论强调: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集中兵力兵器于该方向,力求达成战略战役突发性;实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连续或同时发起几个进攻战役。

此外,德国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理论。他在《总体战》一书中指出:现代战争不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全体国民的对抗;要取得总体战争的胜利,本民族必须精诚团结,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总体战”理论虽然是德国法西斯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战争特别是全面战争中敌对双方动员综

合国力进行对抗的特点。

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列宁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在创建新型军队的过程中,强调把红军建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劳动者利益而斗争的军队,主张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防建设。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国防建设和夺取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实践中,强调建立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强大的突击集团和战略预备队,指出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战略防御特别是战略进攻的理论。

世界革命的潮流,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斗争进入新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同时继承中国优秀战略传统,借鉴西方现代战略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理论体系——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其核心是紧紧依靠人民,创建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立足以弱胜强,实行积极防御。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将中国的战略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在世界战略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中国和世界军事实践、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开创与确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产生并形成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正式确立,并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军事斗争中不断得到运用和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

时期,面对时代主题、战略格局和使命任务等的新变化,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内容更加丰富,成为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总纲。

一、革命战争年代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28年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洪流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创了以“诱敌深入”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形成了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面对强大敌人的反复“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总结红军初期作战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战原则。1930年10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实行灵活的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取得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集中探讨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战争指导规律,指出红军作战采取的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论述了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问题,揭示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基本作战经验升华为军事战略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执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伊始,党中央就提出必须全面实行全党全军的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统一战线和战略方针共同商量的条件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

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在分析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预测持久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执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持久战思想的提出,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遵循“十大军事原则”。抗战结束后,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实施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9月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规定:依靠解放区有利条件,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实施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1947年下半年各战场人民解放军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2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对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作战目标以及战斗作风、休整补充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其精神实质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全面丰富和重大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确立与调整充实

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和奉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战争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予以调整充实,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有力地捍卫和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发展的。

确立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

待兴,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政治颠覆,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考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抵御可能的外敌入侵,整体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亟须明确军事战略指导方针。1952年4月,粟裕副总参谋长针对当时国防工事构筑、军兵种建设尚未全盘结合起来的情况,提出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尔后根据战略方针拟订国防部署和协调各方面的计划。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战略方针,是关系到制订作战计划、训练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工作的先决问题,也是关系到各军种、兵种的建设和各业务部门的工作规划的先决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因此,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就成为当前军事工作方面的一项迫切任务。会议正式确立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明确了战争筹划和指导的原则。基本思想是:①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和突然事变。②主要敌人是美国;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和日军;主要战略方向是我国东部的东北、华北和山东半岛地区,即从图们江、鸭绿江至连云港一线。③以陆军为主体,在空军、海军的协同配合下,把敌人进攻的主力歼灭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国土上,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地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进行持久作战,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上的主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初期采取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大纵深梯次配置,层层掌握机动部队,在重要方向坚决防守,在次要方向诱敌深入,主要战略机动部队用于主要方向和决定性时机,防御地区机动部队与守备部队密切配合,守备部队准备独立作战。

立足抵御大规模侵略战争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从20世纪60~80年代,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军事战略方针进行过若干次调整。这些调整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应对强敌大规模侵华战争为背景,旨在解决这个历史时期国家和民族在严峻的环境中面临

的生存危机问题。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北顶南放”方针。60年代初,中国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中苏同盟关系裂痕扩大,美国在我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不断加强,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袭扰行动趋于活跃,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活动也日益增多。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采取“北顶南放”方针。基本思想是:①使用原子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有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主要放在打得起来上面,但要争取打不起来;非原子的和小规模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②主要敌人是美国,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主要战略方向仍是我国东部的北部地区,更加强调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包括连云港)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外长山列岛、内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等5个岛屿群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③在连云港以北地区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在长江以南地区实行诱敌深入,将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视情或从北面或从南面首先转入反攻,最后进行战略追击,收复被占国土,并视力量大小实施境外追击;“北顶”地区以阵地战为主,“南放”地区以运动战为主。

60年代中期战略方针突出强调“诱敌深入”。鉴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苏关系破裂,中印边境地区形势严峻,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毛泽东认为美国、苏联、印度可能联合对我发起军事进攻,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出发,多次指示战略方针要应付“四面八方”,在多个战略方向上抗击外敌可能的侵略。要注重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设想了敌人沿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等4个方向进攻的可能性,在打法上强调要诱敌深入才好打,并预想了歼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深度,主要是在华北和中原平原大量歼灭敌人。这一时期,判断主要敌人、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其次是苏军。60年代末,随着苏联对我威胁上升,苏军成为主要作战对象,主要战略方向由东部转到北部以华北为重点的“三北”地区,战略任务由主要防范美国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防美对我实施中间突破)转为主要防范苏联的大规模侵略。

1977年制定“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进入70年代中后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国内“文革”结束后也亟待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明确军事战略方针，解决好将来仗怎么打的问题。1977年10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战略问题。同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总结60年代以来战略方针的调整变化情况，着眼抵御苏联大规模入侵，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基本思想是：①苏联霸权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和对我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主要战略方向仍是“三北”地区，苏军仍是我主要作战对象。②我军的战略目的和任务是应对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之战略突袭，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辅以必要的阵地战和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80年重新明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贯彻1977年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过程中，许多军队高级干部感到应对未来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在战略上诱敌深入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认为，诱敌深入在战争开始时可以作为积极防御的作战手段之一，但它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原则。我国四周边境地区多数有山地作为屏障，有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要地也处在战略前沿，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就意味着全面开放，取消了战略防御阶段必不可少的坚守防御，不仅失去有利阵地，而且战争潜力也被大大削弱，使战略反攻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战争样式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局部肢解战争、代理人战争、速打速撤的战争，诱敌深入可能正中敌人下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家底日益增大，有些重要建设项目处在战略前沿或战役纵深地区，不经反复争夺而轻易放弃，对战争发展弊大利小。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明确赞成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中央军委“801”会议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且作了新的诠释。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着眼于大规模国土防御作战，仍以苏军为主要作

战对象,以“三北”地区为主要战略方向,强调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突出战争初期的地位,在战争开始的3~6个月内以坚守阵地的防御战为主,辅之以不远离阵地的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坚决顶住敌人战略突击,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稳定战局,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为尔后有计划地大量歼敌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着眼打赢局部战争调整军事战略方针。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战略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定。我军从临战状态向平时时期建设轨道转变,从准备打全面战争向准备打局部战争转变,由以战备为中心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发展趋势,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2004年6月又对这一军事战略方针进行充实完善。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仍然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同时又丰富和拓展了其时代内涵。一是转变原来立足应对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做法,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后又进一步明确聚焦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二是突破了原来主要是应付侵略战争且主要是战争初期战略指导的局限,提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三是根据战争威胁的重大改变,及时调整了主要战略方向、主要作战对象,明确了战略对手,使军事斗争准备更具针对性。四是在原来强调赢得战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遏制战争的思想,在战略指导上突出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维护和平。五是在基本作战思想上突破机械化战争模式的束缚,提出了符合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基本规律的“体系破击战”的思想。

六是着眼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指导原则。

三、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基本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经历多次调整,其内容和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则始终一以贯之。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防御性国防政策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是经过战争检验的我军战略思想的精义所在,符合国情军情,也有利于政治上保持主动,因而要长期坚持,并结合军事实践的发展加以灵活运用。历史地考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为:

严守自卫立场,坚持后发制人。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始终将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作为武装力量的根本任务,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在战略上严守自卫立场,坚持后发制人,但不排斥战役和战斗上的先机制敌,平时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严阵以待,一旦受到外来侵犯,则迅速作出强有力反应,反击制胜。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政治上正义在我,军事上先胜后战。

战略防御与战役战术进攻相结合。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而不是专守防御,其实质是在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注重攻防结合、以攻助防。也就是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积极防御在实战运用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逐步削弱敌人,扭转战局,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二是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结合起来,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充分利用战略

防御造成的有利态势,以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从全局上转变防御地位,继而发展为战略进攻,彻底赢得战争胜利。

立足完全主动地位作战。我军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多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但都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战略意志,以弱小的力量迎战强大的敌人,敢于以劣胜优,敢于以弱胜强。基本的就是坚持毛泽东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也就是坚持以我为主,实施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夺取并保持军队行动的自由权,通过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逐渐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达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略目标。

立足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争取最好可能。毛泽东强调: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积极防御要求战争准备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争充满盖然性和不确定性,必须多设想几种情况,多做几手准备。如《孙子兵法》所言:“不恃敌不来,而恃吾有以待”。作战筹划和部署必须将敌情掌握得更全面,将困难估计得更充分,将后手预备得更有力,确保立于不败之地,力争先胜而后求战。和平时期尤需居安思危,不断深化拓展军事斗争准备,宁可备而不战,决不能无备而战,宁可大备小打,决不能小备大打。

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辩证统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仅要着眼争取战争胜利,解决如何准备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还要着眼有效遏制战争,解决如何避免打和制止打的问题。1956年确立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含有遏制战争的思想,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更是把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并列为基本的战略要求。遏制战争就是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将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强大的常规力量、后备力量、新型作战力量和有限有效的核力量结合起来,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

斗争相配合,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遏制战争需具有打赢战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足够准备与可靠能力,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就应果断出手,以战止战。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积极防御战略是人民战争的产物,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战略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把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结合起来,就是要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战,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是要善于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将战争潜力有效转化为战争实力;就是要坚持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紧密配合,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条战线协同一致,形成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当今时代,既要顺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更新武器装备、改革军队体制编制,也要不断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创新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培育积聚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最深厚的伟力。

第三节 当代世界大国军事战略

一、美国军事战略

美国建国 200 多年来,军事战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研究其军事战略,尤其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军事战略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了解和把握美国军事战略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世界陷于美苏争霸的冷战状态。美国军事战略经历了 5 次较大调整,主要是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1945~1952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1953~1960 年)、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1961~1968 年)、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1969~1980 年)、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1981~1988 年)。

这一时期,美国军事战略始终以遏制苏联为基本取向,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建立全球军事基地网和联盟体系,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背景下,采取战略围堵和代理人战争相结合的方式,长期向苏联施加战略压力,着眼击败苏军对欧洲的大规模进攻提出“空地一体战”构想。

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美国军事战略基本指向转为利用冷战红利,巩固和扩张全球霸权。主要是老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第二任期的“营造、反应和准备”战略。其要点包括:确保冷战后美国享有的战略纵深,有效防控核扩散和对付各种核威胁,积极建设对付弹道导弹袭击的战略防御系统,调整收缩海外兵力部署,维持美军在世界关键地区的前沿存在,发展依托本土快速投送兵力对付海外局部冲突的能力,推行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方针,强调先集中主要兵力打第一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同时分出少量兵力介入第二场战争,待第一场战争打赢后,再挥师打赢第二场战争。

2001年小布什执政不久适逢“9·11”事件,借助全球反恐态势,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制定了极具先发制人色彩的“保护、预防、战胜”军事战略。将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列为首要现实威胁,把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确立为首要战略目标,同时强调塑造有利安全环境,预防和慑止冲突,保持对关键地区的军事进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打赢不可避免战争。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海外军力调整。在欧洲削减西欧驻军,兵力部署向东欧扩展;在西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提升驻日美军的指挥控制能力,将驻韩美军分阶段南移,同时加强关岛海空兵力;在中亚地区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设立多个军事基地,强化军事存在;加紧新一代武器试验,加快亚太地区反导体系建设。强调建军模式由“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全面推进军事转型,力图建设一支能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威胁的联合部队。

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面临深陷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的严峻局

面,倡导“巧实力”,抛出“无核世界”论,在军事战略上着眼“打赢当前战争、预防和慑止冲突、准备战胜敌人”,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调整。从倚重单纯军事打击转向谋求综合安全,从单边主义战略思维转向更加依靠全球联盟体系,从以反恐为主转向兼顾当前威胁和未來挑战。着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脱身,将战略重心转至亚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方向,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再平衡”战略与“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在主张降低核武器作用的同时,强调继续保持美国核优势。在巩固和扩大常规力量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力量。

纵观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演变史,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战略追求与特征:

一是以扩张与称霸为军事战略的根本目标。争取独立→巩固政权→大陆扩张→海外扩张→与他国争霸→独霸世界,是美国军事战略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美国历史上,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具有争取独立和巩固政权的性质。1846年,美国挑起墨西哥战争,标志着美国奉行大陆扩张战略的开端。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美国打破建国时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战略传统,迈出全球战略扩张步伐,借助其“世界岛”的有利地缘条件和雄视全球的综合国力,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从美洲地区大国到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战略虽多次更迭,但在谋求和巩固世界主导地位这一战略目标上一脉相承。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历届政府都把巩固美国全球霸权,防范、遏制和打压对其构成挑战的战略势力,作为军事战略的基本追求。

二是保持压倒一切对手的强大军事力量。美国历来奉行实力政策,强调军事力量是实力的核心。在冷战时期,美国始终把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并获得对苏军备优势,作为防务政策的中心任务。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其所面对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对手更加多样,更加强调把美军打造成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军队,更加注重谋求技术优势,强调与盟军保持“代内差”,与现实和潜在对手保持“时代差”。

在建军目标上,美国国防部于2000年提出了“全谱优势”概念,即在所有军事行动中,都能单独或与多国部队和跨机构组织一起协同击败对手。2001年又提出了“全能军队”概念,要求各军种和各军事力量组成部分具有全面军事能力,既能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打赢大规模战区战争,又能对付非对称威胁。在建军原则上,美国国防部在“9·11”事件后提出了“基于能力型国防”理论。认为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多种威胁,只要具备了相应能力,不管敌人是谁,威胁来自何方,都能有效对付。在此背景下美国陆军提出“多能”原则,强调在军事行动的一切领域以及战略、战役和战术各个层次都能执行任务,并能迅速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从一种作战类型转向另一种作战类型,从执行一项任务转向另一项任务,还能从战争行动转向非战争军事行动。

三是以欧洲、中东、东亚为战略重点地区。战后60余年,美国一直把西欧和东亚作为战略桥头堡,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巴尔干这个环绕欧亚大陆外缘的弧形地带作为地缘政治上的必争之地。冷战时期美国将欧洲作为海外军事部署的重点地区,冷战结束后虽削减在西欧的驻军,但仍强化与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并推动北约东扩,支持北约在欧洲之外发挥作用和影响。冷战时期美国把大中东地区视为与苏联争夺的重要战线,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该地区反美势力抬头,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相结合的危险性上升。先后在该地区发动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中进一步谋取对这一战略地区的掌控。同时,美国把东亚和西太平洋视为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地区,一直作为海外军事部署的重点方向之一。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亚太新兴大国加速崛起,美国将军事战略重心转至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不断完善美日韩军事联盟体系,并将其扩展到东南亚、南亚和澳洲,进一步提高该体系的防空反导能力和海空打击能力。

四是实行“全球存在+本土增援”的军事部署。为保障全球威慑和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以本土为战略后方,以海外战

区为前沿的全球军事部署。其基本思想是以本土为依托,把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主力配置在本土,同时在海外配置必要兵力,实行前沿部署,一旦战争爆发,本土战略预备队即增援前沿部署部队作战。冷战时期,美国实行“前沿防御”,组织区域性军事联盟,与多国订立双边、多边军事协定,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前沿防御”改为“前沿存在”,收缩海外驻军,但仍强调在西欧、中东、韩国、日本及其他重点地区保持一定数量的前沿驻军,并通过联盟条约、联合军演、预置装备、提供军援、帮助训练驻在国军队等方式,保持海外军事存在。与此同时,将配置在本土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作为后盾,以战略核力量遏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袭击和大规模常规进攻,以部署在本土的常规现役部队和后备役部队作为中央预备队,强调增强本土战略预备队对付地区性危机和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根据需要借助战略空、海运手段实施快速投送,随时增援前沿部署部队,加强其持续作战能力。

五是积极推进联盟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推行集体安全政策和联盟战略,强调“集体安全是大战略的支柱”,“强大的联盟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47年开始组织区域性军事联盟,并与4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和多边军事协定。冷战结束后,美国进一步调整联盟战略,力图形成以其为核心、以北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多领域、多层次联盟体系,强调以西方价值观和联合经济力量作为保障集体安全的基础,坚持与盟国在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等方面相互交流,在武器装备、训练教育、基地设施以及控制关键地区等方面为盟国提供援助,加大与各地区特别是亚太盟国军队进行联合军演的力度,逐步在作战体系、作战理论、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形态等方面促使盟军向美军靠拢,为未来联合作战奠定无缝链接的技术和体制基础。

二、俄罗斯军事战略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作为苏联庞大军事遗产的继承者,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当代世界军事强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苏联军事战略的精髓,并根据时代条件和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形成了以“俄联邦军事学说”为核心的新的军事战略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军事战略发展经历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四个时期。其核心是维护既得利益、拓展势力范围、积极制美争霸。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立足打火箭核战争。70 年代对核战争和核武器作用的想法发生重大转变,越来越重视以核威慑为后盾的局部常规战争。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认为“核战争将摧毁整个人类文明,非核战争也将造成与核战争不相上下的毁灭性后果,未来的全球性核冲突和世界大战中没有胜利者”,强调把防止和避免战争作为首要任务,提出“五不”原则^①,把“非进攻性防御”作为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把军事行动限制在己方领土上,摒弃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的作战方法,全面收缩战略部署,撤销绝大部分境外驻军和军事基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军事战略经历急剧转折。叶利钦政府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重塑国防体制与建军模式。由于对美国 and 北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现实和潜在的威胁评估出现偏差,加之国内政局动荡,国力急剧衰落,叶利钦在坚持戈尔巴乔夫“五不”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不”原则^②,使军力士气严重削弱,军队发挥战略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其军事战略被指责为“国家在未来战争

① 在任何条件下不首先开始军事行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制定、不掌握、不使用任何旨在对敌实施突然袭击或先发制人突击的行动;不首先对敌大城市、文化中心及一系列其他民用目标实施有计划的突击;主要通过回击行动,多半是防御和反攻行动来抗击侵略;不规定、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排除从开始就展开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可能性。

② 俄罗斯不把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敌人,不把任何奉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任何邻国包括任何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国家视为潜在敌人,不对任何国家使用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除非当俄联邦及其公民、领土、武装力量或盟友遭到武装进攻时需要进行独立或集体自卫。

中被预先注定了必然失败的死亡战略”^①。1993年,叶利钦改弦易辙,确立攻防结合战略指导思想,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放弃不使用军队应对国内动乱的方针,提出核武器可用于实施回击、迎击和先发制人的突击,强调预防任何形式、任何规模、任何类型的战争,从“防御足够”原则出发采取防御性和进攻性防卫行动,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损失结束战争。1995年,俄国防部制定《对付俄罗斯国家安全主要外来威胁的战略构想》,把“北约确定为外部威胁和潜在敌人”。1996年,叶利钦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出,不追求在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数量上与其他大国保持均势,而奉行以使用自身武装力量坚决反击侵略为基础的“现实遏制”战略。

2000年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后,积极重振国威军力,要求武装力量必须能够有效遏制对俄和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的核袭击威胁,有效遏制外国或国家集团使用常规武器对俄及其盟国大规模入侵,有效实施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和维和行动。2002年提出“以核遏制为依托的战略机动性”战略,主张奉行“先发制人”方针,制定“同时打赢两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的战略构想,明确在国家安全面临危急局势时,“可以使用核武器回击大规模常规入侵”,并“保留实施先发制人核突击的权利”。要求建设精干、高效、高度机动的常备部队,必要时实施快速战略机动,打赢周边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2008年梅德韦杰夫执政,先后批准《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2010年《俄联邦军事学说》等文件,进一步充实完善军事战略,形成了“现实遏制下的灵活反应”战略。一是在威胁判断上,认为外部威胁大于内部威胁,将美国及北约视为主要战略对手。二是在战争准备上,重点准备打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以战略方向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海空军、防空部队和战略导弹兵负责抗击敌空中袭击和导弹突击,组织近海防御作战,力求拒敌于海上,

^① 石泽、翟德泉:《世纪之交俄罗斯核战略的调整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

陆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实施抗登陆战役和边境地区防御战役,抗击外敌入侵。三是在战略布局上,以西部、南部、东部为主要战略方向,组建西、南、中、东四大军区,建立相应的联合战略司令部。西部军区重点部署空天防御力量和战略进攻力量,应对美国和北约可能实施的空天袭击、海空封锁和反导作战;南部军区重点部署机动灵活的山地部队和空降部队,应对中低强度武装冲突,实施反恐行动或维和行动;东部军区重点部署强大的海上和陆上作战力量,以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地区”及俄日南千岛群岛领土争端;中部军区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其他军区,并兼顾中亚方向。四是在战略力量上,核遏制与非核遏制并举,把核力量和空天防御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保持强大核遏制能力和态势,优化“三位一体”核力量结构,重点发展新型陆基和潜基战略核导弹力量,进一步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宣称“不仅可在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且可在受到任何形式的常规武器侵略使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不仅用于保障国家安全,而且也可在盟国生存受到威胁时使用”。着眼应对日益上升的空天威胁,制定《国家空天防御构想》,组建空天防御部队,建立统一的国家空天防御系统,由传统防空向防空防天一体拓展。五是在建军模式上,由大战动员型转向常备机动型。要求彻底摒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应对大规模战争而建立起来的重型军队,推动“武装力量新面貌”改革,加快实现指挥体制扁平化、网络化,部队结构小型化、模块化,后勤保障社会化、一体化。加大武器装备研发力度,优先改造已有战略导弹系统,加紧研制新型战略导弹、太空监视系统、反卫星系统、情报侦察保障和战斗指挥系统、超音速武器和未来航空(包括无人机)系统,落实造舰计划,打造统一的联合作战平台。六是在联盟战略上,积极组建独联体范围内的军事同盟,抗衡美国和北约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挤压和渗透,缓解地缘竞争压力,加强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

纵观 20 多年来俄罗斯军事战略的发展,其基本特点包括:

一是由全球型军事战略转向区域型军事战略。苏联崩溃使俄罗

斯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萎缩,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前苏联范围内的统一经济空间和战略空间不复存在,领土和人口骤减,一些昔日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朝夕之间变成战略前沿,沙俄为之搏杀几个世纪的波罗的海和黑海走廊重新变窄。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无法继续奉行苏联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全球型军事战略,无法继续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竞争与战略对抗,不得不量体裁衣,减少军事开支,裁减军队规模,收缩战略部署,限制军事力量使用领域和范围,转而实施以本土防卫为核心的区域型军事战略。

二是坚决果敢使用军事力量捍卫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尚武民族,俄罗斯具有鲜明的以武立国、强国的传统,一旦国家利益和势力范围受到威胁,从来不吝动用军事手段加以维护,塑造其不可侵犯的强硬国家形象,威慑现实和潜在对手。科索沃战争收局阶段,叶利钦突然出兵抢占机场,宣示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战略影响。两次车臣战争,在国家情势跌至谷底的状态下屡挫屡战,不达目的决不罢手。2008 年趁奥运会之机,对格鲁吉亚予以闪电式突击,打破了美国和北约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部署与企图。

三是崇尚主动的攻势防卫作战。俄罗斯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历史文化和传统战略思维,决定了其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进攻色彩,即便在某个历史阶段强调防御,也是为国力所迫而作出的一种过渡性选择。叶利钦在俄罗斯立国之初虽然延续了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的“纯防御性”军事战略,但很快将其摒弃。进入 21 世纪后,普京强化积极的攻势防卫战略导向,明确提出“无论战争和武装冲突以何种方式爆发和以何种方式进行,在敌人大规模使用现代武器和未来武器包括各种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情况下,俄联邦武装力量都将随时做好准备,反击进犯,打击侵略者,实施积极的防御和进攻行动”,必要时可以“先发制人”。梅德韦杰夫进一步拓展俄罗斯对外用兵范围,提出可以为保护境外俄武装力量和公民、反击或防止对盟国的侵略、打击海盗和保障航行安全而在境外使用武力。

四是善于以敌为师、以敌为鉴、以敌为靶。战后苏联各个时期制

定的军事战略,基本上都是对美国军事战略作出的对称性回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不再公开以美为敌,但其军事战略始终重点瞄准美国和北约军事动向,尤其是高度关注、尽力防范美国和北约挤压其战略空间,以己之“先发制人”对抗美之“先发制人”,努力在周边地区谋求与美达成局部战略均势,努力发展非对称制衡美国和北约的高端战略力量。

随着综合国力回升,俄罗斯将加快军队信息化转型,加大以核力量和空天防御力量为依托的战略遏制力度。2013年1月,俄联邦航天署公布国家计划,俄未来8年将投入2.1万亿卢布(约合693亿美元)发展航天业,投入4万亿卢布(约合1317亿美元)购置舰艇特别是战略核潜艇。在恢复和巩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同时,大力经略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从长远看,还将可能重新恢复其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投射和影响能力,更加注重运用军事手段实现其国家利益。

三、日本军事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日美缔结军事同盟。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逐步建立起名为“自卫队”的军事力量,其军事战略的表述主要体现在国防方针和《防卫计划大纲》中。

冷战时期,日本军事战略经历了由“集体防卫”到“专守防卫”的演进过程。1954年日本以“自卫”名义重新组建军队,1957年制定《国防基本方针》,提出“根据国力、国情,在自卫所必需的限度内逐步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1960年,日美签署《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提出“日美共同防卫”的战略构想,日本初步摆脱单纯依赖美国的被动地位,形成了日美联手承担保卫日本战略格局。日本提出“依据国力和国情渐进建军”的基本原则,先后以陆、海、空军为重点实施了三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1970年,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正式提出了“专守防卫”军事战略,强调建设一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发展高性能的常规武器,不拥有对别国构成威胁的战略性进攻武器;不对对方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只在受到武力侵略时才进

行有限的武力自卫,防御作战只限定在日本领空、领海及周边海域,不允许攻击对方基地,也不允许深入对方领土实施战略侦察和反击;对于小规模局部入侵,依靠独自力量排除,对于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依靠美军支援。1976年和1978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先后出台,对“专守防卫”战略作出调整: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关系,制定日美联合作战要领,提高日本在双边军事同盟中的自主地位;扩大防卫范围,将“周边海域”的范围由“太平洋一侧300海里、九州西方200海里、日本海100海里和远洋航线500海里”改为“周边数百海里和航线1000海里”;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遏制侵略”和“防患于未然”。198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海上击破”方针,修正了以往以本土为重点的防御战略,实施“前方早期处置战略”,强调在公海上截击、歼灭来犯之敌。其基本构想是:以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为后盾,以日本高质量的军事力量为主力,以西太平洋的广阔空间为战场;以“一道(北海道)、两线(东南、西南远洋航线及其与本土所夹的三角形海域)、三海峡(宗谷、津轻、对马)”为防御重点,以海空决战为主要作战样式,在确保以北海道为重点的领土安全的同时,保证日本谋取资源、能源和占领海外市场,并向太平洋的广阔空间发展。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对军事战略进行大幅度调整,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其主要标志是冷战后制定的三份《防卫计划大纲》,即“95大纲”“04大纲”和2010年年底出台的“10大纲”,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新《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89~2000年奉行“全方位防御”战略。日本出台了“95大纲”“日美安保宣言”“新指针”及“周边事态法”等相关文件,进行了冷战后的第一次战略调整:由重点应对苏联威胁转变为全方位防御,主要假想敌依次为朝、中、俄;军事部署已由过去单纯侧重北方转变为北、西、西南均衡部署,重点加强西部、西南方向的反导弹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增加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数量;

提出“合理、高效、精干”的建军思路,赋予自卫队保卫日本、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各种事态、为建立更加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作贡献三大战略任务;加强日美同盟,把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

2001~2010年奉行“主动遏制”战略。“9·11”事件发生后,日本相继出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并于2004年年底出台《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04大纲”),启动日美“2+2”安全磋商机制,制定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完成了冷战后的第二次军事战略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专守防卫”被动防御性质,转向“主动遏制”战略。提出通过日本自身努力、与盟国及与国际社会合作,“防止威胁直接波及日本”,“改善国际安全环境”。2003年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把自卫队行使武力的时机从遭到武力攻击后提前到武力攻击发生前,突破了“仅在遭到武力攻击后才进行必要最小限度的自卫”的原则。提出在确保用以防备正规侵略的基础力量的同时,有效发展快速、机动、弹性和多目的且以高技术 and 情报能力为支柱的“多能、弹性、有效”的防卫力量。调整自卫队三大任务,强调有效应对新型威胁及多种事态,包括弹道导弹攻击、游击队及特种部队的攻击、军事入侵岛屿、侵犯领空及领海、大规模灾害等;防范正规侵略;自主、积极地致力于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建立面向全球的日美同盟关系,2005年日美“2+2”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确立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12项亚太地区战略目标和7项全球共同战略目标;2006年日美首脑发表《面向新世纪的日美同盟》联合声明,把日美同盟合作的范围由日本周边地区扩大到全球范围,合作领域由安全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领域。

2010年12月日本出台《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确立了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实行“动态威慑”;强调彻底放弃以往注重“存在性静态威慑”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建设一支注重“实效性动态威慑”的“机动防卫力量”,提高军

事力量的快反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多用性和高技术能力及情报能力,确保远离本土的离岛及周边海空域的安全。提出赋予自卫队三大职能,要求具备七种态势。三大职能包括:实施有效威慑和应对各种事态,进一步稳定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改善全球安全环境。七种态势包括:确保周边海空域安全,应对岛屿地区攻击,应对网络攻击,应对游击队及特种部队攻击,应对弹道导弹攻击,应对复合事态,应对大规模或特殊灾害。提出重点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确保西南岛屿的安全。军事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重点加强西南地区的警戒监视、防空、反导、运输、指挥通信等能力建设。

战后 60 多年来,日本军事战略经历了由“集体防卫”到“专守防卫”、由被动防御到主动遏制的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战略目标不断拓展,手段更加多元。冷战时期日本军事战略的目标是防止武装入侵,确保日本本土安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北方威胁”的消减,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威胁趋于多元。日本在“04 大纲”中首次提出了两大目标,即保卫日本和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10 大纲”继而提出三大目标,增加了所谓“营造亚太安全环境和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做贡献”的内容。表明日本军事战略的目标逐步由内向外拓展。冷战时期日本的主要手段是与美国结盟,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日本,同时发展必要的防卫力量。冷战结束后,日本强调发挥自身力量作用的同时,在同盟国、地区和国际三个层次上,与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开展多层次安全合作,尤其是强调在亚太地区构建由日、美、韩、澳、印、东盟等组成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体系。

主动遏制色彩逐渐增强。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日本逐步改变被动防御态势,向主动遏制方向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是《武力攻击事态法》(2003 年 6 月)提出的“预测武力攻击事态”概念,把自卫队行使武力的时机从遭到武力攻击后提前到武力攻击发生前。二是冷战后的三份《防卫计划大纲》将日本安全的着眼点

由日本本土向地区和全球扩展,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也由本土向周边地区和全球扩大,标志着“专守防卫”被主动防御、先期遏制的思想所替代。三是“10大纲”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通过积极灵活地运用军事力量,对各种事态实施有效的“动态威慑”,改变了以往被动的“静态威慑”思想,表明其军事战略的“主动遏制”色彩进一步加强。

战略针对性、指向性强。冷战时期,日本的假想敌主要是苏、朝、中。冷战后日本的假想敌依次是朝、中、俄,但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的趋势明显加强。日本一直视朝为主要现实威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和遏控力度。如加强西南岛屿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对中国海上活动的监视跟踪,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夺岛”联合军演,以牵制中国走向海洋的战略发展,为争夺钓鱼岛和干预台湾问题等做准备,2012年公然推进“购岛”“国有化”进程,挑起东海“岛屿争端”。安倍内阁上台后,呼吁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的“民主安全菱形”,并开始修订《日美安全合作指针》和《防卫计划大纲》,引起了东亚局势的持续动荡。日俄之间因存在“北方四岛”领土的争端,至今两国仍未签订和平协定,因而俄罗斯仍是日本的防范对象之一。

日美同盟合作范围扩大。“与强者为伍”是日本的战略文化传统。日本战略学家从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结论:日本与大陆国家结盟往往失败,与强大的海洋国家结盟才能取得成功。这也成为日本坚持与美国结盟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与美国结盟以来,日美同盟关系经历了从“美主日从”“日美共同防卫”到“全球全方位合作”的强化和拓展过程。近几年的日美“2+2”安全磋商会议制定了多项全球和地区共同战略目标及其防务合作领域,日美同盟的合作范围已由保卫日本本土安全拓展到干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事务。全领域、广范围合作的新型日美同盟,已经成为日本军事战略的主要支柱。

四、印度军事战略

印度作为南亚和印度洋的地区强国,也是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了解与分析其军事战略的走向,对认识和掌握世界及地区战略格局乃至安全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从1947年印度独立至冷战结束,印度军事战略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有限进攻战略时期(印度独立至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独立之初,国内经济落后、军力孱弱,外部与巴基斯坦形成对立,又面临美苏争夺南亚地区主导权的激烈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政府对外采取“不结盟”政策,周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对内则采取“先经济、后国防”的政策,争取时间,发展经济,厚积国力,努力实现保全印度、发展印度、壮大印度的战略目的。在军事上推行“有限进攻”战略,将巴基斯坦视为最直接的威胁,把战略重点置于西部,不断完善对巴作战部署。同时,印度为达到领土扩张和长期控制中印边境争议区的目的,加紧向“麦克马洪线”以南未占地区实施军事渗透,至1958年侵占了“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并在印度北部建立起针对中国的所谓“喜马拉雅安全体系”。

第二阶段为“两线扩张”战略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失利,对印度军事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重新评估安全环境、反思军事政策、总结经验教训。一是将军事建设置于优先地位,从1964年起推行第一个国防五年计划,拨款500亿卢比,大规模扩充军备。二是在实力难以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对华采取纵深防御方针。三是积极准备在西部对巴和北部对华作战。60年代中后期,印度获得美国大量援助,并与苏联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加上国内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军事扩张主义思想随之抬头,采取以中巴同时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准备在西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两线扩张”战略,采取西

线以进攻为主、北线以防御为主的“西攻北防”方针，把扩张矛头直接指向西部边境，力求从战略上削弱巴基斯坦。1971年11月，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肢解巴基斯坦。

第三阶段为“保陆制海”战略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印度称霸南亚的格局基本形成，一度紧张的美印关系、中印关系趋于缓和，英国迫于财力军力不足从印度洋撤军，苏联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减少了对南亚地区的干涉，从而使南亚战略态势出现有利于印度的重大变化，为其向印度洋地区扩张提供了战略机遇与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基于其陆上战略意图基本实现，逐步将战略重点由南亚次大陆转向印度洋，提出了“保陆制海”军事战略思想，全面谋求在印度洋北部的海上优势。

冷战结束后，印度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由“地区进攻”战略转向“地区威慑”战略。印度认为，冷战时期通过战争摧毁敌国军事力量、掠夺领土、征服意志的传统战争观，已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南亚次大陆形势，应该“重在强调威慑作用，而不是强调征服和占领”。基于这一思想，印度从90年代初开始实行“地区威慑”军事战略。所谓“地区”，包括北起喜马拉雅山脉、南至印度洋，西起伊朗、东至缅甸的广大范围。所谓“威慑”，就是立足大打做最坏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各种作战对象实施有效武力震慑，包括海上威慑与核威慑。整个90年代，印度“地区威慑”战略的核心是“拒止”，强调对南亚次大陆区内国家保持绝对军事优势，慑止其进行威胁到印度的军事冒险，同时对区外大国形成局部“力量均势”，限制其海军在印度洋上的行动自由，达到确保国家海岸线与领海安全和阻止大国渗透等目的。

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已超出南亚其他各国的总和，南亚各国事实上已无力对印度构成重大威胁。印度认为，未来同巴基斯坦和中国因边界争端而爆发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减少，更多的是中小规模的边境有限常规战争，同时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跨境有组织犯罪等威胁日

益增多,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样严重且相互交织。因此,印军赋予“地区威慑”战略新的内涵,将被动防御型的“拒止威慑”思想调整为先发制人的“惩戒威慑”思想,强调主动出击、先敌行动,致力于打赢核威慑条件下的高技术“有限常规战争”。主要内容包括:在战略目标上,强调军事服从政治,不谋求威胁敌国的生存,通过有节制地灵活运用军事手段,影响或促成敌国调整其反印政策,同时自己也准备作出必要妥协来换取敌方让步;在战争准备上,由过去准备打全面战争,转变为立足打核威慑条件下的高技术有限常规战争;在战略指导上,摒弃“等待敌人到达境内再干掉它”的消极防御理念,采取积极主动、先发制人指导方针,预先阻止敌人大规模进攻,使战争在敌方国土上进行,迫使对手陷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在作战指导上,突出三军联合作战,强调“无缝隙地动用所有资源打击、击溃和战胜敌人”,“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用在一个决定性的点上,产生最大的效果”;在威慑指导上,注重核常威慑并举,以核威慑确保印度基本免除战争侵害,有效遏制对手对印度使用核武器,把战争限制在有限常规战争范围内,发展可靠和强有力的常规威慑手段,形成多层次威慑力量,以常规军力为进攻之“矛”,以核力量为防御之“盾”,增强军事威慑的灵活性和选择性。

纵观印度独立以来军事战略的发展,可以看出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浓厚的地缘性。从独立之日起,印度就以地缘政治思维确定国家利益,谋划国家安全,制定军事战略。强调印度是亚洲的中心、印度洋是印度之洋,把南亚次大陆作为其势力范围,把一些邻国视为妨碍其实现地缘利益的主要障碍。印度军事战略以维护其地缘利益、排除地缘障碍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印度仍然把地缘政治作为思考和设计军事战略的基础性、本源因素,仍然主要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确定其战略方向、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企图把南亚次大陆建设成以其为中心的战略基地,进而经略和控制印度洋。

二是全面的继承性。印度独立后,在原封不动地接收英国殖民统治疆界的同时,全盘继承了英帝国扩张主义的军事战略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印度中心论”思想。核心是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防务内线”,将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其势力范围,以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边界”,将印缅边界至杜兰线之间广袤的领土作为其“安全内圈”。尼赫鲁将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视为“安全圈”,推行以印度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政策。此外,印度还吸收了本土传统战略思想。比如,把周边国家作为主要防范对手和作战对象,就深受其历史上著名战略家考底利耶“以邻为敌,远交近攻”“鱼的法则”等传统思想的影响。

三是有限的进攻性。印度提出了“支配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流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这必然决定其军事战略具有较强的进攻色彩。尽管印度坚称奉行“防御性”战略,但其独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包括三次印巴战争以及武力吞并锡金王国、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出兵斯里兰卡等,都充分证明其战略带有显著的进攻性质。近年来,随着印度国力军力的迅速增长,这种进攻性有增无减。同时,因为受到其国力军力尚未足够强大的限制,这种战略的进攻性又局限于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局部范围内,对一些区外大国对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渗透控制也暂时无法全面拒止。在对华战略上,印度在整体上采取防御态势,但同时又以攻为防,积极谋求局部优势,并通过平时的不断蚕食为战时由防御转为进攻创造条件。

四是全向的威慑性。印度为解决其称霸的野心同有限的国力军力之间的矛盾,提出在各个领域实行全方位的威慑。冷战结束后,印度加强与美、日等大国的联系,将以往重实战的战略调整为重威慑,强调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战略方向实行不同性质的威慑:针对中国实行“劝阻”性威慑,吓阻中国对印用兵,并遏制中国进入其势力范围;针对南亚周边小国实行“惩罚”性威慑,确保其不敢触犯印度利益,迫其俯首听从印度控制;针对美中巴实行“核对称”威慑,核战略

方针是“劝阻”美国、“慑止”中国、“对付”巴基斯坦,其中以“慑止”中国为重点,认为只有“慑止”中国,才能“对付”巴基斯坦,也才有可能“劝阻”美国。

随着印度大国意识的增强和综合国力、军事实力的不断上升,其军事战略未来发展趋势渐露端倪。印度的战略目标定位将可能由地区主导向全球参与迈进,战略指导将更加突出主动进攻,战略部署将更加体现控制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意图,更加强调陆海并重,稳定西线、加强北线、东进南拓、向海发展,作战方式将更加注重诸军兵种联合的空地一体战、机动作战和信息战,军事力量建设由内向性向外向性“跨境作战力量”转变,大力发展以航母、第四代战机、核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反导系统和太空军事系统为骨干的新型作战体系。

第三章

中国的战略环境与军队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发展与动荡、变革与危机、合作与竞争交织互动,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于实现复兴,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也随之上升。准确判断国际战略形势,清醒认识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着眼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全面把握与履行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是军事战略筹划的前提条件。

第一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

战略形势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是确定军队使命的重要依据。列宁曾经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特点。”^①在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面前,毛泽东、邓小平都强调,要“冷眼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向洋看世界”和“冷静观察”。只有将世情、国情和军情尽收眼底，深思熟虑，才能产生符合实际的战略筹划与指导。

一、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战略格局是一个国家认识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国家安全环境状况的外部条件和主要依据。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调整变动，取决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力量对比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在当今和平发展的时代，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已成为决定国际战略力量对比，进而决定国际战略格局演进的关键因素。

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从单极向多极的结构性改变。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主导、支配着国际体系，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单极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一超多强”的总格局尚未根本动摇，但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大国关系处在深刻复杂的调整中，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造成更大冲击。以单极主导为基本特征的国际体系旧平衡正在被打破，以多极共治为发展趋向的国际体系新平衡正在构建之中。大国之间利益重心和目标追求差异凸显，新老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之间频繁交织互动。

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近年来，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北缓南快的新态势。新兴大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缓慢。两场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GDP从2001年占世界经济31.8%下降至2011年的23%以下。“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最后10年的16%上升到21世纪头10年的30%。未来一个时期，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有望高于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大。与之相随，更多国家将参与国际事务，要求分享国际权力，国际权力结构状况将进一步呈现分散化趋势。

国际战略格局的根本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一超多强”的状态仍将延续。经济力量向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力量转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美国综合实力和操控国际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占有显著优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对新兴国家也占有明显优势。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也会遇到种种挫折与困难。即使其经济总量超越了发达国家,但向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力量转移仍尚待时日。新兴大国要真正跻身于国际体系中心,确立新的国际关系架构和规制,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主导的局面,还将经历长期、复杂而艰巨的博弈斗争。

二、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加快发展

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国家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发展,错综复杂,矛盾交织,影响和决定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走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以下基本特征:

国家间的合作不断拓展。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当今世界形成了一个由资源、资本、金融、信息、技术构成的相互依赖并相互影响的网络,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经济空前交融、利害空前交织,那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罔顾他国利益的做法,反而可能累及并损害自身。国家安全的综合性、互动性、多变性前所未有,国家在维护自身安全、发展自身利益时,仅站在自身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问题远远不够了,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综合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些事务,有的也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影响。国家经济利益的相互交融,特别要求加强政治上的协调、科技上的合作、文化上的交流。同时,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的需要,也使得大国之间的合作向多个领域和更高层次发展。即便是两个战略对手之间也不完全是传统的“零和”关系,合作已成为大国之间不得不选择的行为方式和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

国家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转换的时期,也是大国竞争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为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大国之间的竞争领域更加广泛,竞争程度更加激烈,竞争手段更加多样。不仅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竞争激烈,西方主要国家之间、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广泛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传统的政治、安全领域,也存在于新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更多地表现为围绕世界市场、综合国力、国际秩序、地缘政治、战略资源的竞争。守成大国不甘放弃与自身实力越来越不相称的既有权利,竭力打压新兴大国,以保持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新兴大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在作出相应国际贡献、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同时,也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国际权利。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崛起、旧有大国衰落往往导致激烈对抗乃至战争。究其原因,不仅有崛起国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因素,更多的则是霸权国不顾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贪恋、霸占与滥用国际权力所致。我们说,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日趋复杂。利益的相互交织和应对全球性共同挑战的需要,正在颠覆过去国家间那种阵线森严、敌友分明的关系,呈现合作中有竞争、协调中有斗争的态势。以传统的对抗性思维和“零和”理念区分敌友、判断安全威胁,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变化发展中的客观实际,也难以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需要。国家之间不能因为一个方面的分歧而停止其他方面的合作,也不能因为一个领域的对抗而进行全面对抗,而只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在利益同质化的领域竞争,在利益相悖的领域对抗。即便是同一个领域,也可能是在一个议题上合作而在另外一个议题上斗争,呈现议题式合作和斗争共存的局面。今后,大国关系的发展将更加务实,从而大大增加了求同存异的可能性。这样,就会抬高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门槛”,成为遏止、延缓战争爆发和制约战争升级的重要因素。

三、国际军事斗争日趋激烈

各国积极推进军事变革谋求军事优势。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根据国家战略目标的变化调整军事战略,推进以信息化为导向的军事转型,提高军事战略能力。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进入新阶段,国际军事竞争向高端发展,各国在核、天、网等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电磁、激光等新概念武器不久就可投入实战使用,量子技术、生物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可能引起新的军事革命。基于信息系统的陆、海、空、天、网、电多维一体的远战更趋成熟,智能化、网络化、无人化装备大量运用,战争空间进一步扩展到深海、太空和网络空间。美国在以新“三位一体”取代旧“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加紧在核、天、网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升级更新核武器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组建天战和网战专业部队。同时,以扩大战略司令部职能为牵引,整合核、天、网及其他新兴战略力量,加快推进其实战化进程。组建全球打击司令部,统一指挥战略远战力量,并计划在10年内发展新型常规“快速全球打击”系统,具备1小时内对任何地方实施常规打击的能力。利用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研发新概念、新机理武器,力图在军事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其结果很可能使世界其他国家在高端战略力量领域面临新一轮“时代差”。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我周边大国也加速整合网络力量,发展航天力量,加紧研制与更换新一代武器装备。

国际军事斗争的重心转向亚太。美国在经济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应对中国快速崛起,逐渐压缩在欧洲的驻军,积极收缩反恐战线,将军事战略重心转至亚太,加强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企图在亚洲大陆边缘建立庞大的海洋联盟体系,以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南下与印度的东进可能在南海交会,从两洋方向形成“双弧”,日本与澳大利亚从西太平洋的南北两端构成“双锚”。俄罗斯推行面向太平洋的东方战略,着力强化东部战区和太平洋舰队的力量,积极加强

与印度、越南、蒙古的军事合作。日本明确将朝、中并列为首要威胁,更加依托美日同盟,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安全战略主轴。印度实行东向战略,在确保其印度洋利益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恐怖活动、生态灾难、疫病传播、跨境犯罪、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各国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些威胁的发生与发展,比传统安全威胁更经常、更广泛,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在不断加大加深。世界各大国军队更加强调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保持平衡,纷纷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发展反应更快、机动性更高、适应性更强的多样化军事能力。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广泛性和特殊性,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成为国际军事博弈和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

争夺新的战略空间成为各国军事发展的重要取向。人类发展进步的过程,在一定意义讲,就是从陆地向海洋、天空等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当前,各国加速向太空、网络、深海、极地等国际公共空间扩展利益和行动,国际公共空间已经成为各国战略争夺的热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企图垄断和控制国际公共空间,为后来者进入和利用国际公共空间制造障碍。为争夺新的战略空间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和预置,不仅是保障国家自由利用国际公共空间的重要支撑,也是争夺新的军事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受到世界各大国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第二节 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之际,根据世界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未来一个时期,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面临多种挑战的战略风险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把握机遇,化解挑战,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

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战略的选择。19世纪中叶以来,内忧外患的古老中国,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经百多年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实践探索,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跃升,国家战略重心从求存转向图强。我们正在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中国谋求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内建和谐社会,外促世界和平,这是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基本国情的重大战略抉择。实践证明,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言者、贡献者,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共同发展的宝贵机遇和广阔空间。从中国历史的纵深来看,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秉承中国以和为贵、敦睦邻里的历史文化传统,摆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避免国家陷入混乱、分裂或战争,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摆脱近代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循环,避免重蹈霸权战争的老路,走出一条与其他大国不同、与历史陈规不同、具有世界意义的崛起之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面对总体和平稳定与局部冲突动荡并存,发展与安全的机遇和挑战同在的客观形势,我们必须以发展求安全。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世界各国都发展起来了,才更有利于维护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以平等求安全。只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才能实现各国普遍安全。我们必须以互信求安全。各国只有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对抗,才能超越分歧、化解矛盾、管控危机,不断扩大战略共识,夯实维护安全的深厚根基。我们必须以合作求安全。各国只有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协商、全面持续的交流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努力寻求和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才能实现双赢和共赢,实现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保安全。我们必须以创新求安全。适应当今世界安全问题呈现出的多样性、传染性、联动性、突发性特点,摒弃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观念和陈旧的方式方法,牢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树立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新理念,不断破解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安全困境。

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就是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良好的战略环境,就是依靠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式拓展国家利益,就是以和平、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中国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这是我国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所在,决不容许受到侵犯和破坏。

二、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和平发展的前途光明,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就要牢牢把握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20年前,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基本战略判断。这种机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为中国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舞台。“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虽未发生质变,但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明显加快。霸权势力继续推行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操控国际事务的能力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导力量。国际体系内固有的南北矛盾、东西矛盾远未消除,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多种矛盾交织互动,各战略力量之间围绕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和重组。这就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扩大回旋空间,化解战略压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性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弊端,但它并不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历史进程的终结。相反,它预示着全球化和信息化将会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方式向纵深发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大国仍将致力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调整本国经济政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面临着新的重大调整,世界科学技术孕育着新的创新突破。这就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机会之窗。中国作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仍然能够有效利用资源、资本、科技、信息、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和平、合作、共赢的方

式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国家利益,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三是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营造安全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为自己赢得历史机遇的决定性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世界第一。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还是世界资本输出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分量不断加重的战略力量,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战略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各国普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对中国的借重和合作意愿大为增强。发达国家在解决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核扩散、气候变化等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对我日益倚重,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与我相互依存度加大。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与中国全面对抗的代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慑止其贸然侵犯我国核心安全和核心利益,也为我进一步争取主动,扩大国际影响,增强国际事务话语权创造了良好条件。历史证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大战略,中国只有发展了,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赢得与把握战略主动权。

随着今后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日趋明朗,世界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利益“共同体”,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合作与竞争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世界将延续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家间交流、对话、合作将不断深化,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不懈追求。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中国排除各种干扰,实行和平发展的条件继续存在,但与21世纪头10年相比,今后10年将面临更多困难,对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挑战

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是辩证的统一。当今世界,不同制度、不同

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其安全问题的内涵已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对峙平衡的安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同时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安全。面对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猖獗、防核扩散形势依然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等实际情况,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仍然任重道远。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调整,国家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国家利益的全方位拓展,国内经济社会的持续转型,决定了我国面临复杂、多元、多变的安全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互动,国际国内安全因素相互影响,发展危机重于生存危机。应当讲,我们既有远虑又有近忧。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沉着应对以下挑战: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新的战略遏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把防范欧亚大陆上重新崛起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大国作为基本国策。当前,美国战略走向正在进行新的调整。面对我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势头,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企图以接触和合作将我国纳入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加大牵制和防范我国崛起的力度,其对华战略中的遏制取向日益凸显。他们利用西化、分化、驯化等策略手段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利用“台独”“藏独”和“东突”分裂势力扰乱我国内部,利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向我国持续施压,对我国实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我国在海外开展的能源资源合作,企图迟滞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应当关注的是,美国加快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已经将战略重心转至亚太,实行“再平衡”战略,极力巩固与扩展亚太军事同盟,重点强化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并提出以中国为主要对手、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的“空海一体战”构想。综合起来看,未来中美两国战略互动将更加频繁,相互博弈,同时依存度也会日益加深,中美关系难以出现冷战时期美苏全面对抗那样的局面,但中美之间利益冲突和结构性矛盾难以完全化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遏制与反遏制、挤压与反挤压的斗争长期而复杂,难免出现“缓和—激化—缓和”的阶段性的循环。

周边地区安全风险和隐患增多。中国周边是世界各大战略力量

利益交会、矛盾纠结的地区,是冷战格局遗留问题最集中的地区,是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周边国家多达 29 个,总人口超过 25 亿,其历史、宗教、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也决定了中国周边关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近年来,域外大国加大插手力度,域内外大国加紧争夺地区主导权,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升温,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一些周边国家在分享我国经济发展辐射效应的同时,对我国的疑惧和戒备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海洋划界、岛屿归属、海洋权益等问题上日趋强硬,不断挑起冲突;一些域外大国利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挑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企图搞乱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多种因素交错叠加,增大了我国经略周边、稳定周边、和睦周边的难度。

台湾问题仍然长期制约中国内政外交大局。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2008 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政治对话渠道更趋多元,双方互动互信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纽带更加牢靠,但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阻力因素并没有根本性消除。“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图谋没有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再度猖獗。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改变,仍不断加大与持续实施对台军售。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成为牵制和消耗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战略资源的重大因素,成为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长远隐患。

维护国内社会大局稳定的压力增大。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 and 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逐渐突出,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矛盾更为复杂,粗放式发展导致资源环境难以承载。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以及“民运”分子和少数邪教组织等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怂恿下勾连聚合,不断进行渗透、分裂、颠覆、破坏活动。重大自然灾害、流行疫病和极端气候条件变化时有发生,危及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应对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可能引发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国际安全局势紧张特别是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都可能向我国国内传导,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在此背景条件下,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复杂性空前增加,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国家利益拓展面临日益增强的阻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制,对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形成制度性约束。世界战略资源能源大多被西方垄断集团所掌控,中国作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缺乏可靠的外部供给。世界主要战略通道为美国等大国所控制,中国海外运输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深海、极地、太空和网络空间被其他大国抢占先机,中国利益向这些战略空间拓展的难度、成本和风险增大。随着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我们所承受的战略风险也将不断上升,境外能源供给安全、战略通道安全、海外市场安全、海外资产和海外人员安全等事关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三节 全面履行军队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使命已经由革命战争时期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进入21世纪,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国防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新要求。为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党中央明确赋予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确立了建设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新目标,指明了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一、坚持科学发展,把握强军目标

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就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是:坚持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落实“五句话”总要求,统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统筹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统筹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统筹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着力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充分发挥广大官兵的主体作用,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①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从而明确了新形势下加强军队建设的聚焦点和着力点。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心,作风优良是保证。全军要准确把握强军目标的时代内涵和本质要求,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

^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203~20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指导下,与党的战略任务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相适应,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全面分析时代条件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完成党的三大历史任务,对我军历史使命作出了新的概括。

第一,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确保战略全局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要求和根本保证。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肩负着神圣使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挑拨离间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终目的就是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启示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巩固政权。只要我们党把自身搞得更坚强、更团结、更纯洁,紧紧依靠全国人民,牢牢掌握人民军队,就可以不惧任何大风大浪,就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安全航行。为此,必须把全面协调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作为党执政的重要战略任务,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做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军,引导官兵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军战斗力生成的深厚源泉,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的必然要求。

第二,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科学判断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今后10年,虽然仍属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我国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多,内外战略压力增大,风险和挑战更加复杂多变。这就需要着眼国家利益全局,坚决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妥善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等多种手段,继续精心维护好和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这就需要军队始终在大局下行动,把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摆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安全和核心利益,努力塑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注重预防危机、化解冲突、遏制战争,必要时敢于以战止战、控制战局、赢得战争。

第三,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正在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全球公共领域拓展和延伸。这些公共领域既是全球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宝库。少数大国正在加紧争夺全球公共领域的控制权,未来战场必将是陆、海、空、天、网多维一体的广阔空间。这就要求我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维护国家利益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在确保国内安全稳定的基础上,适应国家利益全方位拓展的趋势,拓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断提升在更大范围内维稳维权的军事能力。在关注和维护国家生存利益的同时,关注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在关注和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的同时,关注和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

第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我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国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努力实行包容性增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要素流通、产业对接、优势互补,以自身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以地区 and 世界的繁荣稳定增加自身发展的国际助力。我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我国发展的战略环境,既需要在政治、外交、经济上不懈努力,也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支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为更好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新的历史使命,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筹划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在科学分析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安全需求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是依据当今时代安全形势和安全观念的新变化,从确保国家综合安全出发对我军职能、任务作出的新规定,是立足于全面建设和长远发展,对我军战斗力的全面增长和整体优化提出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党的奋斗目标对军队使命任务的新规范,反映了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新需要,也顺应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历史使命,进一步拓展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职能任务,体现了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促进世界和平的有机统一,规定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提高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标准,充实了军事力量运用的指导原则。

三、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按照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我军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陆、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

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基于职能任务的历史性拓展，我军需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深化军队改革，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科学分析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准确把握军队的历史使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军队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是全面而有重点的，核心是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只有具备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维护国家核心安全和核心利益才有可靠的力量保证，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有充分的能力基础。我军必须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基点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筹划军队改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我军在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核心能力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并对相对和平环境下做好战争准备、提升军队作战能力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以战争能力为基础，但又具有其特殊的生成和运用规律。应切实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放在军队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中加以科学筹划和实施，瞄准多领域、多空间、多方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需求，从实际出发，积极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专业力量建设，并将其有机融入全军作战力量体系之中，做到平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抓好针对性训练、专业人才培养、技术装备保障以及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工作，努力使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能够胜任各种急难险重任务。

第四章

当代战争的发展与我国可能面临的战争

认清战争发展趋势,是筹划指导战争准备、加强武装力量建设的依据,也是创新作战方法的基础。只有认清战争发展趋势,才能结合对现实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分析,准确地判断我国可能面临的战争及其基本样式,并预做针对性准备,力争先胜,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第一节 当代战争发展的主要动因

战争从来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特性。影响战争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战争的发展演变,是当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的深刻反映。特别是当代世界政治和科技发展的本质特性,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战争发展的趋向。

一、政治需求是当代战争发展的根本牵引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政治特性,亦即一定利益集团在一定阶段政治利益的特性,决定着战争目的、性质和方式,规定着战争的演变趋势,并深刻影响着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军队的结构与形态。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殖民与反殖民战争绵延不绝。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扩张及其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导致侵略征服和占领他国的政治需求增大,战争规模也随之扩大到世界范围。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政治集中表现为列强争霸,争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以及对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政治目的呈现典型的无限性特征——彻底消灭敌方军队,占领敌方领土,征服敌方民众,最终迫使敌方无条件妥协或投降。与之相适应,战争工具——包括军队和武器——借助工业化大生产达到空前规模,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与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武器应运而生。政治目的无限性导致了战争的无比惨烈和空前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动摇了近代全球殖民体系。战后,国际格局迅速演化为两极格局,国际社会分化为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国际政治呈现两大阵营对抗特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机制不断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确立并不断发展,主权国家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确立以及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机制逐步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各种导致战争的矛盾冲突,制约了大规模侵略征服战争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的风险和代价空前上升,美苏之间谁也不愿与对手打两败俱伤的大规模战争,竞争策略由以战求胜转为综合制胜,从而出现了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期间的局部战争尽管起因于领土、民族、宗教等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但都是在美苏对抗的战略背景下发生的,一些局部战争具有典型“代理人战争”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受到两极政治的影响和制约。没有一场局部战争是美苏两强迎头相撞的,所有可能导致美苏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局部战争都受到强有力的战略控制,避免了无限制升级。

这一时期,战争政治目的对战争军事手段的直接制约日益凸显,政治要求对技术发展的规定性更为严格。伴随核武器的快速发展,核恐怖、核均势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战争规模无限扩大的发展趋势。核武器最初问世时,不少人相信它能够带来更大的作战效率,加快战争进程,避免那种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很快人们就对其不可控的影响范围和不可控的遗留后果有了深刻的了解。核武器的终极毁灭效应,使人类社会的战争目的与战争手段陷入了极大矛盾。武器杀伤威力的无限性,反过来要求对战争的政治目的加以明确限制,避免因

战争政治目的无限性带来核大战灾难。美苏经过核军备竞赛达至核恐怖平衡之后,不得不面对核大战没有胜利者,并将造成“核冬天”的残酷现实而作出新的战略选择,主动控制使用核武器的战略冲动,转而依靠打核威慑背景下的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达成有限的战争政治目的。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两极”国际战略格局转换为“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美国取得“全球领导地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国家。20多年来,美国一方面享有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和平红利”,另一方面依靠巨大的军事优势先后打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四场大规模局部战争,2011年又在幕后主导英法等北约国家打了利比亚战争,促动了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地区的动荡与混乱,至今仍在持续发展中。这些战争和动乱折射出“一超多强”格局下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是当代国际政治博弈斗争的集中体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当代战争的根源。尽管美国打着维护地区秩序、防止人道主义灾难、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和反恐等旗号发动或参与战争,但其以战争手段扩张和巩固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控制欧亚大陆,平衡欧亚大陆各大战略力量、防范欧亚大陆的大国冲击其霸权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设计。通过战后的政治运作,美国分别在西欧和东亚取得了稳固的战略桥头堡,冷战结束后通过几场战争,美国又抢占了巴尔干—中东(北非)—中亚这个“动荡之弧”上的地缘战略要点,从而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实现了对欧亚大陆的战略瞰制。

第二,输出“民主”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战争的重要政治目的。美国始终自视为西方现代民主的“山巅之国”,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式民主”作为追求绝对安全、巩固世界霸权的终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赤裸裸地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美国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机完成了对德国、日本的民主

化改造,又以冷战促成苏联政体崩溃,从而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冷战结束以来,当非西方国家发生动荡冲突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以各种形式实施干涉,甚至不惜以战争输出民主,动乱—干涉—战争成为其战略三部曲。科索沃战争、利比亚战争便是这样的典型。

第三,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导致西方国家战争政治目的呈现扩大化趋势。苏联的解体,直接导致两极制衡这个冷战时期制约战争升级的最大政治因素不复存在。美国一方面避免与大国特别是核大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对抗,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武力不断发起以大打小的低风险战争,修正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确立起来的有限战争原则,动辄以推翻对方政权、消灭对方最高领导人、控制对方全部国土和资源为战争的政治目的。战争政治目的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速战却难以速决,占领却难以控局,无法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势,难以从长期战争泥潭中妥善脱身。当前,美国迫于自身经济危机和为应对新兴大国崛起进行战略调整,明确将其战略重心调至亚太。从战略全局上看,美国急于摆脱10年“反恐”战争的沉重包袱,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过分依赖硬实力的战略取向,但只要其“一超”国际地位特别是超强军事实力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依靠武力乃至战争谋求霸权利益的战略取向就难以受到完全制约。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虽然出现了大变革、大调整、大动荡的局面,但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逆转。世界联系空前紧密,各国利害深度交织,合作中有竞争,协调中有斗争。大国特别是有核大国之间军事确保相互摧毁、经济深度相互依存的格局进一步凸显。大国之间战略博弈,不在于以战争手段彻底摧毁对手,而是谋求新的战略控制和威慑态势,逼压对手顺从或者不公开反对自己。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领土、民族、宗教、海洋权益、能源资源、意识形态等矛盾引发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大

战不起,小战不已,动荡不宁,成为当今世界战略演进的基本态势。

二、科技发展是当代战争发展的重要驱动

科技发展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重要动力,当科技出现革命性进步时,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就会接踵而至。20世纪中期,世界进入一个新的科技大发展周期,微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蓬勃兴起。高新科技相互交融,相互促进,逐步汇聚成信息技术革命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新的信息产业茁壮成长,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信息网络迅速覆盖全球,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新格局,人类社会加速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迈进。有史以来,人类用什么技术制造工具,就用什么技术制造武器;用怎样的方式生产,就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战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推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信息文明所缔造的社会结构、制度和理念,为当代军队建设和战争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范式。

信息化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战斗力生成模式。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战斗力生成的三大要素。从冷兵器战争到热兵器战争再到机械化战争,战斗力生成主要依靠物质和能量两大要素的扩张来实现。机械化战争是物质、能量主导型战争的高峰,工业时代大规模的能源开发、机器生产和人口增长,使火力、机动力、兵力等物质性和能量性的战斗力要素空前凸显。装甲集群闪电突击、航母编队远程奔袭、大机群战略轰炸等,无一不是把具有杀伤性的物质与能量尽可能多、尽可能猛烈地投射向敌方。军队规模的大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主战平台的多少,成为衡量战斗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信息化使得战争中物质、能量、信息三者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物质和能量虽然仍是战争的重要资源,但在战斗力生成与发挥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信息从辅助性要素转化为统领物质与能量的主导性要素。军事信息系统取代机械化作战平台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中心和倍增

器,“信息流”引导“物质流”和“能量流”,“信息链”支持“指挥链”并控制“打击链”。战斗力生成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直接推动力,以信息化武器装备建设为基础支撑,以基于信息系统的综合集成为基本途径,以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和教育训练改革创新为重要保障,实现了由要素增长向综合集成的转变,由规模扩张向体系优化的转变。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军队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共同取向。信息化使战争主体具备多维度侦察监视能力、自动化指挥控制能力、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远距离高速机动能力、全时空信息攻防能力、高灵敏防护能力和聚焦式伴随保障能力,这些能力相融合形成了高效的整体作战能力。

信息化从根本上改变着战争制胜的机理。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迫使敌人屈从己方意志。战争的军事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曾指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①在传统战争中,为达成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囿于战争手段的限制,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消耗敌人物质基础,作为剥夺其抵抗能力的基本途径。由于消耗是相互的,在消耗对手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耗自己,甚至因自身消耗过大而不得不放弃对胜利的追求,或者因自身所承受的消耗相对于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过大而作罢。一个强大的国家可能消耗得起物质与能量,但消耗不起生命与意志;消耗得起经济与军力,但消耗不起政治与信誉。随着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战争将可以不经过大量歼灭敌方有生力量而取得胜利,将通过控制和瘫痪敌人的体系、使敌人丧失整体抵抗能力而实现战争的目的。战争方式的新变化,孕育新的制胜机理。敌人的领导机构、指挥控制中心、信息枢纽等体系的重心成为打击的首要目标;战略、战役、战术行动融为一体,通过对要害目标特别是首脑目标的精确打击来直接达成战略目的;广泛实施非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对称、非接触、非线性作战,直接对全纵深目标实施同步打击,不给敌人以调整、适应的时间余地与空间余地;实体打击与心理震慑相结合,以实体打击增强心理震慑的力度,以心理震慑扩大实体打击的效果。与歼灭敌人、消耗敌人的传统制胜机理相比,信息化战争中控制敌人、瘫痪敌人的制胜机理更加接近于战争的本原目的。

第二节 当代战争的基本特点

世界大国进入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期和武器装备升级换代期,核、天、网等领域的军备竞争日趋激烈,新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信息化战争形态向更高更成熟阶段演进,信息化战争的特点更加显著。

一、体系对抗成为交战双方基本对抗形式

信息化战争不再是各个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力量之间的对抗,全要素全系统的体系对抗正在成为现实。由于当代战争中军事与政治、经济、法律、舆论等领域的关联性更趋紧密,战争胜负不仅直接取决于作战体系效能的高低,更取决于战争体系效能的高低,因而体系对抗既包括作战体系的对抗,也包括战争体系的对抗。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体系和战争体系内部各个子系统紧密相关,每一子系统的运行与功能都受到相关子系统的联动性影响,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直接决定整个体系的功能,既可以实现“ $1 + 1 > 2$ ”的整体效应,也存在“ $2 - 1 < 1$ ”的衰变隐患。体系对抗的实质是,从战略高度把敌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针对其作战体系和战争体系的要害实施精确打击,引发其体系破损联动,使其体系的完整性、稳定性、均衡性急速下降,进而造成其结构瘫痪、程序紊乱、功能衰减。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军在历次局部战争中不再把消灭对方军队作为首要任务,而是从一开战就注重充分发挥自身体系优势,直接打击对方体系重心目标,借以提升作战效能,加快战争进程,控制战争风险和代价。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的地面有生力量虽然没有遭受重挫,但其作为南联盟作

战体系的优势功能被彻底限制和剥夺了,处于无用武之地,这就是体系对抗带来的结果。

二、中远程精确打击成为决定性作战样式

从尽远距离上打击敌人,从而更好地保存自己,历来既是战术追求,也是战略追求。当代战争沿着信息化和机械化两个维度复合发展,信息化维度上的精确、可控、智能,与机械化维度上的更远、更快、更强相结合,使陆、海、空、天、网一体的中远程精确打击日益成为决定性作战样式,中远程战略打击力量与精干、灵巧、多能的联合部队相结合,正在成为军队转型的新趋向。从冷战结束以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践看,优势一方大量运用远战兵器实施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全纵深精确打击,对手如果缺乏相应的中远程攻防手段,即使拥有庞大的机械化部队也没有多少还手之力。美军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未来远程打击能力,将远战系统由陆地、空中、水面,向太空、网络和水下拓展,将持久监视、电子战及包括穿透型平台和防区外武器的精确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支撑美国兵力投射。同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向国防部提交《保持美国远程打击战略优势》报告,建议更新发展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发展涵盖陆、海、空、天、网五维的远战能力,确立“全球闪击”的远战优势。我国周边大国也纷纷确立远战制胜的战略理念,竞相发展以新一代战机、航母、核潜艇、导弹及太空武器、网络武器为骨干的中远程进攻作战力量。

三、网络聚能成为作战行动重要支撑

依托利用网络化的军事信息系统实现作战体系的聚能增效,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取向,作战行动正在从工业时代的以平台为中心向信息时代的以网络为中心转变。一些强国军队通过将侦察预警、指挥控制、联合打击、综合保障等系统链接成网络,实现态势感知共享,形成更高的指挥速度、更快的作战节奏、更精准的打击、更强适

性的生存能力,以及各参战力量一定程度的自主协同。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军借用“网络中心运算”商业模式,率先提出“网络中心战”概念,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加以实战运用。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首次利用网络将空中作战飞机、无人机和地面特种部队链接为一个整体,由抵近敌人的特种部队人员为空中打击实时提供目标指引,对塔利班武装、“基地”组织那种分散隐蔽的小股作战力量和洞穴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使清剿进程大为加快。2012年,美国国防部发布题为《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防务优先事项》的防务指南,提出“采取措施在网络化战争中推进军队国防建设”,“建立一支全球、联网和全频谱联合部队”。可以预见,在未来战争中网络化军队、网络化战场将日趋普遍,无网不成军,无网难战胜。

四、信息火力一体成为主要作战手段

在信息化战争中,信息软杀伤和火力硬摧毁相得益彰。一是信息战成为先导性作战,并贯穿战争全过程。海湾战争以来,美军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初战模式,即针对对方的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和防空雷达系统,率先实施网电一体的高强度信息攻击、干扰和压制行动,在短时间内陷其作战体系于“看不见、听不清、联不上”的状态,为后续火力打击创造条件。美军最新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构想,明确将致盲对手作战网络列为首要作战行动,包括破坏对手的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超视距雷达和地基情报、侦察、监视节点,机载情报、侦察、监视传感器和通信中继平台,海上情报、侦察、监视及通信链接;部署区域电子战和作战欺骗平台,干扰、诱骗、阻塞对手的情报、侦察和监视系统。二是信息主导火力,使火力打击更加精准、效果倍增。据统计,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其弹药使用量的0.2%,海湾战争中为8%,科索沃战争中上升为35%,阿富汗战争中则高达60%以上。海湾战争中,美军只有大约10%的作战飞机具备投射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几乎所有的美军作战飞机都安装了用于精确打击的目标系统、数据链和导航定位电子设备,能够

投射多种精确制导弹药。

五、作战空间由三维向五维拓展

继传统的陆、海、空战场之后,太空和网络空间日益成为重要战场,陆、海、空、天、网五维一体的大范围、高立体、有形与无形相交织的新型战场空间正在形成,战场制权由制陆、制海、制空向制天和制网延伸。太空已经成为战略制高点,天基信息支援和保障系统是打赢信息化战争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美军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100%的导航定位和90%以上的通信都依靠卫星来实现。美、俄等军事强国都在大力发展军用航天技术和空间武器系统,加强太空战场建设。美军着力研发以太空为作战路径的“全球快速常规打击系统”。俄军组建空天防御部队,构建统一的国家空天防御体系。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第五维”战场。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军就开始发展网络空间作战专业力量,2009年组建网络空间司令部,2011年制定《网络空间军事行动战略》,目前拥有网络空间作战相关力量8万~9万人,正在着手研发“网络飞行器”“数字大炮”“舒特系统”等新型网络攻击武器,大力发展“国家网络靶场”“网络空间安全数据中心”等网战项目,开展多层次、多方式的网络攻防对抗系列演习。美军参联会2012年制定《联合作战进入构想》,提出“跨域联合”概念,强调联合的重点是太空与网络空间等新兴作战领域,各军种的行动均要实现与太空、网络空间的联合。俄军将网络战称为“第六代战争”,认为网络已经成为可以直接毁伤敌人的强大手段。未来战争可能首先从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攻防对抗开始,抢夺制天权和制网权将成为取得战场综合制权、进而克敌制胜的关键。

六、作战节奏凸显以快制慢

战争史上无论速决还是持久,时间都是一种重要的“武器”。人们总是依据不同的情况,予以具体运用。信息化战争更加强调时间

控制,更加追求时间效益。战争手段的信息化为加快作战节奏、缩短战争进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认为,以往的战争哲学是以大吃小,今天的战争哲学是以快打慢。交战双方都力争缩短己方的“感知—决策—行动”周期,延长对方的“感知—决策—行动”周期,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将决策优势转化为行动优势,尽可能感知在前、决策在前、行动在前,破坏敌人的作战节奏,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把时间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军完成“发现—定位—打击”过程所需时间,已从海湾战争的100分钟、科索沃战争的40分钟缩短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10分钟左右。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尝试“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注重速度、精度和强度相结合,优先攻击时间敏感目标,对于没有时效性或时效性不强的目标则予以搁置和跨越,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主要作战行动。其地面部队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实施“蛙跳”式进攻,向伊拉克的心脏——巴格达高速推进,沿途对伊军把守的若干重要城镇置之不顾,在3周内一举攻入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传统战争中往往先以空间来换取时间,依靠持久消耗来实现敌我实力的消长、优劣的转换,进而恢复对先前失去的空间的控制。而在信息化战争中,时间控制与空间控制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时间维度上的高速度快节奏,能有效压缩敌人的防御空间。空间维度上的全纵深同步打击,又能有效节约作战时间。时空的双重控制和挤压,始终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剥夺其调整部署、增强战力、适应战争的条件和机会。

七、“无人、无形、无声”战争初露端倪

从发展趋势看,作战体系在精确化、远程化、网络化的基础上,将加速向智能化方向演进。智能技术、无人技术、隐形技术与其他新概念技术相融合,将可能使未来战争呈现“无人、无形、无声”的新特征。采用智能、纳米、微型机械等技术的无人作战系统,在陆、海、空、天多维战场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采用隐形、迷盲、干扰、变轨等

技术的侦察—打击兵器,使对手越来越难以发现、规避和防范。采用电磁、激光、生物等技术的新概念武器,使机动、打击等高分贝军事行动变得无声无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首次使用“捕食者”无人机加挂“海尔法”激光制导弹进行空袭试验,2008~2010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广泛使用无人机分别实施精确打击,在利比亚战争中投入70余架无人机实施精确打击。近年来,美军加紧研发装备无人、无形、无声武器,已拥有B-2、F-22、F-35等世界最先进的隐形战机和1万多架无人机,正在研制试验X-37B无人空天飞机、X-47B舰载无人隐形攻击机、X-43A无人攻击机、“蜂鸟”无人反坦克直升机、K-MAX无人运输直升机、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新型隐形舰艇、无人潜航器以及电磁炮、高能激光、微波等新概念武器。放眼未来,由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兵器构成的无人作战系统将部分取代军队中的有生力量,无人、无形、无声的作战平台与打击兵器将日益在战场上大量使用,这必将带来作战理论、作战样式乃至战争形态和军队结构的新一轮革命性变革。

第三节 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

古往今来,忘战必危。只要战争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军队的核心使命就是准备和实施战争。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内建和谐社会、外促世界和平,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环境有望保持总体稳定。但是,战争威胁始终存在,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充分准备。

准确判断战争威胁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起点。尽管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打不起来,但天下还不太平,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突出,争霸与反霸、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以及围绕战略要地、战略资源的争夺仍将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更加尖锐激烈。

中国的快速崛起招致霸权势力的遏制与挤压、部分国家的疑惧与防范；国家利益的全方位拓展遭受多领域多空间的阻力、摩擦甚至冲突；与周边一些国家的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复杂难解并时有激化的趋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重道远，“三股”势力不断兴风作浪。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仍然面临多种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

由于对象不同、引发冲突的诱因不同，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战争的性质、类型和规模也各不相同。从现实和长远看，主要将面临四类战争（军事）行动：

大规模、高强度的防卫战争。在我国和平发展的关键阶段，不排除霸权国家以迟滞或打断我国崛起进程为目的率先挑起战争。战争的起因可能是危机失控，逐步升级，也可能是预有图谋，突如其来。此类战争爆发概率低，但危险指数高。

较大规模、较高强度的反分裂战争。在我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不排除“台独”势力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一意孤行，越过我《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红线”，我被迫以武力打击“台独”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将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军事仗，并须高度防备外敌军事干预。此类行动危险指数与爆发概率均较高，是我军事斗争长期准备的目标。以上两类战争（军事）行动，将是在信息化条件下进行的高端局部战争。

中小规模、中低强度的自卫反击作战。这是针对周边主要对手挑起的信息化条件下中端类型的局部战争。一是因岛屿被侵占、海上划界纠纷激化、大量海上油气资源被掠夺，在海上方向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二是因陆地边界划界问题引发的边境反击作战；三是由邻国政局不稳，爆发战乱引发的边境封控作战行动。此类行动危险指数与爆发概率均为中等，但有上升的趋势。

小规模、低强度的反恐、维稳、维权作战行动。这是较低等级的战争（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具有对抗性的行动与之紧密相关。一是“三股”势力策动恐怖袭击和骚乱暴乱，为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我采取反恐平暴作战行动。二是境外国家利益、战略通道、侨民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暴力威胁,我采取防卫的境外军事维权行动。

综合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敌对我发动大规模地面入侵战争的可能性甚微,而对我实施空海、空天、网空高端战争的危險正在上升;东部战争威胁重于西部战争威胁,海上方向战争威胁甚于陆上方向战争威胁,太空、网络空间战争威胁日益成为现实,境外军事维权乃至有限作战行动几率增大;最严重的战争威胁是强敌发起的旨在摧毁我国战争潜力以迫我就范的大规模战略突袭,最可能的战争威胁是海上方向的有限军事冲突,最需要重点准备应对的是核威慑背景下海上方向较大规模、较高强度的局部战争。

根据我国面临的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我军在未来一个时期,要坚持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为核心,遂行作战、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三种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方式。主要作战行动包括:信息攻防对抗、联合火力打击、防空反导作战、海空封锁作战、夺控岛屿作战、区域拒止作战、边境反击与封控作战、太空攻防对抗作战、网络空间攻防对抗作战。主要军事威慑行动包括:核威慑、常规威慑、太空威慑、网络空间威慑、核常一体威慑。主要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对抗性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反恐平暴、打击海盗等)、执法性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国际维和、国内戒严等)、救助性非战争军事行动(如抢险救灾、护侨撤侨等)、合作性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国际联合军演等)。

关于作战对象。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战争威胁的多样性,决定了未来我军要面对多种作战对象。根据威胁的轻重程度,可以区分为主要作战对象和一般作战对象。根据威胁的缓急程度,可以区分为现实作战对象和潜在作战对象。霸权国家正在针对我国加强军事准备,相应的作战构想、力量部署、战场建设、装备发展、训练演习等正在展开实施。它有战略意图也有军事能力对我动手,缺的是定下决心的时机。战争的残酷性、危害性决定了军事战略的严肃性,要求我

们的战略筹划和指导必须立足复杂困难情况,不能对现实和潜在的重大战争威胁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未来无论强敌对我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或直接发动战争的概率有多大,我们都不能心存半点侥幸,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有充分战争准备和强大军事能力的基础上,而不能放在强敌不来、不进行干预或者不打的判断上。强敌对我动不动手、如何动手、何时动手,均不取决于我主观上是否以其为对手,而取决于其对战争风险和代价的权衡。我战争准备越充分、军事能力越强,强敌才越不敢对我贸然发动战争。

关于作战样式。传统的陆战近战在新的战争条件下已经难以有效实现作战目的,必须适应新的战争形态特征和新的军事行动空间特性,针对现实和潜在的主要作战对象,结合未来主要战场的综合环境,立足未来一个时期自身军事能力的可能发展,确立既能体现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共性规律,又能充分发挥我军战力优长的新作战样式。注重攻防兼备,在强化本土防卫作战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依托本土的多维联合远战,发展有我军特色的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作战样式。紧密跟踪世界强国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力量和打击手段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打无人机、打隐形飞机、打巡航导弹、打航母编队、打天基平台,以及防侦察监视、防精确打击、防网络攻击、防外空打击、防新机理打击的系列战法。

关于战略方向。威胁和对手的多元,决定了未来我国战略方向的多元。可能面临战争的主要方向是东部和南部海洋方向,在这个方向上现实和潜在的作战对象最为突出,威胁也最大,特别是存在强大的敌性军事联盟。东部和南部濒海地区是我国人口、城市、工业、交通、贸易集中的区域,包括首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核心地区都在这个区域内,实际上是国家战略重心所在。而这一地区在防御海上方向威胁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手可以在海上从北到南对整个沿海地区灵活选择攻击目标。在面对强敌时,我需要在整体防御的基础上牢牢掌控敌必攻我必守的关节点,需要实施顽强的内线防御并结合发起强有力的外线出击,以图在被动中争取和把

握主动。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决定了未来战争中战略方向的涵盖面更加宽广。同时,在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作战的新环境中,作战力量的大范围快速投送和机动,特别是考虑到太空、网络空间攻防对抗的情况下,敌人可能从陆、海、空、天、网多个维度实施进攻,因而对战略方向的划分需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变性。从历史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打的多场局部战争,几乎都是在当时的次要战略方向上发生的。这就要求在加强主要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统筹兼顾其他各个战略方向,从而确保战略全局的稳定。

关于战略空间。“五维一体”的新型战场空间的形成,使战略空间的确定成为军事战略的重大问题。确定战略空间取决于自身的战略任务、作战目的要求,也取决于作战对象及其作战力量空间分布的特点。面对拥有巨大海空力量优势和太空、网络空间技术优势的潜在对手,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无疑将是我军未来防卫作战的战略空间。为确保战时本土安全和维护平时国家利益拓展,需要考虑依托本土适度拓展防卫作战及其他军事行动的空间,扩大积极防御的战略纵深。为有效摆脱对手制约、力争主动,应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的空间优势,在同度空间较量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异度空间的对抗,形成非对称的空间制衡态势。比如,在与海上方向强敌抗衡时,充分发挥我国土辽阔和地形多样的条件,形成倚陆制海、以海制洋的战略布势。

第五章

丰富与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军事斗争实践的发展,要求军事战略必须与时俱进。我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适应战略形势和军事斗争任务的变化,适时赋予其新的内容,明确新的要求,始终保持其时代特色和战略活力,是我军的一贯做法和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据此,我们在继续坚持积极防御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充实积极防御新的时代内涵,提高其针对性和适用性。着眼有效应对战争威胁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战略需求,着力处理好稳内与御外、攻与防、战与控、战争与非战争等重大关系,突出“推前沿、谋控局、多样化”的战略功能取向。在发展本土防御战略指导的基础上,强化对依托本土的攻势行动的战略指导。在筹划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军事力量的战略控制功能,维护并延长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继续保持“战之方略”核心功能的同时,着眼军事力量平时多样化运用的需要,丰富发展对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

第一节 实行前沿防卫

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历经多次调整,但总体上

仍然属于国土防御型战略。面对世界军事发展的新变化,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新位势,以及军队新的历史使命,军事战略在内容上需要突破单纯守疆卫土的传统战略思维,积极稳妥地实现从国土防御到前沿防卫的拓展。

一、历史地看,前沿防卫与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并不相悖

革命战争年代,在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反“围剿”作战中,提出了战略内线与战略外线的配合问题,强调注重在内线防御的同时实施外线进攻作战。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战略外线的进攻作战就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作战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防御的战略前沿实际上呈现渐进扩展的趋向。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就提出过战略追击、远战歼敌的构想。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搞中程导弹,打一千五百公里、二千多公里……假如我们能够造一种炮,隔一千五百公里、二千多公里能打到敌人那多好。”^①同年7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依靠我国有利的地形,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就可能把进攻的敌人主力歼灭在海岸和海上,不许敌人主力深入我国国土,并且还要在敌人发动进攻的基地上给以打击。”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特别加写了一句:“在歼灭了侵略的敌人主力之后,采取追击的战略,进而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的侵略武装力量加以解除,借以根绝侵略后患”^②。80年代初,中央军委将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重新恢复为“积极防御”,实质上也把积极防御特别是在战争初期的战略重心前推到了沿边沿海区域。当时的军事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7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学院院长宋时轮在写给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建议的信中,深刻阐述了这一重大调整的基本考虑。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我国沿边沿海有屏障为依托,而且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要地也处在战略前沿地区;二是战争样式有新的发展,更多地出现局部肢解战争、代理人战争、速打速撤的战争……如果搞诱敌深入,就适中其下怀;三是在全国总的方针转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家底日益增大,有些重要建设项目还处在战略前沿或战役纵深地区,不经反复争夺而轻易放弃,则对战争弊大利小。^① 所以,积极防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战略理念,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将其等同于单纯的国土防御。从发展趋势上看,支撑国家利益全方位拓展,打赢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我们在战略上都有必要确立前沿防卫的指导思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战略目标。安全、稳定、持续地拓展国家利益,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途径。历史上大国利益的拓展,多以武力和战争为手段,多表现为对他国主权空间的侵占和掠夺。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利益的拓展是和平的拓展、合作的拓展、共赢的拓展,是以经济交往和文化交融为主要方式的合理合法的拓展。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不会遇到阻力,不会引发矛盾和冲突。相反,随着我国国家利益拓展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西方主导下的国际规制束缚就会日益凸显,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地缘压力也将日益上升,不排除因利益冲突难以调和或者国家境外利益面临重大威胁,而需要以灵活方式使用武力的可能。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不断向周边和世界扩展,不断向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延伸。大国博弈归根到底是围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未来这种竞争将越来越聚焦于对海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全球公共空间的争夺和

^① 参见《宋时轮军事文选》,第242~24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控制。在此背景下,我军必须拓宽军事战略视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加速发展,基于信息系统的陆、海、空、天、网多维远战日益成为主要作战形式,作战行动呈现远程化、快速化、精确化、智能化的特点。世界军事强国和周边一些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以新一代航母、飞机、导弹、潜艇、无人化武器、天基信息和武器平台等为骨干的信息化远程作战体系,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陆、海、空、天、网多维远程作战能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面临大规模入侵特别是陆上入侵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主要战争威胁已经从传统的内陆方向转到海洋方向,威胁的主要方式已经由传统的陆上入侵,转变为空天、空海、网空一体的非接触打击,我国土纵深将置于敌中远程火力覆盖之下。特别是强敌将凭借其海洋方向的综合远战优势,从较远距离威胁我本土,企图使他打得着我,我够不着他,平时对我保持威慑,战时快速破击我作战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本土守本土、就近海守近海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守不胜守,因而必须考虑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外向防卫作战。

二、实行前沿防卫,需要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

当前,基于国土防御的战略方向划分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要从根本上回答未来仗在哪里打、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力量体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布局等重大问题,都有必要在空间范围上作出更加宏观、更具前瞻性的总体筹划。突破“局囿于陆、平面展开”的传统战略空间观,确立“内外兼顾、多维立体”的新型战略空间观,由本土向周边、由陆向海、由空向天、由有形空间向无形空间外推战略前沿,扩大战略纵深,逐步形成拱卫本土、辐射周边、兼顾物理和虚拟领域的新的立体战略空间,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平时支撑利益拓展,出现危机时能够有效应对,战时采取攻势防卫。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考虑将战略前沿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的沿海沿边地区向外延展,形成涵盖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有限区域的弧形战

略地带。在新的战略空间构想下,战略方向划分和战区设置也应有新的考虑。可扩大单个战略方向的空间涵盖,境内与境外结合,陆地与海洋兼顾,立体向天拓展。内陆战区向境外作必要的辐射延伸,沿海战区向海洋方向拓展延伸。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置独立的海洋战区,以更好地统筹挺进海洋、经略海洋。鉴于太空、网络空间日益上升的防卫需求,未来战略方向划分和战区设置,也应把太空和网络空间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三、实行前沿防卫,需要在稳固防御的基础上突出攻势作战

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取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而不是采取防御还是进攻的军事行动。战争的军事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强调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他纯熟地运用防御和进攻这两种基本手段,在战略上采取防御,而在战役战斗上则强调外线速决的进攻,包括某些方向上的运动防御。毛泽东从根本上认识到,防御和相持都是为了积小胜为大胜、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态势,为最终以战略进攻消灭敌人、赢得战争彻底胜利创造条件。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我军实行的积极防御,既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也包括战略进攻与战略追击。解放战争后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都属于典型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条件下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作战的发展,进攻和防御的结合日趋紧密,界限日益模糊,大国军队越来越注重攻势作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西南边境领土争端问题上,对手都是既得利益者,背后又都有复杂的国际因素,从根本上讲我不能待敌来犯,只有具备战略攻击能力、营造战略攻击态势,必要时采取战略进攻行动,才有可能打破对我不利的僵局,为政治上解决问题开辟道路。因此,我军在坚持战略上后发制人的同时,还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把战略进攻作为积极防御的重要作战类型,特别是要高度重视海洋方向上的诸军兵种联合的较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

四、实行前沿防卫,突出进攻作战的战略需要,应把依托本土的联合远战作为重要作战形式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利益拓展以周边为枢纽,与外部冲突纠结于周边,与战略对手较量的主战场在周边,面临的威胁也主要来自周边特别是海洋方向。我军传统的以地面力量为主的近战,已难以对周边之敌特别是强敌构成强大威慑,也难以在周边特别是海洋方向维稳维权,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必要时能将作战行动扩展到本土之外,在周边一定范围内实施远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军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尤其是二炮和海、空军建设步伐加快,太空和信息领域的对抗能力明显增强,为我军实施一定条件下的远战提供了能力基础。但相对于世界军事强国,我军远战能力特别是空、海远战能力总体上还很有限,战略空军和远洋海军的建设还处于爬坡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在远离本土的区域,与对手进行对称性的较大规模的空、海战。应充分考虑发挥我国土面积广袤、地形复杂多样,以及面向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弧形突出的地理优势,利用国家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并向周边辐射的有利条件,一旦局势失控,实施以大陆和近海为战略内线,慑控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战略外线的作战。核心是依托本土,不远离本土,利用部署在本土和近海的远战兵力兵器,对周边地区敌重要目标实施陆、海、空、天、网、电多维一体的外向攻势作战。以二炮、空军、海军和军事航天系统为力量主体,以非接触的中远程火力打击为主要作战行动,辅以有限海空精锐兵力的前出袭扰,从尽远距离上打击敌人,拒止敌对我纵深的打击,并对敌构成有效威胁和毁伤。在战法上体现为多维的聚焦突击和软硬复合破击,以大范围分散部署提高远战兵力兵器的生存能力,以多方向、多维度动态的聚焦突击提高远战杀伤效能,以火力打击为主并辅以必要的空间、网络和电磁攻击,对敌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关键战力及后勤补给系统的高价值目标实施选择性毁伤,有效破击敌作战体系。

依托本土的联合远战,实质是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与我国阶段性战略定位和军事能力相匹配的战略构想。其基本着眼点有三:一是非对称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在对手的强项上与之较劲,而是充分发挥本土广袤空间的屏护作用,发挥国家综合保障的系统优势,整合聚优我军不断提升的远战能力,弥补我军战略防护、战略投送和境外保障能力的不足,扬长避短,克敌制胜,实现倚陆制海、倚海制洋的战略目的。二是慑战一体,其魂在战,其用在控。依托本土的联合远战不是要与现实和潜在的对手早打大打,根本的是立足长远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慑止战争,控制局势。未来我军只有做好在第一岛链以远遂行较大规模联合作战的充分准备,才能在与强敌力量对比总体不平衡的态势下争取局部的均衡,也才能为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创造军事上的条件。三是重在战略牵引,提升能力,推动转型。以依托本土的联合远战作为未来我军在信息化条件下遂行高端战争的构想,能够为我军实现体系再造和能力重塑提供强有力的作战需求牵引,从而加快推动我军实现由国土防御型向前沿防卫型军事力量的历史性转变。

第二节 突出有效控制

战争是政治,和平是更大的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战略机遇期,保障国家利益拓展,要求军事战略在保持“战之方略”本质、坚持以打赢战争为核心不动摇的同时,将视野由战争向和平延伸,统筹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两种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战略需求,高度重视经营和平,谋势控局,慑敌制胜。因此,应把“有效控制”作为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要理念。

一、突出有效控制的基本考虑

控制历来是战略的精髓。孙子兵法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全国

为上,攻城为下。^①其基本的指向就是追求控势谋胜。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战争是为了“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②毛泽东指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③这都表明,从战争本质上讲,它是有控制的暴力,而不是无限制的毁灭。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目的与手段陷入悖论,战争手段的毁灭性反过来要求约束战争目的的无限性,战争控制的理念在大国军事战略中日益凸显,他们企图在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之间增加新的战略选择,把可控武力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的理想工具,限制战争、控制战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西方军队的有限战争理论,还是苏联军队的局部战争理论,都体现了自觉能动的战略控制思想。

把有效控制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理念,符合当今我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方位。我国正处于富国强军的关键阶段,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战略能力特别是境外军事行动能力仍然有限,国际影响迅速扩大但容易成为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因而在新一轮国际战略博弈中,我国既不能被动应对,又不能轻易打破既定格局,需要继续遵循“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主动参与塑造国际和周边新格局,以可控、灵活、渐进的方式化解安全压力,彰显国家意志,拓展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把世界大变动大调整转化为国家崛起的机遇。军事从属于政治,为国家利益全局服务。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

^① 参见《孙子兵法·谋攻篇》。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军事科学院译,第26、3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因此,在国家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军事力量的运用需要更多地体现“柔武”精神,发挥支撑、震慑、持续、稳固的战略功能,达成控制态势、稳定大局的战略目的。

把有效控制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理念,符合当代局部战争的战略特性。当代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有限战争,其本质就是控制性地使用武力达成有限的战略目的。随着信息化战争成为主导性的战争形态,战争节奏显著加快、战争相关因素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相互影响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高技术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战局控制的意义更大。包括: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控制的手段越来越多,控制的方式越来越灵活,控制的综合性越来越强,控制的整体效益越来越显著。在作战体系对抗层面,集中体现为对精度、速度和强度的控制。追求谋划精细、目标精确、打击精准,追求快速侦察、快速决策、快速投送、快速部署、快速打击,追求主动调控战争能量释放的时机、空间、节奏和规模。在战争体系对抗层面,主要是从政治高度控制军事行动,围绕有限政治目的确定军事目标,选择打击对象,实施物理摧毁、舆论瓦解、心理震慑相结合的整体作战,调控军政、军民之间的衔接配合,把握从和平到战争、从战时到战后的重大节点转换。从我国实际看,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积累起巨大财富,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空前加深,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对外依存度空前上升,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战争实力和战争潜力极大增强了,但战争承受能力则相对下降,早已过了“光脚不怕穿鞋”的阶段。因此,必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主动实施控制,尽可能地降低战争风险和战争破坏。

把有效控制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理念,符合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新使命。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动、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地球自然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我们面临国内外因素相互交织联动、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国家改革开放和利益拓展中遇到的矛盾、摩擦和斗争,更多地要依靠政治、经济、外交等非武力手段

解决,但军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支柱力量,既是支撑其他非军事手段发挥作用的强大后盾,也需要在多种复杂严峻态势下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战略指导上,需要针对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不同特点,调控军事力量运用的时机、方式和规模等,力争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动用恰当的力量完成维护稳定、保障权益、控制局势的任务。

总之,有效控制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指导的时代特性。它既是对作战行动的战略指导,也是对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既是对主要方向的要求,也是对其他重要方向的要求;既适用于境内军事行动,也适用于境外军事行动。把有效控制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理念,核心是从重“防”转向重“控”,从重“战”拓展到重“势”,从谋“战胜”提升到求“先胜”。依托不断增强的国家战略能力,充分发挥军事力量的整体效能,主动影响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逐步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掌握战略主动权乃至主导权,切实把发展作为根本的战略所在。

二、有效控制的基本内涵

一是注重营造态势。谋势、造势、用势、控势,历来是军事战略的较高境界。孙子云:“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①唐李靖亦言:“用兵任势,如峻坂走丸,用力甚微,而成功甚博也。”^②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强调,战略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其“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军在毫不懈怠抓紧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还需要在国家

① 《孙子兵法·势篇》。

② 吴九龙:《孙子校释》,第8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第119页,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统一调度下,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手段相互配合,努力营造有利于稳内拓外、长治久安的战略态势,核心在于战略制衡、稳定周边、反独促统。

针对霸权势力的战略遏控,坚持以我为主,以两手对两手,立足持久周旋,不随其挑衅节奏而起舞,不与其争一时一事之意气。强化利益牵制和借力羁绊,善于斗智,巧于斗力,不怕斗勇,以战略意志的强势弥补全局上战略能力的相对弱势,努力控制政治、经济、外交矛盾不向战略冲突延伸,防止出现霸权主导下的以我为对象的军事联盟的扩大与发展,力避出现危机失控和冲突升级的被动局面。同时坚持着眼长远,敢于以战止战,将威慑造势与实战制胜统一起来,积极谋求在有限区域内争取并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增大对手对我实施战略遏控特别是武力干预的风险和代价,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着力开拓周边、稳定周边、塑造周边,稳中求进,筑牢支点,适度预置,把周边经营成屏护国家安全、支撑利益拓展的稳固战略依托。努力促进周边共同发展,有效应对周边可能出现的重大突发事件,力求周边地区不战、少乱。特别是要把与我国发展和安全有重大关联的周边主要国家作为必争、必稳、必保的重点加以经营,勇于担当区域性大国的责任,强化与这些国家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对周边潜在敌性国家坚持以和平方式缓和化解矛盾,同时保持适度警惕和戒备,使其制定政策和采取战略行动时,必须顾及中国的意志、安全与利益。

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同时,继续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度警惕,适时将战略重心从遏止分裂转向促进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多种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台湾问题控制在“一个中国”框架内,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注重防控危机。危机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是可能引发战争的危险状态。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引起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的

矛盾与斗争的根源依然存在,但矛盾和斗争的方式有所转化。战争爆发的频率呈下降趋势,危机爆发的频率则呈上升趋势。今后一个阶段,对我国而言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战略风险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多变的各类危机事态,而危机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大局造成严重干扰与破坏,甚至影响到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因此,必须把遏控危机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强化危机管理,特别是采取相应的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防止小乱酿成大患,防止危机升级为战争。

坚持立足预防,防患未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对象的长期跟踪,加强危机预警和常态监控,积极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法律等非军事手段先期介入,必要时辅以适度的有效的军事行动方式,以震慑对手,把握好堵与疏、严与宽、增压与减压的时机和分寸,控制危机因素增长,舒缓危机能量积聚,防止事态发展突破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力争洞悉于事先,弭乱于未发。

坚持分类处置,量情施策。区分危机的性质和程度,针对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周边热点问题、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等可能引发的不同危机,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下确定是否使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使用军事力量的时机、方式和规模,力避经济社会危机上升为政治危机,力避国际危机特别是周边危机演变为国内危机,力避非军事危机转化为军事危机。

坚持标本兼治,根绝后患。危机的表象为激烈的突发事态,危机的根源是长期积聚的矛盾。确立当前控制危机和长远化解危机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对危机事态和危机根源采取区分缓急、分解处置的原则,对多边性、联动性的危机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原则,避免矛盾交织、久拖不决,造成事态复杂化。当危机处于爆发状态时,应果断决策、多方联动、快速出击,迅速平息事态,坚决控制局势,避免危机扩大升级。注重将危机管理向危机后延伸,在一定时间段持续保持军事行动的强度,逐步减压,视情收兵,同时针对危机爆发根源

综合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等多种措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隐患。

坚持因势利导,化危为机。危机既蕴含风险,也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机会之窗。危中有机、乱中求治是一条重要的规律。比如,1959年平定西藏达赖集团叛乱后,毛泽东果断决定将原定于1963年实施的西藏改革提前进行,从而彻底铲除了西藏农奴制。遏控危机不是为稳而稳,也不是就事了事,而要在战略上积极进取,没事时不惹事,事来时不怕事,努力变坏事为好事,利用危机事态,抓住机会实施一些平时难以下决心推进的战略举措,使整个局势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转化。

三是注重控制战局。战局控制是战争指导者把握战争主动权,能动调控战争目的、手段、规模、节奏、时间和范围,争取以较小代价获得有利战争结局的实践活动。和平与发展的局面一旦被破坏,我们应把握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一般规律,着眼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加强战局控制,降低战争风险,坚决赢得战争胜利,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这是我军战略指导面临的重大问题。根据我军未来作战战局控制的特点和要求,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着眼有限目的,坚持全程控局。确立适当的战争目的,并区分为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两个层次,军事目的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目的。在保持政治目的坚定性的前提下,根据战争进程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必要时适当调整军事目的。作战行动顺利时,要防止盲目扩大政治目的,导致战争升级;形势和条件发生重大转变、已不可能达成既定军事目的时,要防止不合时宜地蛮干。充分发挥目的控制的龙头作用,根据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确定和调整作战样式、规模、强度,围绕开战、终战及战争进程中的重大关节点加强对战争全过程的控制。

加强初战控制,确保初战制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把握好敢战、备战、慎战相统一的原则,在精心筹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区分政治上宣战和军事上开战的不同时间窗口,慎重选择开战时机,坚决做到有备而战、先胜后战。粟裕曾经反复强调,现

代战争尤其是我军并不擅长的大规模海上联合作战,作战准备要重于战机把握,多一份准备多一份胜利,如无绝对把握,不应轻易发起攻击,宁愿推延一些时间。^①一旦准备充分,确有把握,则集中精锐,迅猛突击,在较短时间内打开局面,力争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夺控战场主动权,摧毁敌作战体系、震慑敌战争意志。

立足困难局面,力避陷入僵局。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出发争取最好的可能,历来是我军战略指导的一条重要原则。未来我军局部战争的战局控制,需要做好应对强敌军事干预、一个方向作战其他方向连锁反应等多种情况的准备。预留强大后手,坚定战略意志,力争速决,不惧持久,把握好攻与守、打与谈的关系,善于在相持中强化自身优势,扩大对方弱势,逼敌妥协退却,争取有利结局。

妥善结束战争,稳定战后局势。制订完善的终战计划,把握恰当的终战时机,根据战场态势和作战对象及战略对手的反应,灵活选择主动停火、脱离接触、转入和谈、军事占领等终战方式。军事善后行动与政治、经济、外交善后行动相互衔接配合,保持对敌适度压力,维持战区安全稳定,消除战争负面影响,改善内外战略环境,及时将战场胜势转化为战略胜局,由战争状态转入对己有利的和平状态。

第三节 坚持多样运用

只要战争根源没有消亡,应对战争威胁就始终是军队的首要职能。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国家安全和利益日益面临多元化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有些甚至不亚于战争,是比战争更复杂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应拓宽军事战略“频谱”,实现由传统的“战争战略”向“全面履行使命的战略”转变,针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关乎国家生存也关乎国家发展的实际,在坚持以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的筹划指导为核心的同时,重视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的战略运

^① 参见《粟裕文选》第3卷,第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用,注重发挥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功能,正确运用战争、军事威慑和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三种和平与发展时代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方式,借以丰富战略手段、增加战略选择、强化战略弹性,更好地止战胜战、维稳维权。

一、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信息化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核心,信息化战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战争形态,明确将未来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基点的确立,体现了当代战争形态发展趋势,是对我军建设和运用的根本性、总体性要求。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战略方向、战略对手、作战对象、战争威胁的多元,客观上要求围绕新的军事斗争准备基点,遵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针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多种类型的、信息化程度不等的局部战争,进一步发展完善我们的战争筹划和指导。

统筹各战略方向作战。主要战略方向是一个时期内战争威胁最严重、军事斗争任务最紧迫的焦点所在,是必须首要关注、重点筹划、充分备战的地区。未来主要战略方向作战,从政治高度看,关系到国家统一,关系到民族复兴;从军事特性看,不同于我军惯常的陆战近战,是对国力军力的重大考验,不打则已,打则务求必胜。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主要战略方向作战时,其他战略方向不排除发生连锁反应的可能;在主要战略方向保持和平稳定时,其他战略方向不排除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几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不是在当时的主要战略方向上打起来的。因此,需要把握好突出重点和关照全局的关系,着力准备在主要战略方向打一场有强敌干预背景的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局部战争,同时加紧准备首都战略防空作战,以及有效应对其他方向上可能发生的高强度军事冲突乃至局部战争。区别各个战略方向和各个战区的不同作战任务、作战对象、战

场条件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相应制定具体作战方针,明确不同的作战要求,并结合实际创新战法运用。

统筹多维空间作战。信息化条件下的战场空间,由陆、海、空三维向陆、海、空、天、网多维拓展,有形战场空间与无形战场空间相互交织影响,直接交战空间趋小而战争相关空间扩大,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空天打击、网络打击手段的加速发展,将可能催生新的战争时空观,带来战争形态和战争样式新的革命性变化。未来我军作战,将在全方位、高立体、多层次的战场空间展开,各个维度战场空间的相关性更趋紧密,需要统筹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作战行动,在重点筹划主导性战场空间作战行动的同时,关照其他战场空间作战行动,把夺取制陆、制海、制空、制天与制网权有机统一起来。从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看,需要高度重视太空和网络空间这两个新兴战场空间的作战行动,将其作为未来联合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重要的独立作战样式,在一定条件下借以直接达成战略目标。围绕天基信息保障、空间威慑、空间防御、反卫反导等确立太空基本作战原则,围绕网络侦警、网络攻击、网络防护等确立网络作战基本原则。

统筹多种规模作战。战争是敌对双方以暴力方式展开的对抗活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在一个时期内,作战规模可能是可控的稳定的,但又难以排除多种可能。面对只有小打、中打的可能而长期做大打准备,将会影响战略重心,消耗战略资源。反之,可能大打而只有小打、中打之备,则会陷入全局被动,乃至输掉战争。复杂多变的安全态势,现实和潜在的多种战争威胁,决定了我军在战争准备上应“不恃敌不来,而恃吾有以待”,考虑最坏、最好、最可能的情况,针对最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战争争取最有利的结局,同时做好应对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准备,确保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全局上统筹小、中、大三种规模作战,准备在主要战略方向遂行较大规模作战的同时,还应准备在其他方向应对可能发生的边境冲突和武装暴乱。敌情较重的战略方向,也应统筹在本战区范围内的小、中、大三种规模作战,做好独立遂行小规模作战的准备,同时做好在

支援和配合下遂行中等规模和较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二、把军事威慑作为重要战略行动样式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基于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态势,我军在战略上比较重视反威慑。当今时代,军事威慑已经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军事威慑手段不断增多。我军也应着眼于现实和未来多种战略需求,把军事威慑作为重要战略行动样式,作为贯穿于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斗争手段,通过显示军事能力和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心来慑服对手,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为以战屈人之兵创造有利条件。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军军事威慑最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运用核常复合的威慑手段,灵活采取多种威慑方式,慑止重大军事危机,有效遏制战争,延缓战争爆发,制止战争升级,避免或减少战争破坏,维护战略机遇期和国家安全利益。

针对平时潜在的威胁源,采取预防性威慑行动,根据战略形势的发展调控威慑方式和强度,形成常态化的威慑态势,迫使对手不敢轻举妄动。危机特别是重大军事危机爆发时,应结合战略展开和实战部署,营造高强度的威慑态势,显示不惜一战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实力,迫使对手悬崖勒马,并做好由慑转战的充分准备。必要时采取适度的战争边缘行动,通过采取有限而有效的警示性火力打击和信息攻击,迫使对手知难而退,见危而止。为慑而慑,慑不可信,慑中寓战,慑乃有效。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我军就成功运用战争边缘政策,达成了打蒋慑美的目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①在战争状态下,应把军事威慑行动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坚持寓慑于战,慑战并举,增强作战行动效能,有效控制战局发展,力争以较小代价达成战略目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特别是在与主要作战对象作战时,要注重运用军事威慑遏止强敌军事干预;在主要战略方向作战时,要注重运用军事威慑遏止其他方向对手的可能军事挑衅。

三、注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运用

军队的战略功能由战争向非战争领域拓展,是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普遍趋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自成立之日起就要承担以作战为核心的多种任务,这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所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形象地称我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和生产队。新形势下,我军在坚持以打赢战争为核心职能不动摇的同时,还应着眼满足平时时期国家的多种战略需求,遂行各类非战争军事行动,用比战争小的代价、比战争更加灵活的方式,获得更大的战略效益。这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基本要求,直接体现党的政治意志,关系人心向背得失,关系军队和国家形象,关系国家安全和发 展大局。

我军应确立“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新观念,根据不同任务的性质、对象和环境,灵活采取对抗性、合作性、执法性、救助性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抗性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现实和潜在对手的低强度军事活动,用以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显示军事存在,表达安全关切,宣示战略底线,试探对方动向。既要清晰传递己方的立场、态度和决心,不使对手产生战略误判,又要力避剑拔弩张过分刺激对手,导致失控升级。合作性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是配合国家政治外交需要,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军事外交,围绕共同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深化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逐步扩大参与国际维和、联合军演、联合执法等涉外军事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借以了解外军发展动态,增强战略信任,增进军事透明,展示我军良好形象,提高我军国际威望,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以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式积极稳妥进行必要的境外战略预置,加强战略支撑点建设,与相关国家建立共同应对危机的机制,更好地拓展我军海外运用的空间。执

法性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恐怖活动、骚暴乱、大规模非法群体性事件以及其他严重犯罪活动,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进行处置。应区分事态性质和对象,严格把握用兵的条件、方式和强度,对于意图颠覆政权、危害社会的恐怖暴力活动毫不姑息、坚决打击,对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突发事件应限制使用武力,尽量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救助性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是充分发挥军队快速反应、灵活机动、集团突击的优长,遂行国内抢险救灾、境外护侨撤侨、保护境外资产以及力所能及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灾害后果,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维护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以及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行动的特点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军无论是作战,还是实施军事威慑或者非战争军事行动,都具有许多共同特点,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要求。首先是坚持从政治高度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战争、军事威慑、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政治性都很强,都受到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制约,都要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和维护国家利益全局出发,在国家政治规定的范围内筹划和实施,不给国家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其次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慎重处理斗与和、进与退、内与外、说与做的关系,不图一时之快,不贪一时之功,不为情绪所左右,防止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躁冒进。再次是坚持快速精准用兵。缩短侦察预警—判断决策—实施行动的周期,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把决策优势转化为行动优势,有效地防控危机事态,迅速控制局面并赢得作战的胜利。

第六章

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

战略指导是对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原则性指示与引导。战略指导必须遵循战争基本规律,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从思想到原则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必须符合政治的规定性,体现国家意志,彰显国家实力,反映国家利益的最新诉求。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新形势下,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必须把握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出发,更好地服从服务于不断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

第一节 严控战争目的

战争目的决定战争规模和战争力量的运用方式,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有限的战争目的,作为局部战争区别于全面战争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题的时代要求。以往的全面战争,主要动因是争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战争目的直接表现为攻城略地,战争手段是通过大规模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那种战争,往往表现为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举国参战,作战双方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作为战争胜败的唯一标准,不仅使战败国承受国破家亡的灾难,而且也给战争胜利方带来沉重负担。进入信息化时代,各种战争制约因素进一步发展,战争目的的有限性特征更加凸显,严控战争目的成为时代的要求,与之相适应,控制战争规模和强度,也成为战争指导者的理性选择。从政治上看,冷战结束后,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成为各国追求的价值取向,以和平

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成为当代社会竞争较量的主流方式。尤其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战争的反感和抗议,往往造成战争国家孤立、战争政府垮台,也对战争产生着持续与深远的制约作用。从经济上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各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倡导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促使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而经济共同利益的日益扩大,在加深彼此相互依存度的同时,形成“一损俱损”的战争风险关系纽带,从经济基础上构成反对和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从军事上看,战争的高投入和高消耗也极大地限制了战争规模的扩大。以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为代表的战争手段广泛应用于当代局部战争之后,使战争的成本和损失成几何级数增长。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英阿双方战费已达数十亿美元。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的战争花费达1000亿美元。而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截至2011年时,美国的直接军费开支就近5000亿美元,整个战争总的花费超过万亿美元。战争的高消耗性必将损害战争参与国的综合国力,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还将动摇统治者的执政根基,从而迫使战争决策者不能不考虑战争的利害得失,有意识地控制战争规模的扩大。正是由于追求无限目的的战争,军事上难以实现、政治上易陷被动、经济上得不偿失,世界各国普遍选择通过节制战争目的来避免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国际化。

我国进入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成为头等大事。为适应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我军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拓展了军队的职能范围,规范了军事行动准则。在国家战略目标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引导下,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以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的总体目标、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最高准绳,避免干扰和破坏国家和平发展的进程。因而,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必须严格控制战争目的,并通过战争手段的可控性来实现这一目的,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严控局部战争目的,关键要把握三点:一是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发
展大局。要把战争放在国家安全的全局中进行统一考虑,确保所发生的

战争不至于威胁国家生存,不至于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危局。要充分考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战略,确保战争成本不至于对国家经济主体造成根本性的伤害,不至于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二是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有轻重之别,维护国家利益有缓急之分。明确有限的战争目的,重在确保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不受伤害,国家的重要利益不受重大损失;重在确保国家利益短期不受侵害,长期不留安全隐患。三是要与军事能力相匹配。战争的主要基础是军事能力,战争目的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严控局部战争目的,不仅要考虑现实的军事能力,而且要考虑己方的战争潜力以及将其转化为战争实力的动员效率。只有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为基本标准,以敌方的军事实力为参照系,客观地评价和估计自身的综合军事能力,以此为据制定相应的军事目标,才能确保有限战争目的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才能科学决策,将理论方案转化为现实胜利成果。

局部战争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有限的政治目的、有限的军事目的和有限的经济目的。在战略上必须以此为据来筹划指导战争,力争做到:战争力度适可而止,不以威胁对方生存和全面剥夺对方军事能力为主,而以迫使对方妥协为主;作战范围大小有度,不是追求覆盖敌我双方国土的全部空间,而是要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打击目标轻重有别,主要是打击对战争实施和维持起战略支撑作用的军政首脑机关、军事指挥控制中心、高技术武器基地、重要补给设施等,而不针对平民目标;作战手段效能优先,尊重相关战争法和国际公约,尽可能使用常规武器而尽量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兵力投入合理够用,注重质量而不过分强调数量规模;作战进程张弛有序,尽可能加快作战节奏,缩短作战时间。通过设定一系列具体化的行为准则落实有限战争目的,确保对战争实施有效控制。

第二节 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

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依托网络化的军事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

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进行的整体联动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其基本作战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无缝链接的网络化军事信息系统和高度融合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力量。前者可以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保障,使各个作战单元共同感知战场态势,通过指挥控制的精确化和实时化,使作战资源自主配置运用,达成作战行动的自适应和自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后者是作战力量实现功能互补和效能聚合的物质基础,是打破军兵种界限和战略战役战术作战力量层次区分的必然要求。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本质特征表现为武器装备一体化、作战力量一体化、指挥控制一体化、作战行动一体化、支援保障一体化。

一体化联合作战与合同作战、协同式联合作战的区别在于,军种作战功能由单一趋向一体、作战行动由顺序趋向并行、能量释放方式由粗放转为精确、信息保障由辅助变为主导。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对军队所具备的能力以及战争的指挥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军是从单一陆军发展起来的,军兵种齐全但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参加过几场规模较大的战争,但都是以某一军种为主实施的协同式作战,没有经历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实战考验。面对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有效组织一体化联合作战,必须改变传统的以陆军为主的、单一的、非自主性的联合作战观念,紧紧围绕统一的作战目的,在统一计划和总体控制下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要发挥各军种基本作战单位的系统功能,根据作战要素间的耦合度、平时的磨合度,在不同层次作战要素中精心筛选最适合完成作战任务的要素,形成最佳作战组合,并根据战场情况变化不断作出动态调整,以提高作战体系的灵敏度和适应性。要强调诸军兵种力量使用的平等性,不单纯依赖某一军种也不片面强调某一军种在作战中的地位作用,而是通过军兵种力量的优化组合,扬长避短,形成对敌作战的综合优势,发挥“ $1 + 1 > 2$ ”的整体作战效能。

从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自身规律看,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

必须发挥信息主导的作用。在机械化战争中,由于主战兵器的技术含量较低,战斗力的释放主要靠“机械能+化学能”,尽管作战双方可能存在着强弱、优劣之差,但在实际作战时,往往可以通过时间差和数量差来弥补质量差。但在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敌我双方将围绕缩短“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的作战周期进行争夺,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往往就会拥有决策优势、行动优势,乃至胜利优势。因此,要牢固树立信息制胜的思想,充分发挥信息的主导作用,促进战争资源的最优化使用和部队作战功能的体系化发挥。

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强调运用体系破击的基本战法。传统的歼灭战奉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原则,作战行动一开始是“打单元”“打要素”,通过对单个要素的打击,逐步累积作战效果,最终达成作战目的。而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是体系对抗、整体作战。未来我无论是面对优势装备之敌还是面对劣势装备之敌,都要着眼瘫痪敌战争体系,强调“打系统”“打要害”“打节点”。这就要求善于优化组合作战力量,使整个作战体系的能量通过网络的控制,围绕特定目标高效释放,尤其要将精锐力量聚集到关系敌政治、军事与经济体系稳定的关键目标上,聚集到关系敌作战系统整体效能发挥的要害节点上,实施基于体系、基于“直达”、基于心理的“斩首”“点穴”“破链”战,一举达成战争目的。从战略指导上讲,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通过对敌方国家信息网络系统实施有效干扰和破坏,或通过对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战略目标实施精确而有效的打击,极大地削弱并摧毁敌方的战争实力和潜力,使敌难以或无法继续进行战争行动,迫使敌人放弃抵抗决心并最终屈服。通过一系列作战行动,主要是扰乱和破坏敌方的军事决策程序,对敌军队作战体系实施结构破坏和瘫痪,使敌方整个战场空间的战斗部队、战斗支援部队、战斗勤务支援部队等作战系统和战场情报、指挥、控制、通信、打击、毁伤评估等作战要素无法协调一致地行动,使对手丧失信心、失去斗志、被迫就范。通过对敌方要害目标实施“点穴”式攻击,注重关键或要害部位的快速精准毁瘫,造成敌方心

理的强烈震撼和恐惧。

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强调牢牢把握精确制胜的关键,精选目标、精干力量、精准打击、精确保障。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依靠武器装备的巨大杀伤性,尽可能多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剥夺敌方抵抗能力,摧毁敌方战争意志。信息化战争的典型特征则是机械能和化学能在信息能的主导下,可以精确释放,直击要害,迅速剥夺敌方战争的指挥控制能力以及武器装备使用能力。当然,精确作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实时的信息保障、精确化弹药、快速运输系统等。伴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加快,实施精确作战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未来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应抛弃单纯依靠数量的粗放型作战方式,尽可能地做到攻防目标精确定点、兵力机动精确定时、火力打击精确定位,从而实现精确部署、精确交战和精确保障。

第三节 坚持非对称作战

孙子曰:“以正合,以奇胜。”这种奇正对抗思想反映的是战争中最普遍也最实用的非对称作战原理。从历史和现实看,非对称性广泛存在于战争体系之中。这是由于敌对双方在武器技术装备、人员数量、军队结构、思想观念、文化背景、行为准则、时空条件、作战行动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客观上构成不同形式的非对称关系,而这种非对称关系往往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这一优势既可表现为力量的强弱差异,也可表现为作战手段运用方式上的优劣差异。如:空中力量对地面力量在速度上占有优势,潜艇对水面舰艇在隐蔽性上占有优势,精确制导武器对一般武器在打击精度上占有优势,一般武器对高技术武器在维修保障简易度上占有优势,等等。利用战争条件的各种非对称优势,以长击短,可掌握作战主动权,创造胜战之势。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斗争异常激烈,必须着眼发挥非对称优势,从力量构成、武器性能、地理环境上全面分析敌我之间存在的优劣差异,在动态变化中创

造和运用各种非对称手段,以持续、有效的非对称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坚持非对称作战与总体实力相关,也与主观能动性相关,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势利导、灵活运用。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存在我强敌弱、敌强我弱、敌我相当三种情况。当我强敌弱时,我拥有更多的非对称优势,在战争中发挥非对称优势受制约的条件少,容易掌握作战主动权。此时,应抓住对方弱点,实施连贯的以多对少、以强对弱、以优对劣的作战。作战中,不仅要善于以我之长对敌之短,而且也要善于以我此长对敌彼长,尽可能削弱敌可能利用的优长。鉴于我拥有较多的优势,战争中要克服以数量取胜的思想,强调发挥技术装备的作战效能,尽可能在对方武器作用范围之外实施决定性打击,避开己方的弱点,限制对方的长处。必要时,以频繁而快速的机动调动敌人,使敌人暴露弱点或变其强点为弱点,形成以强击弱的非对称之势,一举击败对方。

当敌强我弱、敌我相当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非对称作战就显得更为重要。受国家总体发展水平以及军队建设内在规律的限制,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军仍然面临着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之敌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强敌的介入可能使敌强我弱、敌我相当的战场态势难以避免。鉴于敌掌握更多的战场主动权,使我发挥非对称优势变得更加困难,我需要充分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采取非正规、非传统的作战模式、方法和手段,不断缩小敌我之间的强弱差距,在被动中谋求主动。在力量运用上,要发挥诸军兵种在不同作战阶段和不同作战样式中的优长,力求造成不同军种、兵种之间的对抗,形成多军兵种对单一军兵种,多方向、多维空间对单一方向、单一空间的作战。在时间上,通过抢占先机、快速准确、持续不断等手段,形成错位之势,有效利用时间并限制敌方对时间的有效利用。在空间上,通过广泛渗透、位置前伸等,尽量扩大己方的行动空间,限制和压缩敌方的作战空间,以获得作战主动权。坚持非对称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

高度灵活,力量使用上不拘一格,谁实用、好用就用谁;方法上不囿成规,什么管用就用什么;空间上不分地域,哪里有利就在哪打;时间上不分昼夜,什么时间敌最松懈就什么时间打。要充分创造条件,绝不在敌人限定的时间、地点,使用敌所期望的方法与之作战,避免与敌在其占优势的高技术领域作狭路相逢之战。

第四节 夺取战争主动权

夺取战争主动权,历来都是战争取得优势和胜利的基础。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就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法则。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的战略名篇《论持久战》中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在斗智斗勇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博弈中,战争的主动权是相对的,在敌我双方对抗较量的不同时间、地点、过程、方面等,也就是在不同条件下,可能会存在整体主动、局部被动,战前主动、战中被动,陆上主动、海上被动等多种复杂情况。而且,受客观实力此消彼长以及主观努力正误难定的影响,战争主动权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存在绝对的主动,也不存在绝对的被动。

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拥有高技术优势装备之敌客观上可能造成敌主动、我被动的局面,扭转这一局面的举措之一就是战前主动造势,以总体有利态势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劣势,积极谋取战争主动权。战争准备期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善于运用经济手段制裁对手,削弱敌之实力;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孤立对手,使敌无法获得外界的支援,尤其是武器装备的支援;灵活运用心理战手段动摇对手,分化瓦解对手战争基础;敢于运用军事威慑手段,特别是运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的斗争手段,破坏敌战争指挥体系。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理、舆论等手段,创造有利的战前态势,力争战争初期的主动权。

战争发起后,战争主动权集中表现为以制海权、制空权、制信息

权为核心的综合战场控制权。其中,制信息权是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基础,没有制信息权,难以有效组织己方力量争夺制空权、制海权;而制空权、制海权是战场主动权的关键和重点,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将失去有力的夺控手段,无法保持战场主动权。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践一再证明,战争无不从争夺“三权”开始,能否夺取和保持“三权”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要从我军高技术装备较少的实际出发,既要重视以优势装备夺控“三权”,以“三权”为前提展开后续行动,又要重视以劣势装备与强敌争夺“三权”,发挥主观能动性,确保在短暂“三权”甚至在无“三权”的逆境下能继续展开作战行动。夺控“三权”要注重先发制人,强调在先期作战阶段,精选首攻目标,集中精兵利器,隐蔽突然地发动高强度突击,力争通过首次打击基本瘫痪敌作战体系,一举夺取“三权”。随着战争进程的逐步推进,要利用信息作战力量严密监视敌海、空军动向,不间断地对敌信息系统进行压制和干扰;集中运用陆、海、空军和二炮的远程打击力量,继续打击敌遭受攻击后又重新恢复功能的目标以及新发现的目标,持续保持对敌强大压力,牢牢地掌握“三权”。夺控“三权”要做到攻守平衡,面对敌先制和反制作战行动,既要积极进攻,又要严密防护。可针对敌目标电磁特征明显、防护体系较严密的特点,注意软硬结合,通过电磁攻击、网络攻击等软杀伤手段,与导弹攻击、特种攻击等硬摧毁手段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力求以综合打击剥夺敌维持“三权”的能力;同时注重隐蔽伪装、抗电磁干扰及火力打击,保持己方侦察探测系统、通信系统及指挥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转,维护作战体系的完整性。

进入 21 世纪,太空系统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使得太空和网络成为夺取战争主动权的新领域。加强太空制高点的争夺,在必要的情况下,要针对太空武器技术造价大、数量有限、不易发展的特点,以局部集优形成区域性的有力保障态势,以重点打击毁坏敌太空系统的关键目标;针对太空系统军民共用共享程度大的特点,以军事手段掩护民用太空目标安全,以民用太空系

统增强太空军事保障能力;针对太空攻防依托地面保障的特点,坚持陆、海、空、天、网、电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侧重破坏敌地面保障和通联系统,割断敌太空与地球表面之间的联系,使敌无法支配和利用太空系统。加强网络倍增器的争夺,必须针对网络易攻难防的特点,坚持以攻为主,既破坏敌软件系统,又毁坏敌硬件设备;针对网络对抗平战界限模糊、军民攻击难以识别的特点,坚持平战结合、军民一体,平时以民掩军,战时军民联手一体攻击;针对网络安全高度依赖技术手段、物理毁坏难以修复的特点,侵毁并举,力争综合运用技术攻防手段和物理攻防手段,获得网络攻防的最佳效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话语权成为夺取并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主动权的又一表现形式。能否掌握话语权,不仅关系到能否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关系到能否保持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维护国内支撑战争的政治基础。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作战部队安排大量的随军记者,跟踪报告战争的进程。通过战地记者的实况报告,一方面反映美英联军的高效作战能力,以震慑敌人和潜在对手;另一方面展示美英联军作战中的所谓人道主义,以掩盖其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从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世界人民因战争而对美国产生的厌恶感,也为战后重建打下了一定的民众基础。话语权通过“信息—信仰—心智”而起作用,争夺战争话语权必须注重舆论战、法律战和心理战的综合应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三战”行动要与政治外交斗争相适应,大力宣传政治外交活动的有关情况,在政治上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和优势,为保障整个作战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撑。要根据总的作战意图,着眼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行动效果,选择相应的“三战”方式。有时需要隐蔽作战意图,舆论宣传强调声东击西;有时需要扩大军事打击和特种作战后的效果,则强调宣传的范围和强度。通过“三战”行动把我可能和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影响充分扩大、淡化或转移,使之对敌方官兵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节 妥善结束战争

在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结束战争与发起战争同等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战争结束形式往往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一方彻底胜利、另一方彻底失败而告终。但局部战争的实践越来越表明: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赢得作战胜利容易,赢得战争完全胜利难;发起战争容易,结束战争难。未来我所面临的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不是赌国家命运的战争,不是举国迎敌的战争。因此,在战争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确定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要充分考虑战争目的的实现程度、战场的基本态势、国际社会的反应、对方的战略意图、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等各个方面,通过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迫使对方按照自己提出的条件、模式和时间表结束战争。

能否适时结束战争,取决于战场态势、国内外的干预、战争潜力等多重因素。其中,战争指导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勇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常理,达成战争目的即可结束战争。但战争双方的目的是错位的,战争一方达成目的意味着战争另一方背离目的,这种错位性也经常致使战争久拖不决。面对复杂的战争局面,需要战争指导者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为了能在可控范围内结束战争,必要时敢于牺牲部分利益,果断决策,坚决地结束战争。我国 20 世纪中叶进行的对印边境反击作战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以及 21 世纪初美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告诉我们,军事打击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战争目的的主体已经达成,军事行动见好就收,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可以扩大的军事成果,为对方留下政治谈判的空间,更容易结束战争。否则,强求百分之百地达成战争目的,就可能陷入持续使用武力、难以控制局势发展的困难境地。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武装冲突与战争往往具有国际化的特

点。这在促使战争政治解决复杂化的同时,也使得借用外部力量的干预成为适时结束战争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以及非盟、阿盟、欧安会等一些地区性的组织,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延缓地区性战争爆发和制止地区性战争升级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战争期间,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可寻求较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共同施压,利于适时结束战争。尤其是实力较弱或在战争中处于不利态势时,为防止战争朝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应积极寻求借助有利国际因素,借用第三方向对手施加压力,以争取在较为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当在第三方干预下结束战争时,善于利用处理国家关系常用的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目的在于使战争利益得到确认,使其变成敌对国正式承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和约或协定。

适时结束战争是战争指导者努力争取的理想结果。考虑到战争性质及敌方的战争意志和能力,还必须处理好速决与持久的关系,以便在结束战争过程中把握主动。通常情况下,对于强者,速决是首要选项。而对于弱者,持久是重要的选择。它们的实现依赖于战争目标、战争实力和战争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发展变化。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我军作战对象可能是强敌支持下的当面之敌。而强敌的介入则可能将速决之战变成持久之战。战争指导者应始终坚持把速决作为首要选项,但也要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拟订力争速决、敢于相持和战后控制有机统一的作战方案,并指导军队做好一切物质和精神准备。如果战争不能按己方的意愿适时结束,要及时指导部队进行思想转换,调整精神状态,确保士气不受战争持久的影响,同时转换作战行动方式,以最有效的手段实现并保持战略上的稳定与控制。战争指导者要始终努力保持坚定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合理的途径,持续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支持战争的延续。只要准备充分、应对自如,就能以坚决的作战行动打破敌短促速决与持久拖延的设想,把握和控制战争进程,夺取胜利并尽快结束战争。

第七章

军事威慑行动的战略指导

军事威慑作为一种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未来的军事斗争准备,不仅要努力提高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也要努力建立和强化具有遏制战争爆发、阻止战争升级的军事威慑体系和军事威慑能力。因此,加强军事威慑战略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威慑理论,灵活运用军事威慑这种军事斗争的基本形式,是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选择。

第一节 当代军事威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一、军事威慑的含义与特征

军事威慑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以威胁使用或使用军事力量来影响对手的战略判断,使其感到因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或得不偿失而放弃敌对行动,从而达成一定政治目的的战略行动。按照不同划分标准,军事威慑可区分为常规威慑与核威慑、空间威慑与信息威慑、直接威慑与间接威慑、平时威慑与应急威慑、实战威慑与非实战威慑、局部威慑与整体威慑等多种类型。

概括起来,军事威慑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威慑是政治的继续。威慑作为军事行动的一种类型,是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实施的。这决定了威慑在本质上必然要从属于政治,是有别于战争的特殊政治行为。政治与威慑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没有脱离政治的威慑。第二,威慑的根本目的是阻止对方危害于己的

某种行为。威慑意在使对方相信其行动的代价将超过可能获得的好处而改变战略判断,其基本目的是遏制对方的可能进攻或维持现有状况,阻止危害己方的行动发生。第三,威慑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可能的暴力。威慑不是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方式体现政治意志,而是向对方传递可能暴力的危险性、紧迫性和现实性。这种可能的暴力必须建立在相应实力基础之上,否则很难让对方相信。第四,威慑的最根本手段是威胁。威慑的本质是一种暴力威胁。要使被威慑者相信威慑者所发出威胁的真实性,威慑者必须将威胁有形化,从而使被威慑者能够感知与认知。较口头威胁相比,军事力量展示所体现的威胁更具有可信性。第五,威慑产生作用的载体是对方的心理活动。威慑既是军事概念,也是心理—政治概念。威慑方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让被威慑方想象或推测这种威胁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从而引发被威慑者心理上的恐惧。第六,威慑是对综合力量的运用。必须动用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一系列手段,才能为达成威慑目的创造最佳条件。

威慑作为古已有之的军事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武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规则,使军事威慑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现代威慑理论和威慑战略由此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军事战略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军事威慑的作用机理

军事威慑的作用机理,是指威慑力量、决心和信息传递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威慑效能、实现威慑目的的基本原理。

威慑力量是实施威慑的客观基础。没有实实在在的战略威慑力量作支柱,战略威慑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陷入被动的境地。威慑力量越强,威慑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打击力量,是军事威慑力量的主体,是实施战略威慑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因素。整个国家的战略威慑力量除了军事力量

外,还包括国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素质、地理状况、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非军事因素。军事力量是一种重要的可以直接运用的威慑力量,而有些力量则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威慑力量,即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开发和强化,并作为一种手段加以运用时,才能具备威慑效能。要使一种力量组合成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它必须能够不让对手准确预测出威慑方的具体应对政策、应对方式,并通过迫使对手不断猜测而使其感到难以选择。在没有出现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情况下,由国家综合国力特别是战略能力所形成的平时威慑态势,具有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与对手战略平衡关系的作用,是国家静态威慑能力的重要体现。当面临战争威胁或其他军事安全威胁时,以军事力量的充分运用为主体、以其他力量的保障支持为后盾的动态威慑能力,形成了以报复相威胁的紧急威慑态势,以达到特定的威慑目的。尽管实施威慑时在力量运用上不排除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威慑力量作支撑,就很难真正收到威慑的效果。

使用力量的决心是影响威慑可信度的关键。使用力量的决心体现着威慑实施者维护其利益的坚定程度。如果仅有强大的力量而缺乏使用力量的决心,也就是没有勇气将威慑力量之剑高悬于对手的头,那么就很难令对手畏惧。判断威慑者是否有实施威胁的决心,主要从利益重要性和意志力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决心有效性与威慑者受到威胁的利益对其安全的重要程度成正比,利益愈重要,对安全的影响越重大,则愿意付出的代价越大,决心有效性就越高,可能采取的威慑行动就越坚决有力,威慑可信度也会越高。意志力是威慑者的意志、智力和心理素质等主观因素的综合反映,直接关系到威慑的有效性。

有效的信息传递是促使力量和决心发生作用不可或缺的环节。信息传递是指威慑者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威慑信息传递给被威慑者,是威慑双方相互联系发生作用的纽带,包括传递的信息内容和传递方式两个方面。信息内容主要以所要达到的目标、可能采取的行动、兑现威胁的决心等为主体,是力量与决心的综合展示。其中,兑现威

胁的决心是威慑信息内容的核心部分,也是威慑行动中最具智慧性、艺术性的环节。基辛格曾指出:“从威慑的观点来看,表面的虚弱和实际上的虚弱将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一种目的在于虚张声势的姿态被人认真看待,它的威慑作用就比一种被人当做是虚张声势的真正威胁更大。”^①成功的威慑必须使被威慑者认识到威慑力量和威慑决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当被威慑者逐步接受这种威胁信息,心理压力达到一定量时,就能获得威慑效果。如果只有威慑一方的决心,而被威慑方并没有真正理解信号的含义,则威慑就不会发生作用。信息传递方式既可以是口头传递,也可以是行动传递;既可以是直接传递,也可以是间接传递。其具体形式主要是依据信息传递的效果而定。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保持传递渠道的畅通是实现有效传递的基本前提,一旦传递渠道阻塞则无法形成威慑。在信息化社会中,传递渠道是多方面的,具有多样性特征。

三、当代军事威慑的特点与趋势

随着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加速发展,特别是武器装备结构与功能的深刻变化,军事威慑在运用的时机、方式、指向和谋略等方面呈现诸多新特点新趋势,威慑与实战的联系更加紧密,核与非核力量在军事威慑中的联系更加紧密。从总体上看,当代军事威慑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威慑力量常规化。冷战时期,核武器始终是军事威慑力量的核心,常规威慑力量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冷战结束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常规力量,通过高集成、高精度、高效能和高灵活的运用,可以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使得信息化常规武器的存在、显示和运用比传统常规武器具有更强大的威慑力,同时相对核武器具有更强的可用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力威慑手段。这一

^① 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根本性变化,促使世界军事强国都非常重视常规威慑力量的发展与运用,不断提升常规威慑能力。例如,1996年美国一批退役将军和学者撰写的《震慑:获得“快速主宰”》一书,明确强调要通过信息化常规手段造成的物理破坏,达到对敌方心理的“震慑”。俄罗斯2010年版《俄联邦军事学说》等文件,突出强调“密集使用以新物理原理为基础的、与核武器等效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系统”是“现代军事冲突的重要特征”。这都从侧面反映出常规威慑力量地位作用的快速上升,同时也反映出各种新型常规威慑手段将对传统的威慑理念、方式和机理产生革命性影响,网络、太空等领域的新型“致盲”“致瘫”“致乱”等手段,可能具有更为理想的威慑效果。

威慑方式实战化。通过常规力量的有限实战方式来展示恐怖效果,提高威慑可信度,达成威慑目的,甚至为下一场战争提供威慑实证样板,已经成为当前威慑运用的重要方式。冷战后绝大多数常规威慑行动都与实战行动密切相关,以实战方式达成威慑效果成为常态。如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贯彻“快速主宰”和“震慑”思想,通过突然打击、重锤猛击、饱和压制、昼夜空袭等方式,给伊方造成灭顶之灾的强大震慑,以实战扩张威慑效果,以威慑增强实战效能,是典型的威慑与实战相结合。随着常规武器毁伤力的不断增强,实战行动所产生的威慑效果,往往会对其他潜在对手具有持久的威慑效应,威慑效果的辐射范围更广,威慑对象也趋于广泛。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强调常规威慑的实战化,也开始注重核实战威慑,高调评估核钻地弹等新型核武器的可能效果,试图借助超低当量高精度战术核武器的技术突破,为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提供手段,以达成威慑与实战的双重目的。

威慑行动全程化。在信息化条件下,信息传播的实时性和针对性,以及信息化常规军事手段的可控性和灵活性,为在战争全程中根据战局发展和对手反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威慑创造了条件。从冷战后几场局部战争看,以威慑为先导,实战为后盾,先慑后打、边打边慑、全程威慑已成为威慑的重要运用方式。譬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北

约战前在南联盟边境地区先后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海空军事演习,大肆渲染战争气氛,试图以大兵压境的威慑态势逼迫南联盟就范。开战后,北约采用空中战役逐步升级的方针,先是重点打击南军防空系统、首脑机关和支撑南军及特种警察部队作战的目标,接着打击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以及石油设施、道路和桥梁,最后打击野战部队、电力系统和工业系统,并配合以强大的心理战攻势,通过这种不断升级威慑与实战强度的做法,迫使南联盟接受北约停止轰炸的条件。

威慑手段多元化。每一种威慑手段只有针对特定的对象、特定的目的,才能发挥最佳的威慑效果。冷战结束后,安全威胁来源的复杂性、综合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军事威慑的对象正在由清晰转向模糊、由单一转向复杂、由集中转向分散,既可能是主权国家,也可能是某些政治组织,既可能是大国、强国,也可能是弱国、小国,因而威慑手段也相应趋于多元,针对特定威慑对象而设计的威慑手段层出不穷。近年来,西方军事强国大力开发信息化常规威慑、太空威慑、信息威慑等新型威慑资源,并注重运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谋略等多种手段达成威慑目的。美国在“9·11”事件后,迅速确立“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和核常结合、攻防兼备的核威慑战略,发动反恐战争,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加快全球战略部署调整,企图达到消除恐怖威胁和遏制潜在战略对手的双重目的。

威慑效果最大化。在信息化条件下,从威慑指向上,将威慑着力点集中于最具战略价值、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上,力求对威慑对象甚至广大民众在心理认知上产生最为深刻的震慑效果,以引发最广泛的关注和恐惧。在威慑力量或武器装备使用上,突出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作战手段的高端性、作战效能的震慑性。在威慑效果传导上,注重将民众作为放大恐惧的最基本媒介,通过制造各种打击效果来扰乱民心,削弱国家的抵抗意志,形成逐级扩散、不断增强的影响范围,以实现威慑效果的最大化。如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将重要交通枢纽、电力设施等作为轰炸目

标,试图使南联盟民众在无法面对面应对敌人的情况下,产生心理恐惧。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更是通过高调宣传“炸弹之母”的威力、使用爆炸声巨大的特种炸弹等方式,从视觉、听觉和心理上全面影响民众意志。在威慑谋略上,通过示形造势行动,力求以最小代价达成最大威慑效应。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展开高强度心理威慑,炫耀新兵器效能,主动“泄露”战略和战法,全程进行战略战术欺骗,有选择地允许媒体参与战争过程等,有效放大了威慑效应。

当前,军事威慑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已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运用,威慑理念、威慑目标和威慑手段正发生深刻变化,以军事威慑手段化解危机、遏制战争、营造环境正成为提高军事力量运用战略效益的重要选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运用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武器的加速发展,使战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破坏等特征较以往更为明显,战争需求与经济承受能力、战争残酷性与国际舆论压力、战争有限性与战略效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要求世界各国必须充分运用军事威慑手段,尽可能以较低的投入来实现战略目的,尽可能减少战争手段的运用,尽可能遏制战争和避免战争升级。

第二节 我军军事威慑体系建设

新的形势下,我军需要深刻理解和运用党的有关军事威慑的战略思想,准确把握信息化条件下军事威慑的特点与需求,科学确立威慑体系的基本构成和发展目标。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战略威慑思想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我军形成了人民战争、积极防御、以战止战、有限核反击以及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慑战略思想。从总体上看,新中国军事战略威慑思想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特点体现为:

把遏制全面战争作为威慑的基本目标。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以积极备战、敢于应战、预防升级作为战略威慑的重要基础,将威慑能力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以及相关军事斗争准备显现出来,实现了遏制全面战争爆发的目的。

以充分的战争准备作为慑止战争的基本途径。毛泽东多次强调充分而必要的战争准备对于慑止敌人入侵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的,你准备不好,敌人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20 世纪 50~70 年代,在东部沿海、西南边境和“三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战场建设,开展了以大、小“三线”建设为主体的战略后方建设,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70 年代中期以后,针对苏联可能入侵的威胁,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战略思想,为慑止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发展核武器作为遏制核威胁的重要物质基础。毛泽东认为,要打破核垄断和反对核讹诈,就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①;“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搞起来吓吓人,壮壮胆”^②。80 年代初,邓小平也指出:我们有一点核武器,这本身就有压力的作用,“要迫使超级大国不敢使用”;“我们那一点核武器算什么!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③。他明确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 年 4 月 25 日。

② 《毛泽东听取国家科委汇报科技 10 年规划时的指示》,1963 年 12 月 16 日。

③ 《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时的谈话》,1983 年 11 月 29 日。

表述导弹核武器是“威慑力量”和“威慑武器”，坚持常规力量与战略核威慑力量相结合，不断提高武装力量的实战能力和整体威慑能力。

把人民战争作为军事威慑的根本基础。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结合各时期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以人民战争来慑止侵略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多次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彻底打败侵略者。邓小平也曾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①“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②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出版的《军事战略》认为，人民战争是中国独有的威慑战略，“这种威慑已证明完全像西方比较现代化的威慑一样有效”^③。正是以人民战争之伟力作为坚实基础，我军的军事威慑形成了整体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与单纯依靠武装力量的某一优势实施威慑的思想有着重要区别。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主要特点体现为：

把威慑提到战略高度。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高度重视威慑问题。1993年中央军委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将遏制战争作为战略指导的重要内容，强调“通过战略威慑遏制战争，或延缓战争爆发，或制止战争升级，避免或减少战争破坏”^④。军事斗争积极同政治、外交、经济斗争密切配合，努力改善国家的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使国家经济建设免遭战争的冲击。

注重提高威慑的可信性。江泽民明确提出，要研究新形势下军事威慑的可信性问题。一方面坚持把核武器作为军事威慑的核心力量，确保有限有效的核威慑；另一方面强调要着力构建适应高技术战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6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第1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逐步形成多种手段配合的战略威慑体系”^①。江泽民高度重视铸造以“杀手锏”为核心的新威慑能力，强调要“抓住几个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杀手锏’”^②。

重视发挥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威慑作用。江泽民指出，“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变化，人民战争都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个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③。要求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思想，努力创造出一套高技术条件下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威慑效能。江泽民强调发展综合国力对于增强军事威慑的重要性。他多次谈到，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弱”主要是指实力上的弱，我国今天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归根到底靠增强综合国力。“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④

第三阶段为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主要特点体现为：

把维护战略机遇期作为军事威慑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来之不易，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更要付出艰巨努力”。强调“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就要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359、42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37、41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和谐的社会环境”^①。防范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化解危机、遏制战争,有效慑止各种局部冲突与战争,避免冲突与战争升级,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被干扰甚至打断的关键所在。

把预防和遏制危机作为军事威慑的重要着力点。在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础上,把遏制危机作为遏制战争的重要前提,增强遏制危机的预见性、主动性和时效性,以积极的行动和措施防范、控制和处置危机,不使危机发生或升级演变为军事冲突和战争,努力化解和消弭战争风险,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以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作为增强军事威慑能力的重要牵引。胡锦涛指出:“当前,我军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②反复强调以军事斗争准备作为龙头和抓手,“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发展,实现部队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防护能力和信息能力整体提高,增强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③。

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作为军事威慑能力的核心。胡锦涛指出,要“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确保我军能够在各种复杂形势下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强调要“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⑤。信息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7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16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20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19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20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化条件下的威慑能力,突出体现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把军民融合作为提高整体威慑能力的根本途径。胡锦涛明确提出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战略思想,强调军民融合式发展,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使国家整体威慑能力具备更为丰厚的资源和更为强大的持续发展后劲,拓展了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威慑功能的内涵。

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看,中国的军事威慑具有自卫、防御、有限的根本属性,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从根本目的看,中国的军事威慑是为了遏制外部侵略,防止冲突升级为战争,或对霸权式的威慑实施反威慑,而不是以武力对他国进行威胁或“胁迫”,更不是为了谋求地区和全球霸权。从运用方式看,中国的军事威慑强调各种力量的综合运用,立足于包括人民战争在内的总体力量运用,是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而不是单纯立足于军事力量运用,更不是把军事威慑作为主宰他人的工具。从战略指导上看,军事威慑服从于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立足战略上的自卫、有限和后发制人,力争以慑止小战来遏制大战,严格控制威慑目标,是对自身遭受侵略或利益损害行为的积极反应,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和先发制人。

二、准确把握牵引军事威慑体系建设的基本需求

确立牵引军事威慑体系建设的基本需求,必须着眼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国家安全利益发展的基本趋势,客观分析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我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其来源,找准军事威慑力量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努力形成具有多重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的力量体系。

从总体上看,未来牵引我军威慑力量体系建设的基本需求主要体现在:

一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基本需求。努力营造国家发展所必需的战略稳定态势,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安全统一处于一个可控、稳定的基本态势,为国家和平

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安全需求。其核心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多种手段为依托,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和平发展的干扰和牵制,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不确定安全威胁因素的影响,努力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形成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态势。这要求军事威慑体系建设,必须以防范和有效应对重大国际事件和地区危机冲击为根本,将营造有利战略态势作为平时威慑的重要着眼点,增强军事威慑体系的全球战略平衡能力。

二是遏制信息化条件下局部冲突与战争的基本需求。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调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各种危机和冲突爆发的时机、地点和样式呈现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等特征,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发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防范危机升级为局部冲突和战争,是我们不得不时刻面对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我军军事威慑体系建设,必须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突出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着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努力使遏制冲突和战争爆发的意愿具有日益强大的军力支撑。

三是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权益和海上通道安全的基本需求。捍卫国家领海和海洋权益,保卫国家日益发展的海洋产业、海上运输和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是保障国家发展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求我在威慑体系建设过程中,着眼和平时期增强保卫岛礁、海上巡逻、宣示主权、海上维权等海上军事行动能力需要,以提高海空军事力量的投射效应为核心,以提升近海综合作战和远海防卫作战能力为根本基础,以执行海上国际联合巡逻、海上护航、反海盗活动和打击海上恐怖活动能力为重要形式,努力形成力量存在与能力辐射双重效应相结合的海空力量体系。

四是应对太空、信息等新型挑战的基本需求。太空是当代国际竞争和对抗的新领域,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制高点。信息优势、网络

优势正成为信息化条件下获取军事行动优势的核心,是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一些军事大国致力于发展新概念武器,加强太空、电磁和网络空间的开发与控制,着力抢占这一新的“制高点”,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从长远看,来自太空、电磁和网络空间的新型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要求军事威慑体系建设,着眼新型安全领域的本质特点,充分开发利用太空资源和网络资源,重视战略性反制手段和战略性防御手段的双重发展,形成平时与战时高效衔接的新型力量体系。

五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基本需求。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明确提出,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期望也越来越高,特别是近年来我军参与国际反恐、国际维和、联合演习、海上护航等涉外军事行动的频度与规模不断增大,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震慑和打击“三股势力”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所奉行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追求像美国那样的全球型军事力量,但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稳定,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有限目的、有限能力的对外辐射力量体系,积极实施以本土为依托的跨区域军事行动,在全球范围执行国际维和、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势力等军事任务。这要求在军事威慑体系建设过程中,以增强跨区域战略投送和远程机动能力为重点,形成能够支持全球性有限军事行动的作战力量。

三、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威慑体系

威慑能力源于实战能力,威慑力量的构成与作战力量的构成并无质的区别,威慑力量寓于实战力量之中。只有加快提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战能力,才能有充分的能力基础实施战略威慑。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世纪新阶段军队使命任务为牵引,按照“核常一体、慑战一体、慑控一体”的基本发展思路,切实找准威慑力量建设的着力点,充分发掘新的威慑资源,努力拓展多种

威慑功能。

从总体上看,我军威慑体系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精干有效的核打击力量。应深刻认识核力量在确保大国地位不动摇、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以及在营造和平发展安全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坚定发展有限而有效核力量的决心,切实将核力量作为威慑体系的支柱。当前,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应以提高核武器系统信息化水平为核心,加强指挥控制、战略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建设,不断增强信息化条件下的突防能力、防护生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能力等,努力提高核威慑的可信度。

信息化的常规作战力量。应以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为核心,注重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以栅格化信息网络为依托的陆、海、空、天、电一体化信息支撑环境,着力推进战场感知、指挥控制、精确打击、综合保障等能力协调发展,将威慑能力拓展寓于信息化体系作战能力的不断提高之中。

具备局部优势的信息攻防力量。坚持在战略上实行积极的信息防御,在不断增强信息网络体系防御能力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信息战武器装备为主要作战手段、专门遂行信息战任务的信息作战部队,努力发展多样化的信息作战攻防手段,有效防范和慑止敌人对我发动大规模信息入侵。

灵活多样的空间力量。应以具备保障空间自由利用和高效完成战略预警、战略侦察任务能力为核心,加快提升空间信息支援能力、信息防御能力和信息控制能力,增强自身抗打击、抗干扰、抗毁伤能力,不断提高维护国家空间安全的能力,有效遏制和慑止敌人对我进行空间威慑和攻击的企图。

创新发展的人民战争整体威慑力量。建立快速高效的国防后备力量动员体制和适应性强的战略产业,努力增大国防后备力量的科技含量,推进地方专业化力量与未来作战信息化保障的有机衔接,突出抓好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动员和综合保障动员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战争潜力的快速转化能力,增强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整体实力。

第三节 军事威慑的战略指导思想 and 原则

我军军事威慑手段的运用,要以党的有关军事威慑的战略思想为重要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基本依据,在充分考虑世情、国情、军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紧密结合军事威慑发展实际,立足于在新的起点上解决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立足于应付最困难最复杂的局面,不断丰富创新军事威慑的理念和形式。

一、科学确立军事威慑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 坚持把控制危机、遏制战争作为根本任务

军事威慑的根本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战略,依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当前,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外部对我发动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危险已基本排除,但国家安全威胁所呈现出的复杂性、综合性和不确定性日益明显,由危机、冲突升级而诱发局部战争的危险也始终存在,已成为干扰甚至中断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因素。这要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坚持把控制危机、遏制战争作为军事威慑的根本任务,着力降低各种危机、冲突升级与扩大的风险,尽最大可能防范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消极影响,努力以较低的代价、更为灵活的方式和更加可靠的手段为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提供保障,维护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就要求在战略指导上必须增强前瞻性、主动性、灵活性,不仅要立足于遏制现实战争威胁,更要立足于预见危机、化解危机、应对危机,尽最大努力控制危机和冲突的发生,努力运用一切手段遏制战争、延缓战争的爆发。

(二) 坚持把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和争取战略全局主动作为谋划基点

在和平时期,军事威慑体系及其蕴含的威慑效应,具有显著和持续的战略影响力、慑止力和制衡力,是维护国家安全、运筹国际战略

博弈的重要砝码。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在经济困难、科技落后、人才短缺的艰难情况下,仍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以“两弹一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常规军事力量体系,为国家有效应对大规模战争侵略威胁提供了坚实的威慑力量保证,为争取国际战略博弈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稳固大国地位奠定了客观基础。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威慑力量的建设与运用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有效应对各种现实和潜在安全威胁,更要从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争取战略全局主动的高度,准确把握军事威慑谋划的全局性、主动性和前瞻性。当前,要着眼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本质要求,以有效慑止危害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行为为基本目标,以提升战略预警能力、战略机动能力和战略打击能力为重要牵引,不断加强军事威慑力量的体系化建设,为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和争取战略全局主动奠定基础。

(三) 坚持把创新威慑手段作为提高威慑可信度的重要途径

威慑手段是威慑力量运用方式和威慑能力的外在表现,是威慑能力与谋略艺术有机结合的能动反映,是达成军事威慑预期目的、基本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不断提高威慑可信度,关键在于选择恰当的威慑手段来展示后果的可怕性、严重性和紧迫性。以新理念、新机理、新技术为支撑的全新威慑手段,可以使对手在评估双方军事能力方面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有效打乱对手的原有的战略准备,提高威慑的可信度。特别是以信息、网络、太空、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型威慑力量的出现,使威慑力量运用的机理、方式和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能够形成以非对称威慑方式为标志的新型威慑手段。传统军事威慑力量,也需要创新威慑手段,以便能够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行动时间、地点和方式,形成“老戏新唱”的效果。当前,创新威慑手段必须以推进高新军事技术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为重要依托,努力在一些战略领域特别是新型战略领域形成局部优势,实现威慑机理、威慑理念和威慑方式的新突破。

（四）坚持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根本依托

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军事威慑体系的根本基础,也是威慑力量有效运用的可靠后盾。只有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托,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有效释放蕴含其中的巨大威慑潜力,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应。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根本依托,单靠军事力量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威慑能力。当前,要以构建平战结合、转换灵活,局部作战、举国支援的威慑体系结构为牵引,大力加强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形成一整套分工负责、指挥顺畅、高效灵活的国防动员系统,不断增强国家整体应变能力和转换能力,形成具有综合威慑效力的威慑体系。

二、准确把握军事威慑运用的基本原则

（一）制定明确而有限的军事威慑目标

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总要求,决定了未来我军战略威慑行动必须将服从服务于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全局、服从服务于军事战略方针作为确立目标的根本尺度,以化解危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为基本着眼点,统筹谋划不同情况下战略威慑的具体目标。要依据所面临威胁的性质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阶段性需求,科学、合理地确定军事威慑行动的有限目标,确保威慑的可信性。要根据可以使用的威慑手段和方式来选择合适的威慑目标,避免目标过大而能力过小,或者相反。军事威慑行动升级到何种程度,何时动、何时停,都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全面考虑,要紧紧围绕既定目标进行筹划设计。

（二）调动和有效利用一切威慑资源

努力将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转化为有效管用的战略能力,不断扩大威慑行动的能力基础,不断丰富威慑行动的有效途径。继承和发扬人民战争的优良传统,注重拓展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积极采取提高新型人民战争威慑效能的各种措施。立足整体威慑,合理区分威慑行动中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功能,注重军

事与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多种威慑资源有机结合,军队战备行动威慑与后备力量动员威慑整体联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一体运用,心战与力战协调配合。一旦决定实施重大威慑行动,必须树立敢为必胜的信心,坚定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意志,党政军民上下一致行动,做好由慑转战的充分准备,向对手施加强大的战略压力。

(三) 坚持核常兼备的复合威慑

核力量是我国慑止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根本手段,是维护我大国地位的力量支柱。常规力量是我军战略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主要工具。坚持以核威慑为重要后盾,以常规威慑为基本手段,能够使我军威慑行动具有更为灵活的运用策略,更为广谱的应对范围,更为有效的威慑可信度。要在不断加强我国有限核力量的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深化研究不同条件下核威慑战略的有效运用,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核威慑的有效性、针对性。在常规力量威慑运用上,要努力将信息、空间与陆海空常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慑止不同强度、不同来源、不同形式的安全威胁。

(四) 寓威慑于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之中

战争准备越接近实战要求,就越能体现战略决心和战略能力,其威慑效能也就越高。纯粹虚张声势的威胁和恫吓只会适得其反。在和平时期应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作为相结合,少说多做,寓慑于建,寓慑于备,把威慑意图与行动切实融入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整体进程之中,通过主动调控军事斗争准备的对象、重点、规模和节奏,有针对性地生成和释放威慑效能。低强度行动起码要有中强度行动的准备,中强度行动一定要有高强度行动的准备。只有做好全面而有针对性、持续而有重点的战争准备,才能在低强度威慑失效后视情进行有效升级,直至实现威慑目的。

(五) 注重威慑行动与实战行动的密切配合

一是突出重慑开局。以重兵造强势,以胜势谋显效,特别是要将实力的真实性、报复的可行性、行动的果断性结合起来,显示敢打必

胜的决心、重打狠打的意志。以“预先”威慑“发酵”威慑效应,既体现出作战行动的快速性、精确性和不可抗拒性,给敌方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力争不战屈敌,同时也为由慑转战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坚持慑战一体。以慑助战、以战促慑、慑战并举,实现威慑效果的最优化、实战行动的震慑化。要在关注全局、注重效果的基础上,把握慑与战、进与退的关系,既要争取慑而不打解决问题,又要做好以打助慑的准备。以实战打击增强心理震慑的力度,以心理震慑扩大实战打击的威慑效果。三是做到慑中有控。着力协调战略威慑行动与整体战局发展的关系,主动调控威慑行动的时机、强度和态势,以威慑行动创造有利战机,以威慑力度分化瓦解对手。给敌方留出适当退路,防止其在无路可退情况下殊死一搏。

第八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源远流长,其理论总结不断明晰和丰富。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军事行动样式,已成为军事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涵

军事行动可分战与非战两大类。较之战争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主要属性有二:一是性质非战,二是重在平时。随着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的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引起过军事理论界的探讨。美国最早正式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将正式宣战以及《战争权力法》授权以外的所有军事行动列为非战争军事行动。2001 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又将其定义为“除战争中大规模交战行动之外国家军事力量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国内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有 10 多种。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定义是:“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而进行的不直接构成战争的军事行动。包括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

通常讲,军事行动是指武装力量为完成军事任务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活动。因此,军队从事的所有行动并非都是军事行动,战争之外

的所有行动也并非都是非战争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有限度、有界限、有标准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涵盖面广,即只要不是战争,为达成一定政治目的而展开的军事行动都属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内容包含了军队参与的几乎所有军事行动。狭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慑止战争,行动指向明确,军事和政治意义突出,军事属性和特点鲜明。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狭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更贴近军事实践,更便于在战略上筹划指导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也可避免简单解读并流于泛泛而论。

“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出现在军事术语中,与信息化社会的形态和全球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国家安全观念和军事思维变化的结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手段选择多样化的产物,也是军事行动发展历史性进步的必然。和平与发展时代,战争的控制性大为增强,成本增加,难度增大,使用范围严格受限。以非暴力为特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顺应时代特征,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行动种类不断增多,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使用越来越广泛,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强。总之,非战争军事行动通过力量的和平宣示、体现和运用,对内可消除安全隐患、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对外可营造安全环境、维护国家利益。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和理论发展

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军事思想、军事理念、军事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军事行动内容的充实和完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走在军事理论前面。追溯历史,非战争军事行动早已存在,只是有其事而无其词,鉴于认识、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制约,没有明确用“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个概念来表述而已。

与世界各国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相比,我军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因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遂行了大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拥有丰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既担任战斗队

角色,同时又担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功能,在打仗的同时遂行了许多非战争军事行动,两者并行而为、平行而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曾多次参加平叛平暴、抢险救灾、打击跨国犯罪、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行动,形成了人民军队独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对安全威胁判断的变化,以及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后对利益拓展认识的变化,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常态化的军事行动。从应对国内发生的洪灾、雪灾、地震、非典、反恐维稳和重大社会动(骚)乱,到境外参与印度洋海啸救援、巴基斯坦和伊朗地震救援、亚丁湾护航、热点地区国际维和、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行动,日益呈现行动种类增多、行动范围拓展、行动频率增高的趋势。

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即使在国家军事安全关系紧张的冷战时期也不少见。尽管准备战争、实施战争是当时一些大国军队建设的主要动因和军事行动的主要样式,但非战争军事行动也不时出现在军事大国的军事战略指导、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议程中,多以危机的形态呈现,以危机管理方式进行处置。其中,德国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伊朗人质危机等事件中的军事力量运用,堪称国际上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经典案例。冷战结束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受到重视的程度也前所未有,最大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可能引爆世界战争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不复存在,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的战争威胁明显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战争的适用性、应用性需求下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需求性和适用性相应增高。世界各国军队都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任务,非战争军事行动逐渐成为各国重要的军事行动样式,尤其在国际救灾、反恐、反海盗、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肯定。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各国的政治和军事议程,成为影响军事决策的重要议题,以及影响国家安全和牵动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最早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美国来看,苏联解体使美国一时失去了明确的主要敌人,短期内看不到出现大国间战争的可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军事战略指向陷于迷茫,美军遂行了许多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包括对原苏联地区实施人道主义救助的“送希望”行动、对孟加拉国水灾实施的“海天使”行动、从利比亚撤送侨民的“利刃”行动和在索马里进行的“恢复希望”行动,以及此后遂行的印度洋海啸救援、多国地震救援、“卡特里娜”飓风救助、亚丁湾护航等。这些行动尽管规模有限、范围不大,但都在国内产生了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在国外树立了某种和平的国际形象。在世纪之交,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评价美军职能变化和拓展的一个重要标志。“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对其国家安全重大、迫切的威胁,在开展反恐战争的同时,高度重视以非战争军事行动应对其他多种威胁。

其他大国也顺应时代变化和形势发展,认识到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性,积极推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虽然许多国家并没有明确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称谓,但都转变了对新时代军事行动的认识,增加和拓展了军队的职能,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军队遂行的重要任务之中。俄罗斯军队在波黑、科索沃和独联体国家执行了大量的维和行动任务,派核潜艇在北冰洋游弋、派远程航空兵巡航南美洲、在亚丁湾进行护航等。日本也趁机突破宪法约束,派自卫队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印军也参与印度洋大海啸救援行动、多国地震救援、黎以冲突中的撤侨,以及打击亚丁湾海盗行动等。近些年来,大国频繁举行各种层次、规模、科目的联合军事演习,持续支持国际维和行动,显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安全议程上的重要性。

可以预计,随着国际环境 and 安全威胁的新变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将越来越频繁,将把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军队的重要职能,其行动样式也会越来越丰富。作为军事

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战争军事行动将不断丰富和扩大军事实践活动的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军事实践推动和促进军事理论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是对军事行动特点的新概括和新表述,也是军事理论发展中的新内容。国内外大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冷战结束以后,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并得以确认。美军率先将非战争军事行动提到军事战略的高度,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首次阐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意义、行动原则、组织计划和种类样式,初步奠定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基础。1995年,美军专门出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JP-07),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非战争军事行动及相关理论要素。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发起科索沃战争,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将所谓的人道主义救助作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核心,与重点打击、精确打击等现代战争方式相协调,与战争理论相融合,使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得到嬗变与提升。2001年,美军颁布新版《联合作战纲要》,将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并列为美军的两大主要行动类型,明确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指导。2006年,美参联会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又明确将《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并入其中。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是对战争理论特别是战区作战理论的补充,并不是单纯地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解读。美军虽然放弃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但其非战争军事行动类型依然完整地保留在新版《联合作战纲要》中。10多年来,在实践中构建的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战略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推进战争理论研究的同时,纷纷跟进研究非战争、非暴力、非常规军事行动和特殊战争等方面的理论,并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各国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称谓不尽相同,但内容大体一致,主要表现为:以综合安全观为基础,突出与战争行动的一体化运用,强调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现

实功能及其法律规范。俄罗斯、法国、意大利、日本、印度等国均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写入作战条令,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明确了军队在军事训练、军事装备、力量建设、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的细则,确保合理合法地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俄罗斯强调采用非战斗和非传统方法的“特殊行动”可以达成规定目标,日益重视非实战手段运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营造军事态势方面的功能。英、法、德、意等北约成员国普遍认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作用,并将其置于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位置。日本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自卫队行动的法律法规、国防政策和军事理论。200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阐释了非战争军事行动。随后,又出台《反恐特别措施法》《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国际和平合作法》《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和《灾害对策基本法》等,具体指导自卫队进行反恐、支援地方重建、参与国际维和与救援,以及应对大规模灾害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印度在国家层面出台了《灾难管理法》,在军队层面明确了军队在境内外反恐、参与国际维和、海上反海盗等方面行动的细则,突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功能和地位。

一段时间以来,我军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规律的认识,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军事行动的关系、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系、核心作战能力建设与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的关系等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并着力解决诸如指挥控制、体制编制、结构调整、专业训练、武器装备、法律建设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新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随着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的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理论内涵还将不断拓展,并且与战争行动理论一起构成军事理论的完整体系。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在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在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主

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是达成国家政治意图的重要战略手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政治的需要。军事战略的最高目标是为政治利益服务，非战争军事行动同样始终围绕国家的政治目的，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配合外交斗争开展。许多情况下，非战争军事行动由政治因素主导，可以直接达成政治军事目标。某种程度上，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战略应对手段，以其“不战”和“非对抗”的鲜明特点，通过展示和平之师的形象，更容易与潜在的战争对手、可能的竞争对象建立新型的军事合作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更容易达成政治意图和目标，有利于我国维护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平时贯彻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体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斗争的最高境界，也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应有之义。非战争军事行动体现了中国传统军事安全理念的要义，也反映了平时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特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军拓宽了军事斗争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把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平时军事实践的重要领域。在新形势下，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就要把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重大战略实践，作为重要战略举措，不断加强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履行新使命的重要手段

使命任务是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行动的牵引和指向。鉴于国际和国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军队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保障国家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承担新的使命，完成新的任务。非战争军事行动功能拓展、样式众多，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任务，可以从多个领域、多个层面，消除多种安全隐患，维护国家多重利益，切实履行好新的历史使命。

（四）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支撑利益拓展的有效途径

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是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全球化、信

息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及其拓展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单纯来自某个或某些敌对国家(集团)的传统威胁,而是一种混合形态的威胁。既有传统安全威胁,亦有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中有些威胁是难以预期的和不确定性的。需要多方准备、统一协调,通过战争准备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同时、全面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其相对和平的方式,以及军队本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威慑作用,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支撑国家利益向全球范围拓展。

(五)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工具

非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基本属性。在历史长河中,战争是一个特殊阶段,一旦战争爆发,非战争军事行动将纳入战时议程。但在相对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下,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发挥军事力量作用的重要方式,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积极而有效地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有利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尤其面对日益增多的共同安全威胁,通过一系列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弥合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增进各国军队的了解和互信,有力地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

(六)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提升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方式

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范围非常广泛,所需技能复杂多样。鉴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主体一致、指挥部门归一,两者在力量建设、精神素养、能力生成、机制准备、信息保障、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要求相近,在战争爆发几率降低的情况下,通过积极参与反恐、反海盗、实施救援、预防和遏制危机等行动,可以考察领率机关和部队指挥机构的组织指挥能力,检验军事斗争准备的方式、程度和效果,考验军队的综合素质,提高战争准备水平,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类型和特点

非战争军事行动围绕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的需要在多个领域实施,类型多样、特点鲜明。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主要类型

世界各国依据各自的安全定位、安全需求、军事态势和军事任务,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类别作出不同的划分,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仍有诸多相同相近之处。美军多次调整和归纳非战争军事行动类别,项目有增有减,但总体上包括国家援助、安全援助、人道主义援助、抢险救灾、反恐怖、缉毒、武装护送、情报的收集与分享、联合演习、显示武力、攻击与突袭、撤离非战斗人员、强制实现和平、支持或镇压暴乱以及支援国内地方政府等内容。其他国家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类型划分与美国重合多于区别。

我国学术界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分类多达十几种,意见并不统一。如对是否将军援军贸、军事外交、军事威慑等列入非战争军事行动就存在不同看法。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从性质、规模、程度、空间和目的等方面分类,切入的视角不同,类型区分也不同。比如,按性质分,有敌、我、友三种,第一种以威慑和低强度暴力行动为主,第二和第三种则以和平救助行动为主。按规模分,有大、中、小三个类别,或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等级,既有两个以上战区部队或两个以上军种(武警)参与,由总部指挥协调的,也有以战区或军种为主指挥的,还有军以下部队在局部地区遂行的行动等。按程度分,大范围且事态严重的投入较大力量,影响一般的投入中等力量,个别情况可能仅需投入专业性力量。按地理空间分,可分为境外(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境内非战争军事行动。按目的分,可分为政治目的行动、经济目的行动、军事目的行动,以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目的行动等。综合起来看,还是从军事行动的属性出发,以行动的性质为主,结合样式划分较为合理。据此,可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分为对抗性行动、执法性行动、救助性行动和合作性行动四大类。

对抗性行动:主要包括反恐、武装缉毒、打击跨国犯罪、反海盗和制止社会骚乱暴乱等行动样式。行动对象多以敌性的个人、集团(组织)、国家面目出现,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主权权益安全、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行动范围大多有限,通常以边境地区和国内某一地区为主,也可在境外;行动的目的在于消除危及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带有暴力性质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行动的过程不时呈现低强度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形态,特殊情况下短时间内行动的强度和烈度可接近战争行动;行动手段包括监视、强制、侦查、控制和打击等。

■ **执法性行动:**主要包括边海防封控(锁)、空中警戒(封锁)、海上维权、护航、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军事巡逻等。行动对象主要是一些敌性国家(集团)、组织和个人;行动范围多在国内,或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和国际热点地区;行动目的在于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维权执法活动,应对危及安全和发展的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挑衅行为,遏制事态升级扩大,消除重大不安定不稳定因素,恢复和保持正常的安全环境和社会秩序。

■ **救助性行动:**主要包括抢险救灾(境内外各种自然灾害、重大灾情救援和核生化事故的处置等)、撤侨护侨、医疗救助等。行动对象既有特定群体、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有生产生活设施和自然环境;行动范围广泛,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且国外救援行动呈增多趋势;行动环境相对复杂,不可测和不可控因素多,对行动时间和手段的要求高;行动重在应急,主要是在危机和特殊情况下的救助和支援行动,容易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救助性行动基本上以和平形态呈现,有时可能处于危机和紧急事态背景下,但不具备冲突的动机。

■ **合作性行动:**主要表现为国际联合军演,根据不同形势需要,多在周边重要地区和海上进行。通过跨国联合演练,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军事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显示联合用兵的决心和实力,以震慑共同的对手,控制现实和潜在的危机,稳定地区的局势。

■ 以上四类军事行动包括多种行动样式。其中第一种包含着一定的武力运用,并有升级的可能,但武力运用强度低,构不成战争的层级;后面三种重在平时,利在长远,运用频率较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常见样式。近些年来,我军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反

恐、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报警戒、国际维和、反海盗以及日益增多的国际联合军事演习等已成为经常性的任务。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主要特点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但作为以“非战”“应急”为本质特征的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在性质、对象、任务范围、行为方式、行动要求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暴力程度低,局势相对可控。非战争军事行动以非暴力为原则,以不直接构成战争冲突或导致国家间武装对抗为界限,通常使用有限的常规武器装备。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在平时实施,目的在于应对危机事态,维护国际安全环境,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用兵而非交兵,武装力量以救援者、合作者、执法者面目出现,只是作为一支特殊的、有组织、有战斗力的力量来使用,从精神上震慑对手,从事态上控制局势,是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基本要求。部分非战争军事行动比如反恐、平暴等,虽可以使用武力,但情况特殊、规模较小、目的有限、局势可控。

综合性强,协同要求高。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力量多元,很多情况下都是军地军民一起行动,国际行动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部门,组织工作复杂,协调难度大,需要军队与多个机构、部门相互协作完成任务。有些情况下行动以军队为主,地方配合;有些情况下行动以地方为主,军队配合。境外遂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涉及外军,还需要与相关国家的民事和军事部门以及国际机构建立协同合作关系。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不同阶段,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行动的角色、任务、作用相互交叉,相互转换,军队需要与其他部门甚至外军建立和保持紧密不间断的协同与合作关系。

对象复杂,手段运用多样。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对象有国家、集团(组织)、个人甚至自然界,任务多样、手段多元。有些行动跨战区、跨国境,行动环境不确定,对象陌生。适应不同对象,行动的任务构成、力量架构、协同配合、资源调配、后勤保障以及媒体管控等方面的

处置会作出相应调整。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样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需要运用不同手段,有时同一样式在不同时空也需要不同手段。许多情况下,非战争军事行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综合性、复合式手段或转换多种手段加以处置。

辐射面广,影响范围大。非战争军事行动虽然规模有限,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媒体的传播作用下,其影响常常会超出国界。有些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性强、敏感度高、关联性和辐射面广,涉及国际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国际国内媒体密切关注,其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会实时在国内外传播。积极传导行动的正能量,有助于树立军队和国家的良好形象。但一些别有用心势力或抱有偏见的境外媒体,总是寻机歪曲事实、夸大渲染负面消息,诋毁我之行动。行动稍有不慎或媒体管控不力,就可能成为他人政治攻击的口实。

政策性强,约束限制较多。非战争军事行动决策由国家 and 军队高层作出,主要由军队执行。遂行任务政治要求高,政策性强,受到规模、方式、手段、环境、法律和道义等多重制约,必须坚定、合理、稳妥,需要高度重视和全面考虑军事行动的政治目标、政策执行和法律规范的关系。在边海防地区、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尤其是境外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要了解国际法,相关国家的政情、军情、民情以及当地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要熟悉和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要把握好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合情、合理、合法。

资源需求有限,战略效益较高。非战争军事行动往往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区域,涉及局部利益,应对局部损害,一般不需要调动全社会、全军的资源。而一些非战争军事行动,如抢险救灾、打击暴力恐怖势力等,举国关注、战略效应显著。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取得最大的战略效益,既是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之客观需求,又是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主观诉求。

风险相对可控,但难以完全排除事态升级的可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控制事态升级和避免战端。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过程中,要作为一支和平性、建设性力量积极发挥作用。然而,有些对抗类非战争军事行动蕴含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对抗类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常常在敌性国家(集团)之间发生,有可能成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索,始终存在着激发和转化为战争的各种因素,如战略互疑、利益冲突、政策对立、竞争加剧等。如果其中一种或几种因素的程度加重或进程失控,就有可能引发战争。

第三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原则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原则,是组织和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基本依据和准则。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应遵循以下战略指导原则:

一、高层决策,宏观协调

非战争军事行动,通常针对的是背景复杂、影响重大、演变难测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关联全局的突发事件。事发属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平时工作相对独立,力量分散。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需要统一指挥协调,由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具体情况和有关方面的需求作出决策,下达行动命令,作出行动部署,明确行动要求。如国内反恐、维稳、安保任务,多是由地方党委、政府和公安系统提出要求,国际维和与灾难救援则是应联合国要求。军队领率机关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针对事件发生的地区、性质、规模和力量需求等情况,调动部队、武警和预备役专业力量。也可授权相关战区或海空军、武警总部指挥机构代行组织指挥职责,进一步明确军队、武警部队指挥协同关系,并从高层协调与国家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军队负责指挥行动的机构,要与地方有关部门形成高效的协同机制,围绕达成共同目标协调行动。

二、掌握主动,分类指导

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前,各级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变化,按照部队可能担负任务的性质、特点、规律和要求,及时修订行动预案,做好随时介入行动的准备,争取主动。当军队或武警部队受领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时,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了解任务、领会意图,同步组织部队、展开机动。指挥机构应积极主动与地方有关部门建立联系,掌握部队任务所在区域的相关情报信息。当行动任务属于作战或战备勤务性质时,组织指挥程序及通联方式必须严格按军队或武警部队的指挥原则组织实施;当行动任务属于维护社会稳定、反恐、防范或消除危害因素等武装执法性质时,军队通常要接受国家专设的应急指挥中心指令,与公安、武警等协同行动;当行动任务属于紧急抢险救助性质时,军队和武警应积极协助国家或地方行政领导机构,组织指挥部队和各种专业救助力量投入救援行动。

三、因情施策,灵活反应

根据事发动因、背景、地域以及可能影响的不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目的、性质、方式和要求也不尽相同。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作出综合评估判断,依据情势发展的轻重缓急、事态涉及的范围和影响,果断、灵活、迅速地采取行动,防范事态突变、升级失控,圆满完成任务并做好善后工作。通常应根据平时的战备方案或应急行动预案,迅速判明情况、定下决心,根据上级命令和指示投入行动。当执行采取强制性措施或以武力控制局面、消除危险目标等任务时,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严密组织,动用有效手段实现既定目标。执行常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时,应根据上级对执行任务的总体要求,充分准备,集中精锐,周密编组,科学分工,制订多种预案,确保行动万无一失。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恶性事故灾害、严重的次生灾害时,军队、武警及预备役部队都应在接到上级命令和指示的第一时间,集中人员、装备,根据任务和行动预案,迅速做好准备,展开各

项工作。

四、目标有限,控制有力

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有其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影响,有时还会产生重大国际性影响。尤其是反恐、平暴等性质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敏感度高、对抗性较强,事态紧迫复杂,处置不当就可能陷于被动。军队参与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时,必须指向明确、目标清晰,把握好“有理、有利、有节”的分寸,师出有理、应对有案、处置有度。依据任务性质和要求,合理确定行动目标,符合政治要求,契合战略目的;合理选择行动方式和手段,慎用重兵重装;严格控制行动规模和范围,明确行动规则,尽量减少附带损伤,避免产生负面后果。处置重大危机事态,要以坚决而适度的军事行动显示决心意志,以迅速果断的行动和有力手段控制局势发展,严密防控事态升级或演变为于我不利的被动局面。

五、依法行动,把握政策

非战争军事行动要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和法理法规的框架下进行,严明法度,彰显道德和正义,恩威并举、刚柔相济。要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揭露对方的罪恶行径,威慑遏制违法活动,分化瓦解受蒙蔽群体,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护群众,孤立和打击少数违法首恶分子,确保行动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要坚决果断地依法惩处顽固不化、负隅抵抗的首恶团伙。在反恐、制乱和平暴行动中,以法律为准绳,对于那些经劝解无效、拼死抵抗、危害极大的顽固分子,应坚决采取强制性措施。军队、武警在遂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全过程中,要实施统一的舆论管控,由党和政府组织权威媒体,适时发布客观公正的信息,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要时还应对境外媒体的通信传输实施监控和限制。

第九章

核、天、网领域军事斗争

核、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军事斗争,关系国家安危和战争胜负。自核武器问世以来,核领域的战略较量从未停息,当前又面临新的发展态势。核力量建设跨越国家、军队、军兵种多个层次,核战略同时具有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军种战略的特性。太空、网络作为新领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正常运转和军事活动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支撑,对经济社会、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影响。它不仅军民一体、军民合用,在军事上的建设和运用也远远超出某一军兵种、某一部门的范围,覆盖了所有军事领域,影响着各种军事行动。核、太空、网络等重大领域军事斗争的突出特点,对战略筹划和指导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研究与把握。

第一节 核领域军事斗争

核领域军事斗争,主要是有核武器国家(集团)之间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使用核手段进行的对抗性活动,包括核威慑、核实战、核军控斗争等。核领域军事斗争在有核武器国家的军事战略全局中举足轻重,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影响世界形势的重要途径。中国掌握核武器后,一直面临激烈复杂的核领域的军事斗争。随着世纪之交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关于核领域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也应适时充实完善。

一、核领域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新趋向

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大国综合实力的消长与竞争,使国际核领域的斗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向。

(一)美俄持续核裁减,但“无核武器世界”仍遥不可及

冷战结束以来,美俄进行了多轮次核裁减。到2009年年底,美俄核弹头数量较之冷战时期减少约3/4。按照美俄两国2010年签署并于2011年2月正式生效的新核裁减条约的规定,2020年前,美俄实战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将进一步裁减到1550枚以下。目前,美国还在酝酿新的核裁减计划。

美俄大量裁减核武器,虽然使国际核裁军不断向前推进,但距离实现中国坚持的“彻底消灭核武器”的主张,以及美国近年来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仍很遥远。首先,美国仍然将他国彻底消灭核武器,作为自身消灭核武器的前提。2010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世界上只要有核武器存在,美国就将维持一个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武器库。2012年1月,美国公布的《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防务战略指南),重申了这一立场。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性能最先进的国家,遵循这样的逻辑,与其宣称的“无核武器世界”目标自相矛盾。其次,极少数无核武器国家在努力发展核武器。受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历史、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将拥有核武器看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想方设法推进各自的核武器发展进程。

(二)核大战危险相对下降,但核大国核战略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核对抗形势缓和,爆发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核武器主要用于威慑目的的特性更加凸显,其发挥作用的范围进一步向防止核战争爆发、捍卫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方向集中。核发展不再处于世界大国核较量的激烈环境中,削减核武器的数量和规模的可能性有所增大。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优势持续

扩大、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加速构建的背景下,通过减少核武器数量、限制核武器发挥作用的范围等,进一步降低了对核武器的依赖。

虽然影响核武器使用的因素众多,但美国、俄罗斯在最能体现降低核武器作用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仍然奉行建立在首先使用核武器基础上的核威慑战略。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核力量始终处于随时可用于核突击的高戒备状态。美国在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保留甚至还加强了必要时能快速扩充核力量、增加核实力的人力、技术资源和基础设施。俄罗斯正在加紧装备新型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发射平台,实施导弹核武器的更新换代。美俄核战略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核领域的竞争和较量仍在激烈进行。

(三) 中国面临的核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近年来,我国面临的核安全形势总体上趋于复杂。一是中国核斗争面对的主要对象是世界上核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加紧在东亚地区构建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实施核反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构成日益严重的影响。二是中国周边有核(潜在有核)武器国家增多。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多次进行核试验,一举跨进世界核国家俱乐部,特别是印度核实力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后,朝核问题持续发酵,短期内彻底解决的可能性很小。三是世界主要国家大力发展新型常规军事能力。美国正在实施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计划,一旦形成实战能力,用于对我导弹核力量实施常规打击,将使我处于被动地位,大大影响我核反击能力,削弱我核威慑效能。四是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外部压力也相应增大。中国核武器数量规模同美俄远不在同一层次上,随着国际核裁减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有限核力量的现代化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二、核威慑

核武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主要是一种威慑性武器,威慑运用是核力量运用的基本方式。核力量实战运用的首要目的也是要增加

核威慑的有效性。无论是拥有核国家、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以及核门槛国家,其核战略思想无不首先表现为核威慑。因此,核威慑也是核领域军事斗争的主要样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威慑战略的持续演进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 中国核威慑的主要特色

威慑对象的针对性。中国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公开宣布和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地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就将我国核力量运用、核威慑对象限制于有核武器国家。中国的核威慑只针对有核武器国家,对有核武器国家才起作用。

威慑目的的有限性。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和运用核武器的目的,集中在防止敌对国家对我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上。中国的核威慑不会用于慑止非核的敌对军事行动,在其他非核军事领域的作用也不明显。将核威慑的作用范围局限于其他核国家的敌对核行动上,使中国的核威慑目的及作用范围进一步聚焦。

威慑方式的防御性。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只有在敌对国家对我使用核武器之后,才运用核武器自卫。中国的核威慑建立在有效反击基础上,通过能够给敌方造成不可承受的核毁伤的实力以及可能性,达成慑止敌方核进攻的目的,是防御性的核威慑。

(二) 中国核威慑运用重点把握的问题

第一,重视核武器的存在性威慑作用。核爆炸具有超强的杀伤破坏作用,而导弹等核运载工具难以被完全防御拦截,所以一个国家只要有了核武器,有了基本的核反击能力,不管核武器数量多少,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活动产生潜在影响和制约,为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发挥作用。这种基于核武器本质属性,且不因核力量规模、实际能力强弱而明显变化的作用,就是核武器的存在性威慑作用。中国最初决定发展核武器,旨在打破核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是典型的存在性威慑战略。后来发展核武器也遵循“你有,我也有”以及“核武器存在本身就是威慑”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核

武器的存在性威慑作用,遏制核威胁和核战争爆发,仍然是国家战略和核军事斗争的基本目标。需要树立“建用合一”的观念,寓核威慑于核力量建设发展的过程之中。需要继续坚持“少而精”的核力量发展原则,将核力量建设的重点放在切实提高核反击能力上。

第二,坚持“以核制核”的报复性威慑思路。大国所掌握的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力几乎达到了人类能力的极限,只有在用于应对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威慑作用才真正可信、有效。核战争威胁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极端最严峻的安全威胁,“以核制核”是有效发挥核武器作用的合理选择。从另一个方面看,核毁伤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而对有核武器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必定会遭到对方的核报复。避免遭受灾难性核打击后果的最好方法,是双方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的发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深刻认识到核武器作用的本质与规律,在与霸权主义国家的核军事斗争实践中,确立了“以核制核”的报复性威慑思路,正确而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的核威慑实践。防止未来核战争爆发,仍然是中国核力量存在和运用的战略目标。要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动摇,通过增强核反击的实效来确保核威慑的可信、有效。

第三,慎重把握核威慑策略。中国的核力量不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同美俄等世界核大国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慎重把握核威慑策略,对提高中国的核威慑效能有重要意义。一是适度模糊。军事思维具有就重不就轻、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取向。在核威慑问题上保持适度模糊,让对方去猜测中国核实力、核反击时机和规模等,会增加对方决策的难度,有助于提升中国有限核力量的威慑效能。二是拓展思路。围绕使战略对手真信、真怕这一目标,谋划核威慑策略。上下发出同一个声音通常能够增强威慑效果,但有时让不同的人发不同的声音,能收到更好的威慑效果。从核威慑、核反击的实际场景出发,使不同行动、不同手段、不同策略协调配合,真正传递

中国坚决实施核反击的强大决心。三是把握时机。核实力信息与使用核实力决心的信息,传递的时机应有所不同。核实力信息的传递重在平时,与核力量建设发展同步。在明确了敌对关系后,临战或者战时传递的则主要是使用核力量决心的信息。核威慑策略的运用要适应威慑信息传递的这种特点。四是因势施策。核威慑的实际效果,直接取决于被威慑方对核威慑信息的感知和理解。同样的实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对不同的威慑对象,或者对处于不同情势下的同一威慑对象,实际产生的威慑效果也不一样。核威慑及威慑策略要因对象而异、因情势而变,力戒千篇一律。在充分考虑被威慑方决策者的性格、心理、理性程度,对方的政治体制、决策机制、价值体系、社会文化传统、民众对决策的影响、社会信息化水平、国民整体富裕程度等因素和条件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的威慑方式、威慑强度与威慑策略,力求一国一策、一事一策、一势一策。在中国面临复杂的核安全环境、核威慑对象日趋多元的情况下,加强核威慑策略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显得尤为必要。

三、核实战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爆发核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与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大大减小。但只要世界上还有核武器存在,实战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世界上大多数有核国家至今仍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仍然是他们核战略的重要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界限模糊,未来信息化常规战争发展成核战争的可能依然存在。

核实战包括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与后发制人的核反击两种主要样式。核实战的首要目标是提高核威慑效能,慑止核战争爆发。在核威慑确实失效时,才实战使用核武器,争取达成战争目的。现代条件下,核实战仍然是核领域军事斗争的核心环节。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核力量的实战运用是报复性核反击,因而在战略实践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集中指挥,统一筹划。核反击行动属于重大战略行动,对国家安危、战略全局影响极大。事关核反击的重大问题,决定权必须集中于最高决策层。同时,核反击波及面广,需要统一计划,使核力量与常规力量,核反击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密切协调配合。在遭敌核袭击情况下,第二炮兵和海基战略核力量面临遭受重创的巨大风险。要通过整体谋划,集中统一使用所有生存下来的更为有限的核力量,协调不同核力量的打击目标、打击时机等,充分发挥它们的整体效能,力求达成核反击的应有效果,实现核反击战略目标。

严密防护,确保生存。使核力量在遭敌核袭击条件下生存下来,是实施报复性核反击的基本前提。防卫作战是核反击作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敌方对我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时,我核力量是其打击的首选目标。战时,要充分掌握敌情特别是敌核力量动态,及时准确发放预警信息,指挥核力量做好相应的防护准备。实施多阵地、多点位作战和机动作战,尽可能防止敌人准确掌握我发射位置。条件具备且必要时,可在确实判明敌已对我发射核导弹的情况下,在敌核弹头尚未飞抵目标有效爆炸,未对我造成实际核毁伤前,快速发射核导弹反击。这样既符合我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贯政策,也能有效避免我核力量遭受更大损失,提高核导弹力量的生存反击能力。

重点反击,突出实效。为充分发挥核反击效能,应实施重点打击,集中有限力量打击敌方最怕打、我方有能力打、对战略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要害目标。核打击目标主要分成两类,即军事目标和城市目标。打击军事目标,在政治上会比较有利,在军事上能够争取主动,有利于控制战局,但对核武器数量、命中精度、毁伤效能等有较高要求。为了有效摧毁对方的核力量,往往需要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通常是奉行进攻性核战略的核强国的选择。打击城市目标,可以造成敌方社会的巨大破坏,人员的大量伤亡,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同时对核打击力量规模、核武器性能、核打击时机等要求相对较低,无论是核大国还是核打击能力有限的国家都能够采用。中国核力量规模、能力以及核武器性能等同核强国相比均有较大差距,实施核反

击应该更加注重精选目标,重点打击,提高实效。

进退有度,争取主动。发展核实战能力,进行核实战准备,首要目的是增强核威慑的有效性,防止核战争爆发。为提高核威慑效能而进行核实战准备的行动,如果掌握不好度,在敌我对抗互动的背景下,会反过来推动核对抗升级,最终可能引发核冲突。在威慑过程中,围绕显示我实施核反击的坚定决心组织核反击准备,核力量具体准备活动和战备状态要因敌而动,不主动提升敌我核对抗强度。实施核反击时,既要能给对方造成不可承受的毁伤效果,震慑对方,同时也要控制反击强度、节奏和目标范围,不以打赢核战争为目的,避免与对方形成核对抗的局面。

四、核军备控制与裁军

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是指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对核武器系统的研究、试验、生产、部署、使用及转让或核力量的规模等进行的限制与削减,包括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核核查、核透明、核领域信任措施、对核武器的限制和削减等内容。其中对核武器质量、数量的限制与削减是核心。

核武器出现以后,相关国家就开始围绕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展开斗争。美苏在冷战期间持续开展核军备竞赛,使双方核武器越积越多,不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加剧了核对抗,增加了核局势的不稳定性。冷战后期,美苏加强了在核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上的合作,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冷战结束以后,美俄又达成了多个关于核军控与裁军的协定,双方的核武器质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数量明显减少。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

一方面,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对维护战略稳定、防止核战争爆发、限制核战争规模、减小核战争毁伤、节约军费开支等,具有积极作用。这是世界范围核军备控制与裁军不断推进的主要动力和基本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核军备控制与裁军也是核国家特别是核大国,争夺和维护自己的核优势和战略优势,限制、削弱其战略对手核能力的一种

重要手段。不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以后,围绕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的斗争都十分激烈。国际核军备控制与裁军虽然不断推进,但过程曲折、进展缓慢。

中国在核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上一直保持积极态度,从20世纪60年代拥有核武器开始,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积极参加国际核裁军活动,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国际核军控与裁军的重要推动力量。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美俄核裁军进程不断发展,中国面临的核透明、核裁军的压力不断增大,面临的核军控与裁军的斗争形势日益复杂,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在核领域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也日渐突出。

中国一贯主张并坚持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致力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应当遵循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和优先责任,他们以可核查、不可逆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大幅削减各自核武库,是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的必要条件;在条件成熟时,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应加入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之前,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地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中国进行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斗争,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维护利益,统筹参与。按照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标准和要求,选择和确定核军控与裁军斗争的方式、方法、步骤、策略,将核军控与裁军包括的各项内容、涉及的各种因素、参与的各种力量、产生的各种影响、发挥的各种作用等,整合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二是积极推动,谨慎博弈。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是世界核军事发展的重要方向,符合时代潮流,也与中国核政策及核武器发展目标一致,与国家和平发展的总体要求相契合。对于核军控与裁军,我要积极作出应有的努力,承担应有的责任。同时,中国的核力量相对弱小,

核基础比较薄弱,核军控与裁军对国家核实力影响比较明显,因而在核军控与裁军实践的具体操作上必须十分慎重,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对对方动机把握不准或者行动后果难以预测时,不能贸然行事。

三是国家主导,多方协作。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博弈、较量,关系国家安全与国家形象,也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活动。核军控与裁军涵盖面广,涉及部门、领域多,应在国家层面实施统一领导,从全局上把握和筹划,协调外交、军队、工业等相关领域和部门、机构统一行动,充分发挥官方、研究机构、学者等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

四是抓住机遇,打牢基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核军控与裁军主要还是美俄两个装备最多核武器国家间的斗争。核实力是进行核军控与裁军斗争的基础,而中国核实力还比较弱,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未来军事斗争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应以发展求主动,抓紧时机打牢未来参与实质性核军控与裁军进程的基础,逐步争取核军控与裁军斗争的主动。

五是灵活施策,化解压力。在核军备控制与裁军过程中,各国都从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决定本国相关的立场,采取相应行动。美俄之间,核强国与核弱国之间,有核国家、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以及核门槛国家之间,在核军控与裁军的具体问题上,难免会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国际核军控与裁军领域充满着矛盾。我应保持策略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善于化解核军控与裁军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压力,积极营造相对有利的态势。

第二节 空间领域军事斗争

空间,又称太空,^①指距地球海平面 100 千米以上的宇宙范围。

^①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外层空间称为太空,但在许多情况“空间”也专指太空,如空间武器、空间站等词语中的“空间”即指太空。

自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不同国家(集团)围绕利用空间、防范空间安全威胁、谋求空间优势、争夺制天权展开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21世纪,空间领域军事斗争更加激烈,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空间力量特别是军事航天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为牵引我国经济科技发展、保护我空间资产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巩固提升我战略威慑能力、确保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支撑,对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推进我军战略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

(一) 斗争影响极其广泛

随着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运用,空间同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科研实践活动的联系日益紧密。社会活动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越来越依赖空间系统的支持,空间系统成为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基本支撑,空间活动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更加明显。随着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的发展,信息日益成为主导因素。作战活动的组织、展开,作战效能的提高、释放,都高度依赖信息保障。信息优劣对比决定着作战方法的选择和作战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世界航天强国的军事情报信息,主要来源于空间系统。世界各国的航天活动以及在轨运行的航天器,大部分用于军事目的。基于空间作用和影响的这种广泛性和深刻性,世界主要国家竞相角逐太空战场,抢占这一制高点。太空领域军事斗争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二) 斗争空间极其广阔

空间领域军事斗争涵盖与人类空间活动相关的所有区域。目前人类的太空活动、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主要集中在距地面4万千米以下的空间区域,这一区域是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主要场所。而航天器发射、空间信息传输、空间武器投射等必须穿越大气层。大气层作为联系地球与空间区域的通道,在空间攻防对抗中居于重要位置。航天器在空间轨道运行,但其研发、试验、发射、指挥控制、支援保障

等活动,基本上又是在地球上进行的。地球是人们空间活动的基本依托,在轨运行航天器的“根”在地球。总之,空间领域军事斗争涵盖从距地球数万千米的宇宙到地球表面的广大区域,多区域一体。空间军事斗争也因而成为包括太空与太空、太空与地面、地面与地面之间的多种相关军事活动的综合体。

(三) 斗争日趋激烈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太空依赖的不断加深,围绕太空的军事争夺和斗争日趋激烈。美国是世界上太空实力最强的国家,正在有效运行的航天器中约有一半属于美国。近年来,美国通过调整太空政策、推出并实施新的太空发展计划、加大对太空的投入、研发试验新型太空战武器系统、完善太空作战理论、进行太空作战演习等一系列措施和方法,巩固其太空优势地位,并企图进一步拉开与其他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差距,以有效控制太空。俄罗斯作为老牌太空强国,在太空发展上也不甘落后。俄已经确定太空为军事发展重点,并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持续加大投入,加速恢复其太空能力,呈现重返昔日太空强国地位的强劲发展势头。欧洲航天局、印度、日本、巴西等在太空领域已经站稳脚跟,有了一定基础的国家或者区域组织,也加快太空发展力度,企图在太空军事斗争中抢占相对有利的位置。而韩国、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一批有一定综合实力但还没有进入太空的国家,也纷纷启动各自的太空发展计划,向太空挺进,希望能够在太空谋得一席之地。太空军事斗争形势呈现由美国主导、其他航天大国(组织)纷纷跟进、不少国家正努力加入的复杂局面。太空领域军事斗争,特别是围绕太空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

(四) 受经济、科技因素的制约明显

太空是一个与地球表面、大气层有明显区别的特殊区域。将航天器送入太空、对航天器实施有效测控、进行空间军事对抗、利用太空手段达成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等,都有很高的科学技术门槛,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十分明显。太空系统的构成往往十分复杂,建设太空系统、发展太空能力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具有典型的

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特征,对国家经济实力的依赖性很强。同时,太空系统建设、太空活动对系统整体性、协同性要求非常高,只有运用先进的管理科学,具备很强的统筹管理能力,才能将相关要素和相关部门有效组织起来,使各部分密切配合、协调运作,实现太空能力建设、太空活动的有序高效。一个国家空间军事斗争的能力和水平,往往能够客观反映该国综合实力。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的强弱优劣对比,对该国选择空间军事斗争目标、方式以及斗争的最终结果等,都会产生显著影响。

二、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基本类型

(一) 空间信息支援

空间信息支援是指利用由侦察预警、导航定位等多种类型的卫星组成的空间信息系统,为己方在陆地、海上、空中作战的部队和军事行动,提供空间侦察、监视、预警、通信中继、导航、定位等信息支援和保障行动。空间信息系统建设一直是世界各国空间力量建设的重点。目前在轨运行的各类军用卫星,几乎全部用于实施空间信息支援。空间信息支援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各国空间力量运用的主要方式。防止己方空间信息系统遭到干扰或者破坏,确保其正常工作,同时在必要时干扰破坏对方的空间信息系统,降低其系统工作效能,是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

(二) 空间威慑

空间威慑,也称太空威慑,是以空间军事力量为手段实施的威慑。空间系统、空间军事力量之所以能用于威慑目的,产生明显的威慑效应,与空间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泛运用及其深远影响密切相关。由于人类的生活、社会的运转和军事活动的展开等,越来越依赖空间系统的支援保障,人类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空间系统失灵、失序和失能的严重后果。潜在的能够对空间系统正常运行造成干扰、破坏的手段和活动,即便没有造成实际破坏,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恐惧,对国家决策者及相关战略决策活动产生影响。空间系统主要为

己方军事活动提供空间信息支援,防止或者阻止敌方的干扰和破坏,保证己方空间系统的正常运转。这完全符合通过“阻止对方做某件事”来维持现状的威慑机理。太空军事活动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威慑是太空军事斗争的一种基本样式。

空间系统最基本的功用之一,是能够对敌实施侦察、监视,掌控对方军事动向,降低对方行动的隐蔽性、突然性,同时也能明显增强己方军事行动效能,使己方在军事对抗中占据一定的主动和优势。这必定会影响对方的军事决策,降低对方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在相对平时时期,在敌对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一方空间系统的存在和发展,空间能力的提高,也会潜在地影响和约束其他国家的军事活动,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空间军事系统作为现代军事领域的制高点,必定是敌对双方攻防对抗的重点目标。为了有效遏止其他国家的空间敌对行动,防止己方空间系统遭到攻击和破坏,在加强空间防护能力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有针对性地发展一定的空间进攻手段和能力,并在必要时展示能够给对方空间系统造成实质性破坏和影响的能力,以及敢于并准备使用这种能力的坚定决心,给对方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和恐惧,迫使对方不敢主动实施空间作战。必要时甚至可以实施以警告、惩戒为目的的有限太空作战行动,阻止对方恣意升级空间对抗的强度。

空间威慑既可以是一个过程、一种行动,也可能是一种状态和态势;战前甚至战争过程中可以实施空间威慑,和平时时期也存在空间威慑;有针对性地运用空间手段、空间力量,能够产生显著的威慑作用,而空间手段和能力的正常建设发展活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三)空间攻防作战

空间攻防作战,是敌对双方主要在外层空间进行的直接的军事对抗活动。空间战以军事航天力量为主要作战力量,以敌对双方直接攻防为基本表现形式,以夺取和保持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范围外层空间的控制权为基本目的,是对抗最激烈、强度最高的空间领域军事斗争形式。

迄今为止,虽然世界主要国家的太空军事活动仍然以实施太空信息支援保障为主,但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太空军事斗争向太空攻防作战方向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明确提出了控制太空的军事目标,并筹建了专职的太空攻击部队,制订了太空作战计划,多次实施太空战演习。美国正在研发试验一批用于实施太空攻防作战的武器系统,X-37B 空天飞机等空间武器的研发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外层空间实施导弹拦截的能力逐渐成熟。俄罗斯采取了包括重组空天防御力量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较大规模空天战争。

任何以空间系统为手段实施的攻击,对空间系统的攻击,以及抗击敌方对空间系统的攻击等,都属于空间攻防作战。按照攻防作战区域,空间攻防作战可分为以地(空)制天作战、以天对天攻防作战和以天击地(空)作战等。依据所使用的武器及作战行动的特点,空间攻防作战可分成:卫星攻防作战,包括使用地基、空基、天基武器、平台攻击敌方卫星和对己方卫星进行防护的行动;空间反导作战,即使用天基激光武器或者动能武器拦截、摧毁穿越外层空间的敌方导弹的作战;空间作战平台攻防战,即利用空天飞机、空间站等空间运载平台上的武器系统,对空间作战平台实施的进攻和防御作战;天基对地(空)攻击作战,即从空间作战平台上发射激光、粒子束、动能武器等,攻击和摧毁敌方位于地(海)面或者空中的目标的作战。

(四) 围绕外空非武器化的斗争

外空武器化,就是发展、部署用于直接攻击敌方目标的太空武器的过程。军事需求一直是人类发展太空能力的主要推动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美苏(俄)等航天强国向外空发射的数以千计的航天器中,大多数是用于军事目的的。外空军事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太空系统的军事运用,基本上还只是通过向己方地面(海上)、空中作战部队的各种军事活动提供侦察、预警、通信、定位等太空信息支援、保障的方式进行,通过发挥倍增地面(空中)作战力量效能的作用,间接参与作战。但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为了

控制太空,夺取并保持更加有利的太空对抗态势,开始研制、发展、部署能够直接用于攻击敌方目标的太空武器,包括从外层空间攻击太空、地面、空中或海上目标的武器和从太空、地面、海上或空中攻击外层空间目标的武器等,太空系统开始向直接参与攻防作战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太空武器化的趋向。

太空武器化通常以夺取和保持制天权为目标,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空间技术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太空武器化主要受到那些已经具有较明显空间优势的太空强国的主张和发展方向的牵引。而一个国家执意推进和实施太空武器化,必定引起其他国家的有针对性的反应,导致空间领域的军备竞赛,引发地区间、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不安,影响国际安全。太空武器化将使空间变成真正的战场、空间环境严重恶化。大量太空碎片、太空垃圾的存在,对太空中运行的各类航天器形成严重威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不同国家围绕外空非武器化问题展开激烈斗争。

美国作为世界上空间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的国家,一方面向其他国家保证不会进行太空武器化,一方面不断实际推进其太空武器化进程。美国由于不同意将穿越太空的导弹作为太空武器,坚持认为讨论太空武器问题会涉及卫星、航天飞机等航天器,便以无法定义太空武器、并不存在太空军备竞赛、没必要进行相关问题谈判为理由,长期反对进行禁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的谈判。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并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008年2月,我国与俄罗斯共同向裁谈会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2009年8月,中俄共同提交了工作文件,回应裁谈会各方对中俄外空条约草案的问题和评论,为各方早日就这一草案展开谈判,达成新的外空条约,作出了积极努力。

三、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

要着眼维护国家空间安全,立足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基本特点

和发展趋势,科学确定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整体目标、斗争方式、力量建设原则。

(一) 以保证国家空间系统安全、有效维护国家空间权益为目标

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目标,体现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空间利益的基本诉求,反映空间斗争、空间能力发展的基本指向,对空间领域军事斗争具有全局性的统领作用。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目标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国家的性质、国家战略目标、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国家空间能力基础以及与主要对手空间实力对比等多种因素。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空间军事斗争的目标会不一样。一般说来,谋求世界霸权、追求空间绝对安全、对空间依赖程度高、空间能力强的国家,往往以控制空间,必要时限制甚至剥夺其他国家利用空间的权利作为其空间军事斗争的目标,其空间军事斗争目标通常带有明显的扩张性、进攻性和排他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坚持认为每一个国家拥有平等开发和利用太空的权利。中国在太空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为太空系统不受敌对破坏,正常运转,能够为经济社会和军事活动提供应有的空间支援和保障。中国的太空军事斗争总体目标是,在不妨害别国太空权益和安全的条件下,确保太空系统的安全,维护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合法权益。中国在空间领域的军事斗争,具有防御性、非排他性的鲜明特征:以保证本国空间权益和空间安全作为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不主动侵害别国的空间权益,不追求空间霸权;通过发展而不是进攻,利己但不损人的方式,来行使本国合法的空间权利,保证空间安全;只有当别的国家切实侵犯了中国的空间权益、危害到国家空间安全时,才会对敌实施空间威慑,发动空间反击。在空间领域,中国遵循的仍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

(二) 科学统筹各种斗争样式,发挥整体效能

突出空间信息支援。提供空间信息支援保障,是空间系统的基本功能,也是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基本样式和核心。空间威慑、空间

攻防作战等其他类型的空间军事斗争,基本上都围绕敌我双方的空间信息支援保障系统展开,并确保空间系统支援、保障功能不受影响为主要目的。与世界航天强国相比,我国的空间信息支援系统还不完善,作为军事能力“倍增器”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充分,与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我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斗争,要突出空间信息支援保障这一重点,通过完善发展空间信息支援系统带动我国太空能力的整体发展,以太空信息支援效能的显著提升为我国空间军事斗争赢得主动地位。

重视空间威慑。不断增强空间威慑能力,掌握空间威慑机理,创新空间威慑方式,坚持着眼遏控、综合制衡、寓慑于势的原则,以遏止敌损害我空间权益、威胁我空间安全的企图和行径作为威慑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空间攻防力量及其他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形成战略威慑的整体合力。注重通过发展空间能力、显示不对称作战态势和必要时实施空间反制作战的坚定决心,达成威慑目的,同时要慎重使用警示性空间硬摧毁等方式,防止局势失控和对抗升级。平时用于遏制空间危机,维护太空领域的和平与稳定,提升国家在空间领域的地位。战前和战中,用于慑止敌空间袭扰和战争冒险,使其他国家不敢轻易干扰和破坏我太空系统,确保我空间系统正常运转,将敌方的影响控制在我方可以接受的有限范围内,有效维护我空间安全。

不排除必要的太空攻防作战。在加强太空信息支援能力建设、重视太空威慑运用的同时,切实做好太空攻防作战准备,必要时坚决实施太空攻防作战。一是通过太空攻防作战提高空间威慑效能。空间威慑是现阶段维护我国空间权益的主要方式,空间攻防作战首先要能够满足太空威慑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太空威慑效能。应依此具体规划和实施空间攻防作战。二是慎重掌握发起时机。一般不应主动升级空间对抗态势,不与强敌进行直接空间攻防对抗。只有在空间威慑无效、我空间系统受到袭扰或面临空间打击的情况下,才考虑对敌实施太空反击作战。三是力避与强敌进行全面空间对抗。敌强我弱的太空基本态势,决定了我方不宜与强敌进行全面太空对抗。

可针对空间系统易攻难防、敌方更加依赖空间系统的特点,选择攻击敌方空间系统的关键节点目标,破击敌空间作战体系。

继续同外空武器化行径作坚决斗争。个别国家以控制空间和限制其他国家使用空间为主要目的的太空武器化,既违反了国际社会关于和平、平等利用空间的基本准则,同时也对我国空间安全和权益构成了威胁。我国应继续同其他反对太空武器化的国家一道,遵照有关国际法准则,推动制定有关防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对实施太空武器化的国家施加舆论、道义压力,影响和阻滞其太空武器化进程。针对个别国家的太空武器化,可选择性地发展和展示我国的太空技术、太空能力,以对冲的方式,降低其关于太空武器化的预期,增大其太空武器化的难度和成本。

(三) 建立精干、管用的空间领域军事斗争力量

太空军事能力建设具有高投入、高成本、高技术含量的特点,“精干”“管用”是世界各航天大国太空军事力量建设的普遍原则。中国太空军事力量的精干,一方面指不追求与太空军事强国对等的太空力量规模,不与他们比建设投入;另一方面指太空军事力量要高效能,包括装备技术先进,作战人员素质高,力量结构和编成科学合理。中国太空军事力量的管用,一是空间信息支援充分、有效,能够为其他领域的作战力量和军事活动提供高效的空间信息支持,切实发挥其军事效能“倍增器”的作用;二是能够有效制衡太空强国,具有对太空强国造成一定太空威慑和反击作战的能力,使太空强国不敢轻易对我实施太空攻击。

从太空军事力量建设的特点和中国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太空力量建设应主要把握以下原则:

统筹规划,协作建设,集中使用。太空军事发展和力量建设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投资大、风险高,是典型的国家工程,必须由高层权威部门统一领导、整体筹划,以理顺和协调各方关系,形成整体合力,推动太空军事力量有序、高效发展。要从太空力量建设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出发,兼顾我国航天力量发展传统及军事力量结构特点,

按照统一的规划,由相关总部和军兵种同步协调太空军事手段和能力建设,按照太空作战的内在要求,建立高效的太空作战指挥机制和权威的作战指挥机构,确保对太空力量、各类太空作战手段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和使用,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太空作战整体效能。

对称与非对称发展结合。空间信息支援系统和能力发展,应瞄准世界航天军事强国,力争与最强对手站在同一层面上,保证不被落下太多,这样才有与强国进行太空军事博弈、斗争的基础和条件。太空攻防能力发展,主要以威慑和制衡太空强国为目的,坚持与太空强国的非对称发展。充分发挥各自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用于太空作战的优长,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提升我军整体太空实力。

兼顾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既要立足现实太空斗争的需要,又要在准确预测太空斗争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未来太空军事斗争提前做好准备。既要重视空间军事能力建设,又要重视对太空领域高新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做好技术和人才储备,把握未来空间领域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第三节 网络领域军事斗争

信息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基本标志和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之一,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的无形疆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围绕平时保证信息安全、确保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转,战时保持网络对抗主动、掌握制网络权等目的展开激烈斗争。网络空间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斗争十分重要的新领域。

一、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

信息网络是利用数据光缆等辅助设备,将计算机、处理器、服务器等电子设施相互连接,按照一定的标准、协议运转,进行信息存储、

交换、传输、处理、使用的系统和结构。从整体上讲,信息网络具有遍布全球、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广域性,信息传输流动的快速性,网络行为体身份的隐匿性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网络领域的军事斗争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军事斗争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斗争范围的广泛性

在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是人们生活、社会活动须臾不可离的基础和条件。因特网几乎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日常了解世界、相互联系沟通的基础性工具;电信、电力、交通、金融银行、社会保障等社会重要行业、部门、机构,都建立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内部网络或者局域网络开展工作,维持本系统正常运作。而在军事领域,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网络系统作为现代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的神经中枢,将各种作战力量以及不同类型、不同空间的军事活动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是战争形态转变为信息化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所以,那些以网络为目标的恐怖袭击活动,会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网络领域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敌对的网络攻击对抗活动,尽管不会像使用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样直接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员伤亡和社会设施的严重损毁,却能导致对方交通混乱、通信中断、金融瘫痪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也会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社会财产的重大损失。军事对抗中的网络攻击行动,影响将更加直接、更加明显。具有网络对抗优势的一方,通过网络战可以使对方指挥系统失灵、作战力量和作战行动失控、武器装备失能失效,从而掌握军事对抗中的主动,为有效达成军事行动目的、赢得战争最终胜利创造条件。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直接关系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稳定、战争的胜负,乃至政权的存亡和国家的安危,其战略性影响日益凸显。近年来,美、俄、日、印以及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和组织,纷纷推出关于网络领域斗争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美国等国家还组建了专门的网络战力量和专职网络作战指挥机构,为主导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积极准备。网络领域军事斗争形势将日趋复杂严峻。

(二) 斗争方式的隐蔽性

信息既是网络的基本承载物,也是实施网络攻防对抗的主要媒介。信息是无形的,如果抛开网络带宽的影响和限制,信息能够以光速在网络空间中流动。所以网络攻击可以随时发起,并在瞬间完成,突发性很强。由于缺乏类似于传统战争爆发前那样的明显征候,很难对何时会受到网络攻击作出准确预测,难以及时发出预警、有效实施防护,应对网络攻击威胁的难度极大。信息网络分布极广,包含数不清的网络节点,而任何一个网络节点都可以、可能被用以对另一个网络节点或者网络系统实施攻击,所以在网络对抗中,要确定威胁来源和受到攻击的方向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网络自身又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虚拟空间”,任何一个进入网络、使用网络的行为体,均能够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通常以其他任何虚拟的身份和面目,在网络中出现并使用网络。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无线接入、使用虚假IP地址、使用别国服务器或者替换接口等方式,将网络攻击、破坏的责任转嫁给他人。所以,在网络斗争实践中,即使知道了网络威胁的来源或者方向,也难以迅速确定到底是由个人所为,还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或者是恐怖组织或者犯罪集团实施的破坏活动,难以分清责任归属。很多信息网络带有军民共用的特点,具有军事目的的网络攻防,往往会波及民用领域,使网络领域军事对抗的附带影响和毁伤增加。而网络的全球互联互通,也往往使针对特定对象的网络攻防行为,波及第三方,使影响范围扩大。所以,网络对抗的后果很难有效控制。网络领域军事对抗在对抗时间、斗争目标、对手身份、对抗后果等方面存在的这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影响了网络领域攻防对抗的有效性。这也从整体上影响和制约了网络领域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是制约大规模网络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三) 斗争成本的低耗费高效能性

现代战争中,大批作战飞机、舰艇、导弹等高科技含量武器装备的服役,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耗费,而计算机网络战只需要少量的人员和网络计算机便可进行,较少的资金投入即可达到预期作战目的,

具有成本低、效益高、风险小等显著特点。正是由于这个特性,网络战比其他类型的战争更容易发生。美军认为,对网络依赖程度最高的美国比任何国家更容易遭受网络战的威胁,军事弱国、基地机构或者个人都有可能十分便利地通过网络对美实施信息攻击。据称,美国空军一名中尉在一次演习中,仅使用一台家用计算机和普通的调制解调器,就通过互联网悄然掌握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指挥权,使美军深感震惊。2012年夏,一条群发的“恐怖短信”,造成数万印度教民的大规模逃亡。随着世界各国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很多民用或军用资源均实现了网络化,这就使得网络战的威慑能力不弱于常规的毁伤性战略武器。一次成功的网络战,可以使对方经济崩溃、作战系统瘫痪。在未来战争中,在计算机网络战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将获得战争主动权,对敌方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网络战作为一种新型的战略威慑手段,将会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使用。

(四) 斗争力量的专业性

网络领域攻防对抗,是以破坏敌方网络系统和网络信息,同时保护己方网络系统和网络信息为主要目的的对抗活动。不论是实施网络进攻还是防御,熟悉网络工作原理,能够熟练运用网络都是基础。而侵入特定的网络系统、查找并发现特定信息系统的缺陷与漏洞,并加以有效利用或者迅速弥补,是达成信息攻防对抗目标的关键所在。网络承载的信息是无形的,网络空间又是“虚拟”的,所以对一般人而言,信息网络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虽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各种信息网络,人们无时无刻不使用着信息网络、享受着网络带来的便利,但真正熟悉网络工作原理、能熟练使用网络的人还很少。至于能够在对抗性环境中,利用对方网络系统的缺陷,发起网络攻击,达成网络或者信息破坏效果的“黑客”“网络战士”,更是凤毛麟角。网络领域的军事对抗,实质上是对立双方的网络精英们在知识、智能和专业能力上的比拼和较量,是专业性极强的对抗领域。所以网络攻击虽然可以从全球任何地域、任何一个节点上发起,但不是每一个使用网络的人都能够实施攻击;网络对抗虽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

不可能做到“全民皆兵”，网络攻防作战力量是极其精干的。

二、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主要样式

(一) 网络侦察

网络侦察,是指在不被察觉且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获取对手非公开信息为目的,使用技术装备和方法对侦察对象的网络信息系统进行的侦察活动,是当前网络领域最经常、最主要的军事斗争活动。

实施网络侦察的途径主要包括:通过破译对手网络口令或者密码进入对手加密网络系统,获取有关情报信息;利用网络广播、多播的特点,通过信息截取程序,在目标计算机通过有线、无线或者电磁等途径传输信息的过程中,截获报文,从中解读出重要文件、信息;利用对方计算机上的漏洞潜入对手网络系统,通过间谍软件搜集、窃取计算机中存储和处理的信息等。

网络侦察以盗取和利用对方非公开信息为目的,通常不破坏对方的相关信息数据,不直接影响对方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用户对电子设备的正常使用,有其非破坏性和非暴力性特征。世界上各个国家虽然都在进行程度不同的网络侦察活动,但由此引发双方冲突,以此为理由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网络侦察看成是网络作战。但从技术角度看,网络侦察与网络攻击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网络侦察的手段、方法,通常也是网络攻击的手段、方法。依据行为体的意愿和意图,可能只要按下一个按键或者发出一道程序指令,网络侦察与网络攻击之间的转换即可完成。因而网络侦察与网络攻防作战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网络侦察往往就是未来可能的网络攻防作战的准备,网络侦察很容易转变为网络空间的攻击。

(二) 网络攻防作战

网络攻防作战是以破坏敌方信息网络系统和网络信息,削弱其使用效能,同时保护己方信息网络系统和网络信息免遭敌方破坏为目的的网络对抗行为,包括网络进攻作战和网络防御作战。网络攻

防作战是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最高形式。

网络攻防作战有多种具体样式。网络进攻作战从整体上可分为使用软件进行的“软破坏”和使用电磁手段实施的“硬摧毁”两种类型。软件攻击,即通常所说的“黑客攻击”,常见的样式包括:通过植入“蠕虫”“木马”“逻辑炸弹”等程序或者破坏性代码,对敌方计算机或者网络系统实施破坏;通过伪造和发送虚假信息的方式获取、破坏敌方重要信息;通过过量占用敌方信息系统资源、修改或者破坏敌方网络系统配置信息等方式,使其无法对其合法用户的正当请求作出反应,不能提供正常服务等。而用于对敌方网络实施“硬摧毁”的武器主要包括电磁脉冲弹、微波炸弹等,主要通过对计算机设备、网络系统中的元器件等的破坏,达到网络攻击效果。网络防御主要包括:通过建立防火墙阻止信息非法进入系统;通过数据加密防止信息泄露或者被篡改;通过身份验证防止系统被非法访问,系统资源被非法使用;通过侵入探测和阻止系统,自动采取相应措施应对网络攻击;等等。

网络攻击具有很大的突然性。网络攻击武器廉价,发展速度极快,且实施网络攻击受到惩罚的风险相对较小。网络系统本身体系复杂、环节众多,系统中的错误或者漏洞难以避免。同时,防御者弥补的只是那些被成功攻击了的漏洞,难以主动解决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安全问题。网络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易攻难防的特征,网络进攻与网络防御的非对称性突出。

(三) 网络威慑

网络威慑是指通过显示网络攻防作战能力以及实施报复的坚定决心,迫使对方不敢恣意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防止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网络威慑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明显的战略性。网络威慑所慑止的是那些能够造成严重破坏的网络攻击行为,保护的实际上是重大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其影响和作用是全局性、战略性的。而在国家普遍重视信息网络安全、加强信息网络防护能力建设的情况

下,个体网络用户的网络攻击往往难以达到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后果,敌对国家或者极少数恐怖主义组织显然是网络威慑的主要对象,网络威慑主要还是国家之间的网络对抗行为。二是威慑手段多样。网络威慑并不单是使用网络武器进行的威慑,实际上它是针对大规模网络进攻行为而实施的威慑。网络威慑力量不仅包括典型的网络攻防作战力量和手段,而且也包括传统的军事打击力量和手段。三是威慑效果难以准确评估。从一般意义上说,威慑效果是通过影响对方决策者的心理,改变其决策结果体现出来的。而网络攻击的隐蔽性、突然性很强,人们很难通过敌对网络行动的调整、变化来判断对方决策、意图的变化。没有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行为,不等于对方没有实施网络攻击,很可能是因为敌对的网络攻击无法突破功能强大的网络防御系统,并不一定是对方因为受到威慑而被迫放弃、改变了实施网络攻击的企图。当发生敌对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时,便意味着网络威慑的失败。但没有出现敌对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并不能说明网络威慑起了关键性作用。

与传统威慑特别是核威慑相比,网络威慑在威慑对象、威慑目标、威慑途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威慑虽然是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但人们关于网络威慑的认识分歧很大,关于网络威慑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三、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

对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应立足于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贯彻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对网络军事斗争的总体要求。

(一)以维护国家重要信息和信息网络安全为基本目标

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目标,规定着网络军事斗争的基本指向,对网络领域军事斗争起统领作用。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目标的确定,受国家性质、国家战略目标、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程度、IT产业基础、网络攻防能力以及对手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说来,追求绝对安

全的世界霸权国家,往往将控制网络、限制其他国家使用网络的自由作为战略目标,在网络军事斗争中,带有明显的破坏性、敌对性和排他性;信息化、网络化程度越高,对网络依赖性越强的国家,网络斗争的目标通常会相对较高;IT 产业基础好,特别是垄断着计算机、网络核心技术的国家,其网络攻防能力往往更强,追求的网络斗争目标及标准也会更高。

中国是一个 IT 产业大国,信息网络在中国已经十分普及,但计算机、网络的相关核心技术,以及因特网的控制权等,基本上还掌握在他国手中,中国在网络对抗中整体上处于劣势。所以中国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目标,主要是确保国家金融、交通、能源、主要国防企业以及军队等核心领域和部门的信息安全,确保相应信息网络的正常稳定运转。

中国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目标“利己”但不“损人”,带有明显的防御性、非破坏性特征。中国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目标,并不是要杜绝任何类型、任何强度的敌对网络攻击,而只是要将敌对网络攻击的范围加以限制,将敌对网络破坏的影响局限到我方可接受的范围内。这既符合网络及网络斗争的一般特点,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比较切实可行。

(二) 处理好网络对抗的平战、攻防、慑战等关系

有效实施网络对抗,提高网络对抗效果,处理好平时与战时、进攻与防御、威慑与实战等关系十分重要。

平时与战时。受网络自身特性的影响,任何信息网络,都随时面对和承受着种类繁多的网络侦察和网络攻击,网络的自身防护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同这些非法侦察和攻击行为作斗争,保护着信息和网络系统安全。可以说,网络攻防对抗是日常性的、随时都在进行的网络斗争。而战时的网络攻防作战,由于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影响和后果更加严重,自然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并预筹对策。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筹划,以平时网络对抗为基础,但重心应放在战时的网络攻防对抗上。

进攻与防御。从技术角度看,网络战在整体上具有“易攻难防”的特点。如何协调网络进攻与网络防御之间的关系,成为筹划网络领域军事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与主要战略对手相比,我国在网络对抗中整体上还处于劣势,进攻与防御不可偏废,应当以防为主,兼顾进攻,通过网络防御来“保存自己”无疑是第一位的,是我国网络斗争的重中之重。

威慑与实战。网络攻防作战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网络战争造成的难以承受的后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使网络威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与核威慑类似的特征。基于对网络战争的恐怖后果以及对能否避免遭受对方网络攻击的不肯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发动网络战争。对于网络问题,人们考虑的首先是如何避免爆发网络战争,而不是如何打赢网络战争。不同的国家,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在发展着自己的网络进攻手段和能力,但其首要目的却是避免网络战争,立足于强化网络威慑效果,而不是用于打赢网络战争。从这一角度看,未来网络大国之间有可能形成一种都有网络攻击手段和能力,但谁也不敢轻易使用的“平衡”威慑态势。

(三) 建立精干的专业网络作战力量

网络的普及性以及军民共用的特点,决定了网络攻防力量的多样性。用于网络作战的力量可分为军队专业网络战力量、授权力量和民间力量三类。专业网络战力量是军队中专门用于实施网络攻防的作战部队;授权力量是由军队授权的有组织的专门从事网络战的地方力量,主要在安全部、公安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内组建;民间力量则是民间自发进行网络攻防的力量,经过动员和组织后,可用于网络作战。网络军事斗争专业性强,网络战争对抗激烈,政治性要求高,所以军队专业网络作战力量显然是实施网络战的核心力量,也是网络战力量建设的重点。

网络攻防作战,是典型的智力较量,真正有能力进行网络作战的人并不多;网络战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战场对抗,作战力量数量规模并非决定性因素。所以,“精干”是对专业网络战力量的基本要

求,即专业网络战力量数量要少、规模要小,非常专业、能力要强,应由网络对抗精英组成。

军队组建精干的专业网络战力量,应着重把握两点。一是依托民间力量。网络的普及性,网络原理的通用性、基础性,决定了网络精英主要产生于民间,国家网络对抗潜力主要蕴藏于广大民众。组建专业网络战力量,提高网络战能力,要善于发掘和利用民间网络对抗人才和资源,使军队专业网络战力量真正能够集合起全社会网络精英,真正体现和反映国家网络战能力和水平。二是研、建、用一体。从技术角度看,网络攻防主要是对相应网络软件的使用,而网络软件使用的过程又往往十分简单。所以,日常开发和研制网络攻防软件武器,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网络战准备,也是网络战力量建设的核心。网络软件武器研发人员,同时也是典型的网络战战士。可见,在网络力量建设中,要研发、建设与运用一体筹划,共同推进。

军种战略和战区战略

军种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种建设与运用的方针和策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战区战略是依据国家军事战略意图,在战略区经略区域军事安全和指导区域军事行动的方略。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完善军种战略和战区战略,是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战争形态变化的需要,也是适应我军进一步优化体系结构、全面提升军事能力的需要,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节 陆军战略

陆军战略是筹划和指导陆军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服从服务于军事战略。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方式的不断发展,新世纪新阶段我军使命的历史性拓展,推动着陆军的转型发展。筹划陆军以作战为核心的多样化运用,需要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陆军战略。

一、陆军战略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陆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陆军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是我国武装力量的主体,是我军遂行地面作战的决定性力量,是与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相配合实施联合作战的基本力量,对于确保我国陆疆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威慑现实和潜在对手、遏制各种危机、支撑国家利益拓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围绕国家和平发展战略需要,依据军队新的历史使命,陆军将主要履行以下战略任务:

参与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维护国家统一。一旦主要战略方向爆发战争,陆军将立足联合作战这种基本形式,参与实施封锁作战、火力打击、登岛作战和防卫作战等。特别是在联合登岛作战中,陆军将担负抢滩登陆、岛上突击、城市攻坚、战后维稳等重要任务,要上得去、站得住、突得快、攻得下、控得住,在维护国家统一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施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捍卫陆疆安全。我国陆上邻国众多,边境线长达2.2万多千米。尽管发生大规模陆上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部分边界划界问题悬而未决,一些边境地区蚕食与反蚕食、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长期存在,因邻国动乱而危及我边境地区安全的威胁不能排除。在未来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陆军部队将与其他军兵种部队联合,根据不同战略方向战场和对手特点,开展边境封控、坚守防御、火力打击、纵深穿插、攻坚打援、占领控局等作战行动,积极改善防御态势,坚决捍卫领土主权,恢复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参与战略要地防御作战,确保中枢安全。随着现实和潜在对手远程作战力量手段不断发展、精确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战时我国首都等战略要地可能成为敌战略突袭的重点目标。在未来战略要地防御作战中,陆军在担负防护重要目标、掩护重兵集团、防反敌特战力量渗透等地面防卫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将充分发挥陆军地空导弹、高炮等多种防空兵器的作用,配合支援空军、海军、第二炮兵抗击敌空中突袭,确保取得反空袭作战胜利。

参与多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兼顾维权维稳。充分发挥陆军分布广泛、兵力雄厚、兵种多样、灵活机动、反应迅速、控制有力的特点,协助国家有关部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三股”势力,特别是遂行打击恐怖主义、平息骚暴乱、处置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任务,积极参与应对地震、洪水等重特大自然灾害,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逐步扩大参与遂行国际维和、国际救援、护侨撤侨、

保护境外资产和战略通道等境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有效支撑国家利益拓展,塑造有利战略态势。

随着国家安全利益和我军使命的历史性拓展,陆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任务领域拓展。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向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拓展,要求陆军在重点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核心军事能力的同时,兼顾发展具有自身特色、能够发挥自身优长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二是任务空间拓展。由传统的地表空间向以陆战场为主,包括超低空、低空、水面、网络等在内的多维空间拓展,同时战役战术纵深空前延伸,要求陆军以新需求为牵引、新技术为支撑,在推进传统作战力量改造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形成在广阔范围、多维空间快速机动作战的新能力。三是任务样式拓展。既要立足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不同对手的陆上作战行动,又要随时准备遂行境内外多种性质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既要能够独立遂行急难险重任务,也要善于与海军、空军、第二炮兵联合遂行任务;既要能够快速机动、快速部署,也要善于精确毁伤、体系破击。这些都要求陆军全面协调地推进体制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转型发展。

二、陆军转型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地区危机、冲突和局部战争威胁趋于多样,更具不确定性和突然性。遂行大兵团作战任务的传统陆军部队存在编制僵化、机动性弱、灵活性差、执行任务单一等缺陷,难以适应安全环境和战略需求的新变化。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运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化时代依靠数量规模提高陆军战斗力的模式。我国未来面临大规模地面入侵的可能性甚微,但国土辽阔、边境绵长、地形复杂,且陆上威胁具有多向多元多对手的特点。前者决定了陆军没有必要保留原来的庞大规模,而后者却决定了陆军还必须具有适度的规模数量。总的来看,要顺应信息化战争和世界陆军发展趋势,摆脱传统的“大陆军”思维,从立足

应对大规模地面入侵向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从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以信息为主导、信息化机械化复合发展转变,从区域防卫向全域机动转变,从地面作战向立体攻防转变,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的新型陆军。实现这一转型需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推进陆军体制编制创新。目前我国陆军领导机关的职能由四总部代行,大军区直接领导所属陆军部队。随着军种构成和地位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和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演变,这种体制不利于总部职能发挥、不利于陆军整体建设、不利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立的缺陷逐步显现。调整改革陆军体制编制,一是强化“统”,着力解决陆军领导管理职能分散的问题;二是强化“精”,着力解决管理层次过多、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三是强化“联”,着力解决各军兵种作战、训练联得不够、联不起来的问题。应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体制编制机构,形成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指挥体制和陆军领导体制。在各战略方向建立平战一致的联合指挥机构,作战部队逐步建立军—旅—营体制,大力推进一体化指挥平台和作战数据链向作战部队延伸,进一步减少指挥层次,实现纵短横宽、纵向贯通、横向互通的扁平化指挥结构。适度减少重装部队,改扩建中型、轻型部队,实现重、中、轻型部队相对均衡配置。同时,适度压缩传统兵种,扩大特种作战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网络攻防部队、战术导弹部队和陆航部队编制比例,使新型作战力量从辅助型力量向主战型力量转变,逐步形成地面、低空、特战、网战一体的精锐陆战力量。

科学划分陆军部队类型。针对我国陆上威胁多元多向、地理环境复杂的特点,整体统筹、合理划分陆军部队类型,以便平时分类建设、战时联合运用。一是按作战功能分类。可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划分为两栖、山地、沙漠、平原、城市、寒区以及高原等不同类型的部队。比如,西南方向重点建设山地、高原类型部队,东南沿海方向重点建设两栖、轻型和空降类型部队,东北方向重点建设高寒、重型部队,华北方向重点建设平原、重中轻结合类型部队。二是按任务性质

分类。可将适应特定区域作战对象的旅级作战部队和部分重型师级部队组成“区域驻防部队”，部署在各任务区，独立执行维持态势和应对中低强度冲突等任务。将中、轻型旅级部队组成“全域机动部队”，部署在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随时执行各个方向的支援作战任务和临时赋予的各种任务。三是按照战备状态分类。比如，将陆军作战部队区分为任务部队、机动部队、试验部队，并依据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生成规律实施周期轮换。

力量编成实现模块化。模块化是信息时代陆军建设的一个特点。将部队的基本作战单位由师改为旅，最大限度地提升作战部队的战斗效能，能够更好地适应多样化作战需求。美国陆军2003年启动模块化建设，组建了73个作战旅（现役45个、后备役28个）。俄罗斯2008年实施“新面貌”军事改革以来，其陆军组建了85个重、中、轻三类新型作战旅。我军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陆军模块化建设，加快组建新型作战旅，逐步向着以旅为基本战役作战单元、以营为基本战术作战单元的方向发展。作战部队可区分为对地火力、对空火力、特种作战、信息对抗等基本模块，保障部队可区分为情报保障、通信保障、工程保障、防化保障等基本模块，还可根据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需要，组建一定数量的专业性较强的模块部队，比如特种侦察、医疗救援、抢险排爆等。各类模块部队建设既要突出专业化，也要遵循标准化和互联互通的原则，为实现综合集成、体系作战提供可靠的基础支撑，一旦需要即可快速灵活拆分与组合。力量模块的编组使用不是模块与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按照任务需求临时构建力量体系，各个模块之间要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贯通融合。

发展先进陆战武器装备。走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机械化促进信息化、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路子，大力推进陆军武器装备发展。一是完善陆军装备体系结构。通过新研换代加快提高新型机械化装备比例，通过信息化嵌入改造提升现役武器装备技术能力，逐步实现陆军装备信息化机械化；增加陆军高性能预警系统和先进防空武器的编制数量，加强远程火箭炮兵和战役战术导弹部队等精确打

击力量;加快发展特种作战、信息网络战装备和陆航直升机等,积极开发新概念新机理陆战武器,缩小与发达国家陆军的武器“代差”。二是突出指挥系统融合建设。构建和完善网状体系、立体配置的信息网络,发展抗毁、保密、抗干扰性能强的通信系统和分布式、智能化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设计通用应用软件,实现陆军各兵种指挥控制系统的相互兼容,重点建设功能完善、具有与海空军及第二炮兵对接能力的战场感知和传输系统,使陆军指挥信息系统向一体化、轻型化、自动化和自适应的方向发展。三是完善陆军装备管理机制。研究制定陆军装备技术标准,逐步建立作战部队提出需求、科研院所进行研制、试验部队组织试验的武器装备标准化研发采购模式,提高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和维护服务的质量,实现武器系统型号优化,减少同类武器品种,达成装备体系的标准化、模块化,强化陆军武器装备的易使用性和易维护性。

推动陆军军事训练转型。加快陆军部队由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一是突出实战化训练。摒弃“依据想定、单方作业”的方法,展开“敌对”双方自主互动的“真打实抗”,在强度高、变化多、不确定性大的情况下真正达到练谋略、练指挥、练协同、练保障的效果。针对未来作战任务的多样性和战场环境的复杂性,既要强化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提高部队与强敌争夺制电磁权的能力,又要强化复杂地形环境下训练,使部队能够适应山地、高原、荒漠、平原、水网地带和城市作战,还要强化复杂气象水文条件下的训练,磨砺部队在恶劣天气下完成作战任务的意志作风和战术技术水平。二是突出投送机动训练。要改进投送机动训练方式、提高投送机动训练标准、增大投送机动训练频率。在抓好地面投送机动训练的基础上,大力开展陆海空协同投送机动训练;在抓好自主投送机动训练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军地联合投送机动训练;在抓好和平环境下投送机动训练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近实战对抗条件下投送机动训练;在抓好战区内投送机动训练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跨战区投送机动训练。三是突出联合训练。在深化内聚式联合训练的基础上,

广泛开展与其他军种和战区部队联合、现役部队与预备役部队联合以及跨国联合等训练。完善联合训练机制,改进联合训练手段方法,由协作式联合训练向集成式联合训练转变,把不同建制的兵种部队训练融合起来,把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和作战力量训练融合起来,把分散配置的各种训练资源融合起来,“孵化”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联合作战的强大陆战能力。

加快陆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依据陆军发展的战略目标,按照“需求牵引、突出重点、滚动发展、分步实施”的原则,确保陆军数字化部队建设发展与军队建设总体步骤相适应、与其他军(兵)种发展相协调,确保陆军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深入进行陆军数字化部队军事理论研究。在训练实践中,论证并确立陆军数字化部队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的地位作用、使命任务、指导思想、运用原则、编组方式和基本战法,探索陆军数字化部队在一体化联合作战背景下的指挥体制、指挥机构编组、指挥关系、指挥方式、指挥手段和保障措施,研究不同作战样式中陆军数字化部队装备保障的原则与方式、保障力量构成及其编组、保障的组织实施与指挥。在深刻认识陆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与作战规律,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陆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与作战理论体系。

按照“减少层次、增大跨度,压缩规模、提高效益”的原则,探索创新数字化部队体制编制,加大研发和配备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力度。构建起适应数字化部队作战需要的组织系统、各级机构、建制单位、领导指挥关系和职能,构建起数字化部队的指挥结构、层次结构、兵种结构和职能结构,实现扁平化、一体化、模块化和合成化,达成精干、合成、多能、高效的要求。依据数字化部队武器装备系统精度高、威力大、机动快,作战效能高的特点,着眼缩小合成部队规模,向下延伸作战基本单位,突出各级合成部(分)队的独立作战、快速机动、自我保障和独立指挥能力,通过反复实验,确立数字化部队内部的合成模块、兵种模块、专业模块、保障模块等,增强数字化部队的合成程度,提高与其他陆军战斗单位的横向联通,尽快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为陆军军、旅、营体制的建立发展,为整个陆军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起到引领作用。

三、陆军战略运用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方式的变革,军队使命的历史性拓展,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我陆军战略运用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创新战略指导原则,体现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强化控制的战略取向,不断拓展运用领域,创新运用方式。

全域机动。毛泽东曾说过,军队既要学会打仗,还要学会走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力是现代陆军战斗力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立足应对大规模地面入侵、实施国土防御作战,我陆军形成了分区驻防、区域防卫的基本格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东南沿海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的牵引下,这一格局开始调整变化。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行动范围广、作战力量机动性强、作战节奏快的特点,陆军战略逐步突破分区驻防、区域防卫的局限,更加注重机动作战。特别是依托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直升机输送和自身摩托化相结合,适应各种气象、地理、电磁等复杂条件,跨战区组织实施较大规模的快速投送,必要时亦可向境外重点地区快速投送一定规模兵力。这种全域机动,应着眼战时高强度对抗背景下的陆军战略运用,满足多方向、多威胁、多任务的用兵需求,按照快速反应、快速投送、快速部署、快速行动的要求,实施人员和装备、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一体成建制全域机动,努力实现即投即战、边投边战。

立体攻防。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场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信息化条件下陆战越来越具有多栖行动、网电一体、突出攻势、注重特战的趋势。未来我陆军作战的主战场不是国土纵深的内陆地区,而更多的是沿边地区、滨海地区和近海岛礁,还可能延伸至境外与我安全和发展利益攸关的战略通道和战略要地。陆军战略运用应突破长期以来以地面防御作战为主、以近战为主的局限,确立大范围全纵深

立体攻防作战的战略取向,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立体火力打击、立体突击作战、立体战场防护和立体综合保障。主要是依托广域多维的军事信息系统,综合运用地面力量、陆航力量、电子对抗力量、信息攻防力量、特战力量和防空反导力量,实施空地结合的中远程精确火力打击,遂行地面突击作战、低空超低空突击作战、两栖突击作战、信息攻防作战、特种渗透作战、战场防空反导作战以及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等作战行动,并同步遂行全域全程、快速精确的综合保障。

强化控制。陆军作为地面作战的决定性力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其功能作用绝不仅限于攻城夺地,更在于发挥控局制胜的战略效应。陆军战略运用需要强调控制理念,将强化控制贯穿于军事行动的全过程,集中统一指挥与临机决断相结合,精确调控行动目标、方式、节奏和强度,注重灵活组合运用兵力,充分发挥危机事端的处置力、攻坚克难的决胜力、复杂局面的应对力、维护稳定的控制力,谋求最大战略效益。平时,通过积极备战和实施军事威慑及非战争军事行动,达到慑止外敌威胁、维护国内稳定、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战时,在其他军种的配合下积极夺取陆战场控制权,破击并占领敌地面关键节点,限制敌地面机动,压制敌地面火力和信息攻击,剥夺敌地面力量的抵抗能力。战后,作为主力广泛参与维稳行动,持续存在、控制态势、主导局面,确保从战争状态顺利转向和平状态,把军事上的胜利最终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

第二节 海军战略

海军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海军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服从和服务于军事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着眼打赢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巩固国家海防安全、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支撑国家海上利益拓展,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坚持威慑与实战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海军战略,为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

一、海军战略的历史沿革

人民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建立以来,其战略发展经历了“沿岸防御—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近海防御、远海防卫”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军以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运用的重要论述为统揽,战略思想经历了从“沿岸防御”到“近岸防御”的转变。1949年1月,党中央作出组建“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战略决策,为海军初创时期的“沿岸防御”战略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海军的战略任务:“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国必须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①海军边建边战、加速发展,到1955年年底已成为拥有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上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五个兵种的海上力量,并且出色地完成了突破海上封锁、解放浙东沿岸岛屿等作战任务。这一时期由于海军建设刚刚起步,舰船数量少、吨位小、火力弱,作战体系尚不成型,不具备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只能在沿岸海域配合陆军、空军遂行作战任务,“沿岸防御”实质是陆上军事斗争在沿岸地区的有限延伸。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海军战略任务由解放沿海敌占岛屿向保卫国家海防转变,海军建设也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武器装备实现了从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到基本自我研制的转变,海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战略性军种,转而实施“近岸防御”,并相应提出了“海上破袭游击战”“开辟海上独立战场”“依托岛岸作战”等战略理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海军以邓小平、江泽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民关于海军建设运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正式提出了“近海防御”战略,形成了海军战略理论体系。1979年7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①为适应国家和军队战略的重大转变,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1985年年底海军首次明确“近海防御”战略,开始推进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的重大转型。这一战略的主要内涵包括:第一,近海防御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既不是远洋进攻,也不是沿岸防御。第二,近海防御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将来海军现代化了,防御性质也不会改变。第三,海军的作战海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主要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沿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区。第四,战略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应付海上局部战争,遏止和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来自海上的侵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第五,战略任务可以区分为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两个方面,平时期主要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保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服务国家外交政策,遏止可能来自海上的侵略,应付可能发生的海上局部战争,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战争时期主要是独立或协同陆空军作战,有效抵御敌人来自海洋方向的进攻,保护己方海上交通运输线,在统帅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核反击作战。^②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和长远规划,把握世纪之交的历史发展机遇,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了“近海防御”战略思想。海军遵循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形成适应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精干有效的武器装备体系,加快建设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具备遂行新时期军事斗争任务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1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见《刘华清回忆录》,第437~43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的威慑和实践能力,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2004年以来,海军贯彻落实胡锦涛关于海军建设运用的重要论述,加快实现从“近海防御”向“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拓展。将战略前沿由近海逐步推向涉及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远海,统筹应对海上多种安全威胁、完成海上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战略要求,统筹近海和远海战场建设,统筹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在不断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的同时,逐步向远海防卫转型,提高远海机动作战能力,逐步构建与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积极遏制和有效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战争威胁。

二、海军的战略任务

在当今乃至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家利益拓展主要在海洋,国家安全威胁主要在海洋,军事斗争焦点主要在海洋,应对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综合我国海上安全形势和海上利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海军战略任务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参与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海军作为我军海上作战的主体力量,必须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重点围绕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和决战决胜的需要,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与其他军兵种力量紧密联合,实施信息突击、火力打击、海空封锁、立体登岛、多维防护及反强敌介入等多种作战行动,夺控战场综合制权,控制战局发展,夺取战争胜利,坚决捍卫国家统一。

遏制和抵御海上军事入侵。毛泽东曾指出:“从1840年到今天,100多年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反对外敌海上入侵是我们党创立海军基本的战略考虑,是人民海军根本的长期的战略任务。沿海地区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所在地,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集中了全国38.5%的人口、34.3%的大中城市、66.1%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上看,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还不是很强,且直面强敌海空天网优势作战

体系,在战争条件下很可能成为强敌首选的打击区域。海军应与其他军兵种力量联合,遏制、防范和抗击可能来自海上方向的进攻,特别是较大规模较高强度的中远程精确打击,确保本土安全。未来首都防空应主要考虑来自海洋方向上的强敌空天网战略突袭,海军应积极前置,拓展阻打纵深,发挥战略牵制和打击效能,在维护首都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

维护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我国拥有 18000 多千米的海岸线,6500 多个岛屿,约 300 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海洋经济产值从 1978 年的 60 多亿元猛增到 2011 年的近 4.3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 GDP 的 10%,已经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产业。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与海上方向多个邻国存在岛礁归属或管辖海域划界争议。约 150 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被他国实际控制,50 余个岛礁被相关国家占领,形成了岛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的局面,围绕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复杂敏感。在维护海上形势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有效维护海洋主权权益,制止海上侵权和违法活动,保证我海上生产、开发和科研活动正常开展,是海军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保护海洋交通运输安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贸大国,资源 and 市场两头在外,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 60%,原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超过 50%,90% 以上的进出口物资依赖于海上运输,先后开辟了 30 多条远洋运输航线,通达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个港口,途经马六甲海峡等多个国际重要海峡水道。这些航线和水道已经成为我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虽然总体上保持畅通,但既不为我所有,也不为我所控,一旦发生海上危机或战争,我之海上运输就有被切断的可能。近年来,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快速滋生,以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国际海域成为海盗活动的多发区,对我国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威胁日益突出。自 2008 年 12 月以来,海军已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常态化护航行动。未来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确保海上交通运输安

全的任务将十分繁重。

参与维护海外利益及公民侨民权益。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我国机构、人员和资产遍布全球,我国还在北冰洋以外的三大洋开辟了渔场,每年有 1800 多艘渔船在 30 多个国家附近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海外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海外资产被侵害、公民侨民生命受危害的事件呈上升趋势。2010 年海军赴利比亚接护人员的行动,开创了海军海外救援行动的先例。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和公民侨民权益,将成为海军的一项经常性的战略任务。

参与实施核威慑和核反击。海基核力量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和装备性能的不断提升,我国海基核力量整体能力不断增强。未来军事斗争中尤其是战争条件下,我面临的敌人可能拥有核力量甚至具备核优势,不排除其对我进行核威胁乃至核打击。海军需发挥海基核力量隐蔽性好、打击能力强、作战范围广等优势,协同其他战略核力量,积极开展核威慑与核反击作战行动,粉碎敌对我之核讹诈与核打击图谋。

配合陆上方向军事斗争。未来我陆上周边安全环境总体趋稳,但也还存在许多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危机、引发冲突乃至升级为战争。海军应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和部署下,积极展开海上威慑和作战行动,发挥海战场的战略翼侧和牵制作用,有力配合和支援陆上作战。

此外,参与维护国际海洋空间安全也是我国海军日益重要的战略任务。海洋是人类的战略资源宝库和人类交往的大通道,维护这一空间的安全,对于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海洋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绝大部分是公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空间。我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参与维护国际海洋安全既是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2008 年,胡锦涛向世界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为我国海军参与维护国际海洋安全指明了方向。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海军建设的发展,海军作为一个

国际性军种,将在维护国际海洋安全、构建和谐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承担更多任务、发挥更大作用。

三、海军的建设发展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集体的一个战略夙愿。海军创建初期,毛泽东连续五次题词,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要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海军在建军之初,确立了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的建设方针,将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作为建设重点,并由此形成了以“空、潜、快”为重点的海军装备建设方针。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军发展成为一支以岸基歼击航空兵、常规潜艇和各型快艇为主的近岸型海上作战力量。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海军“近海防御”战略的提出,突出强调建立一支精干顶用的、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人民海军,提出了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发展的建设方针。90年代以来,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牵引推动下,围绕具备在近海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海军建设步伐明显加快,逐步形成以核潜艇、远程对海突击飞机、大中型水面舰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为骨干,以电子信息装备为纽带,以后勤支援装备为保障的海军武器装备体系,成为一支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五个兵种,以及相关专业保障力量组成的具有较强近海作战能力的战略性军种。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遵循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海军继续完善机械化建

设,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着重提高海基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基地防御能力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着力解决信息化总体水平不高、联合作战体系存在短板、兵力结构还不够优化、官兵综合素质尤其是信息化素质不够高等突出问题,逐步构建与打赢信息化海战需要相适应、与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

全面加强海上信息系统建设。信息系统是海军遂行海上军事行动的中枢,是形成海上体系作战能力的主要支撑。发达国家海军装备卫星、预警机、侦察机、岸基和海基远程雷达,其信息系统的作用范围能覆盖太空、空中、水面、水下和电磁空间,能实现对海空目标的远程发现、敌我识别、跟踪定位、火力分配和武器引导,不仅可以保障战略战役战术不同层次作战指挥的需要,也可以保障各种武器使用的需要。美国航母编队在侦察卫星的支援下,监控范围可达 1500 ~ 1800 千米,与舰载机、水面舰艇和潜艇的对海对岸打击范围基本匹配。与发达国家海军相比,我海军信息系统建设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一些重要领域仍处空白。据此,我们需要把加强信息系统建设作为转变海军战斗力生成模式、建设信息化海军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强化岸基信息系统、天基信息系统、空基信息系统和 underwater 信息系统建设,推动信息感知关键节点由陆基、海基向空基、天基拓展,信息传输向网络化、体系化发展,指挥控制向战略战役战术交互融合、兵力指挥与武器控制一体联动迈进。

加快发展海军新一代主战武器装备。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需要,瞄准世界强国海军武器发展趋势,根据我当面海区自然地理纵深短浅等特点,重点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先进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远程多功能海上作战飞机,海上(水面、水下、空中)无人作战平台,高性能对空对海对岸导弹等,同步发展作战保障装备,切实解决制约当前海军体系作战能力特别是远海作战能力的装备短板,加快形成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以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具备水下、水面、空

中相结合,远、中、近相衔接的立体打击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航母仍将是海上火力、兵力和信息力综合投送的主要平台。目前世界上有9个国家共拥有各型航母20余艘,美、俄、英、印等国正在积极发展新型航母。发展航母对于维护我国国际地位、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具有重大意义。我军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和运用模式,加快发展我国的航母编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海上军事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着力发展海基战略核力量。海基战略核力量能在海洋深处隐蔽发起核打击,被世界主要核大国视为保持核反击能力的可靠手段。目前,美、俄海基核力量在其整个核力量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一半,法国超过80%,英国核力量则全部依靠战略导弹核潜艇。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奋斗,海基核力量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有不小的差距。面对美国及周边部分国家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客观形势,发展海基核力量,对于维护我核威慑和核反击的可靠性、可信性、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海军应按照“核常兼备、双重作战”的要求,加快研制装备新型战略核潜艇,形成一定规模的海上核反击作战能力。

调整海上兵力部署和战场布局。按照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统筹黄海、东海、南海兵力部署和战场建设,搞好濒海大陆、近海、远海三个战略区域的有机衔接,北固南拓、重心南移、适度靠前,基地支撑和前沿预置相结合,逐步构建依托大陆、凭借岛礁、力量前伸的大区域海上防卫体系,创造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对外辐射的有利态势。加强以战略母港为重点的大中型港口和骨干机场建设,满足航母、战略核潜艇和大型驱护舰编队驻泊补给的需要。

着眼未来海战特点优化兵力结构。改变长期以来海军按兵种编组的兵力编成模式,逐步向任务主导的兵力编成模式转变,大幅提升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根据航母研制和列装进度,适时组建航母编队,形成海上机动作战的战略“拳头”力量。加强海上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适度增编海上特种作战和两栖作战兵力。

进一步优化海军指挥结构,适当减少指挥层次,提高指挥效能。

四、海军的战略运用

随着信息化条件下海战方式的变化和国家利益在海洋方向的大力拓展,海军战略运用的空间、时机、方式和指导原则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海军作为一个综合性、战略性、国际性军种,必须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在坚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平时的非战争运用,充分发挥海军的战略效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捍卫海洋权益和利益拓展提供坚强保证。

(一) 海军战争运用

人民海军是在战斗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曾先后完成了一系列海上作战任务,提出了富有我军特色的海上作战指导思想。海军在建立之初,为防止美国海上入侵、保卫沿岸安全,确立了“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的作战方针。1953年,为应对台湾国民党军队海上封锁破坏,确立了“力量前伸、积极作战”的作战方针。1957年正式提出了“海上破袭战”的作战方针,并在1960年发展为“发展海上破袭战、开辟海上独立战场”。80年代根据“近海防御”战略,着眼应对抵御外敌大规模入侵,确立了“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作战方针。

新的历史条件下,海军面对的战争已从机械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条件下的海上局部战争。这种海战的特点:一是背景复杂。海上方向引发冲突乃至战争的矛盾多、诱因多,这些冲突和战争之间既有战场条件、力量对比和作战目的上的差别性,又由于利益矛盾的交织而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我在某一方向与某个特定对手的作战可能会引发其他方向乃至地区和国际范围的连锁反应。二是信息化程度高。我海上方向可能的作战对象十分重视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装备了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有的国家还拥有攻防能力完善的海上机动作战编队,在作战中能够得到域外强国的支援。可以预见,未来海上方向发生的局部战争,战场将涉及陆、海、空、天、电各领域,各种导弹、智能化鱼水雷等信息化武器将得到广泛使用,空中、水面、水

下远程精确打击,网络电磁对抗,特种破袭将成为海战的基本方式。三是作战行动复杂。一方面表现为海军作战样式的多样性,包括进攻海上兵力集团作战、海上封锁作战、岛礁进攻作战、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常规袭岸作战等。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这些作战样式很可能并行交叉进行。其并行交叉的范围和程度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而有所不同,即使是针对同一对手在小打、中打、大打的不同背景下也有很大区别。

根据信息化条件下海战特点和我海上作战能力的实际,我海军未来作战应突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突出纵深作战。海上作战不能局限在近海,不能被封堵在近海,必须统筹近海与远海两个战场,扩大海军作战的范围,将打敌前沿与打敌后方相结合,海上作战与空中、陆岸、太空、网络电磁空间作战相结合。面对外部势力军事干预尤其要强调“打出去”,实行敌进我进,对敌形成纵深防御和威慑之势。

二是突出攻势作战。面对复杂多变的海上安全形势,未来海上局部战争要依靠攻势作战赢得主动、争取胜利。海军作战指导要把进攻从战役战术层次提升到战略层次,以坚决、迅猛、不间断的攻势行动,瘫痪敌作战体系,剥夺敌作战优势,控制战场局势、战争进程和战争结局。在兵力运用上,强调在其他军兵种的支援下,以海上联合机动编队海空打击、潜艇兵力水下封控、突击航空兵空中打击、特种兵渗透破袭等进攻行动,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三是突出联合作战。一体化联合作战是海上局部战争形成体系优势的基础,是海军在近海作战的主要形态。海军既要发挥海上主要作战力量的作用,又要着眼形成联合作战优势,按照统一分配任务、统一兵力编成、统一实施指挥的要求,服从全局需要,形成三军一体、军民一体的海上作战体系,发挥信息、兵力和火力综合优势。

四是突出非对称作战。针对近海战场和远海战场的不同特点,应施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作战指导。近海战场强调多种作战样式同时或交替进行的整体攻防作战,以形成对主要方向、主要作战对象

的战场胜势,为远海作战创造条件。远海战场强调联合作战条件下的相对独立作战,突出潜艇和远程突击航空兵的运用,突出对敌重要节点、高价值目标的打击,通过将战场推向敌战役战略后方,减轻近海战场压力。

(二) 海军的非战争运用

人民海军自成立起就承担并完成了大量护渔护航、海上科考等非战争军事任务。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利益在海上方向的拓展和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长,海军非战争运用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凸显。以亚丁湾和索马里护航、利比亚撤侨等行动为标志,海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出现了远海护航常态化、远海活动经常化、行动内容多样化的新特征。海军的航迹遍及世界绝大部分海域,海军的行动涵盖海上侦察、海上调查、海上维权、海上军事合作、海上反恐、反海盗、救援救灾、处置海上突发事件等非战争运用的主要领域。新形势下,人民海军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既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构建和谐海洋的具体实践。

海军非战争运用应坚持服从国家政治、外交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以海上维权为重点,以海上安全合作为依托,着眼服务大局,积极参与、广泛合作,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和领域,着力扩大国家和军队影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应突出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是扩展兵力活动空间。国家海上方向新的安全和利益格局客观上要求海军不断提高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这必然要求海军进一步扩展兵力平时活动的空间范围,进一步加强针对战略运输通道和重要利益区的海上军事存在。这种扩展和加强,既包括海军赴远海开展反恐、反海盗活动的进一步经常化,也包括远洋科考调查、海上医疗、舰艇出访以及海上维和、人道救援等活动的进一步经常化。

二是扩展兵力使用范围。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提高和检验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海上威胁的多样性决定了海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多样性和部队任务的广泛性。海军应进一步拓宽开展非战争

军事行动的兵力使用范围。要让更多作战部队通过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检验装备、锤炼作风、提高能力。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海军专业保障力量的作用,加强海军专业力量的建设和统一调配使用,以医疗救护、物资补给、特装维修和外事、法律专业为重点,逐步打造一支适应远海任务要求、具备多种能力的海军非战争专业队伍,让更多的医院船、补给船和专业保障分队走向海上军事行动的前台。

三是扩展海上安全合作。海军应本着开放、务实、合作的精神,适应海军护航任务常态化、兵力行动远洋化等新特点新要求,重点围绕国际维和、救灾救援、海上反恐、反海盗等海洋公共安全领域,深化与友好国家海军关系,加强与相关国家海军的联系,加大人员和军舰互访、军事磋商的力度,尤其要充分利用远海护航、联合救援等多国行动提供的国际平台,不断扩大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逐步提高我在国际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节 空军战略

空军战略是筹划和指导空军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服从和服务于军事战略。随着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利益的空天拓展和空天领域斗争的日益激烈,我国对空天安全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增大。人民空军正加快转型建设,大力推进由航空力量向空天一体化力量转变,由机械化空军向信息化空军转变,由空中支援型力量向战略主导型力量转变,在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战略作用。

一、空军战略的历史沿革

人民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建立。60多年来,空军战略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一) 初创时期

在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党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

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1949年及1950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中央军委于同年7月致电第四野战军,提出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在《制止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新侵略》一文中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到1955年,人民空军历经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台湾军事斗争准备和防空斗争的洗礼,已经初具规模。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科技基础薄弱,航空工业十分落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立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指导思想,要求空军担负“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战略任务,走出一条先成立空军后发展航空工业的道路。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初创的人民空军面对世界最为强大的美国空军,制定了“在实战中锻炼和发展”的战略方针。在战争中“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创造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等有效战法,培养了一大批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人民空军迅速发展壮大。

(二) 国土防空时期

1956年到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高度重视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强调把空军建设置于国防建设的优先地位。邓小平在1979年就说过:“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和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的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我看今后重点放在发展空军。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①这一时期,空军建立了空防合一的体制,主要战略任务是实施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1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国土防空,支援陆军、海军作战。先后成立了航空兵(包括歼击、轰炸、强击、侦察、运输航空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探照灯兵、雷达兵、空降兵等多个兵种,人民空军进一步发展壮大。根据中央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空军确立了以国土防空为主要作战目的的战略思想。同时,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加快航空工业发展,在武器装备上,逐步摆脱了完全依赖国外援助的局面,形成了购买仿制、自我研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空军制定和出台了包括《空军战斗条令》《飞行教令》等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法规,加强了军事训练,对推动空军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空疆防御时期

20世纪90代,我空军主要战略任务是实施空疆防御,确保夺取制空权。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引下,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推动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战略运用和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江泽民在1997年指出:空军要加强空中进攻力量及相应的配套建设,逐步实现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1999年,他又强调:“空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攻防兼备的强大的人民空军。”^①空军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展开的空军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空疆防御”“空军转型建设”等战略思想和思路,制定了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的建设目标、原则和举措,加快空军战略能力向攻防兼备协调发展,推进人民空军的信息化建设进程。

进入21世纪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明确要求,“在新的起点上推动空军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空军”^②,从履行历史使命和维

^①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36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努力建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载《解放军报》2009-05-23(1)。

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新世纪新阶段空军建设的目标,指明了人民空军的发展方向,创新发展了关于建设强大人民空军的重要战略思想。2004年,明确了“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空军战略要求。据此,空军战略任务进一步拓展,在遂行国土防空、空中进攻、支援陆海军作战等任务的基础上,将“经略空天”作为战略任务的基本指向。

二、空军的战略任务

空军应把握维护国家空天安全对空天力量的战略需求,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实行“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空军战略,确立以夺取战场制空权为核心的一体化攻防作战思想,在国家主权区和战略利益空间遂行军事行动,塑造空天态势,控制空天危机,打赢空天战争,为国家和平发展提供可靠的空天安全保障和有利的空天力量支撑。空军应当发挥空天防御、战略投送、快速反应、立体机动、地区到达、广域覆盖等方面的专长,进一步发挥侦察、监视、进攻、防御和投送等全维作战功能,有效遂行空天力量显示、空天威慑和反威慑、空天安全合作等重大军事任务与行动。在和平时期,严密监视战略空间的安全态势,抵御各种外来侵扰。在战时,有力掩护国家核心目标安全,积极夺取制空权,在维护国家空天安全的斗争中发挥主体作用。未来一个时期,空军的主要战略任务有:

一是参加主要战略方向军事斗争。适应主要战略方向军事斗争的需求,以多种空中斗争方式和手段保持对作战对象的压力,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变。一旦局势变化,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空军要以不同样式、规模和强度的作战行动(如警示性火力打击、应急作战、联合火力打击、封锁作战、登岛作战等)参加联合作战,同时组织战区防空作战,保卫重要目标安全。严密防范和准备抗击强敌可能采取的空天军事干预行动。

二是组织实施平时和战时的国土防空作战。严密组织以首都为中心、以沿海地区为重点的日常防空。逐步扩大空中监控和活动范

围,有效维护国家的领空安全和主权。战时,在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下,组织首都及其他重要地区的联合防空作战,确保国家重要战略目标的空中安全。

三是参加保卫边海防地区安全稳定和海洋权益的军事斗争。加强边海防地区的空中防卫,与其他军兵种共同保卫国家边境地区和海洋国土安全,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海上方向,与海军协同实施各种作战行动;在陆上方向,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空中警戒,协同陆军实施自卫作战和应急行动。

四是参加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支援国家建设活动。参加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参加抢险救灾行动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

五是参与国际军事交流合作。主要有国际救援、维和行动、护侨撤侨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活动。

三、空军的建设发展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关怀支持下,人民空军建设从无到有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空军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各项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综合作战能力显著提高。当前,应按照21世纪上半叶军队“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分阶段推进空军现代化建设。空军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相适应,能够全面遂行战略战役任务、“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现代化空军。当前,应瞄准世界一流空军,适应空战发展趋势,着眼满足国家空防需求,以信息主导、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全域反应为发展方向,努力推进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由航空型向空天一体型、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

为实现空军建设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努力完善一个系统、拥有五支力量、具备七种作战能力。一个系统,即以天基信息平台为重要

依托,空、天、地一体,战略战役战术三级联网,覆盖空军战略活动空间,技术手段先进,各类信息融合,系统高度集成的指挥信息系统。五支力量,即:一支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空中进攻作战和攻势防空作战需要、具有较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空中进攻力量;一支与保证国家空防态势稳定相适应、具有抗击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空袭和重点区域反导作战能力的防空反导力量;一支与空军攻防力量相适应,与空军作战空间相匹配,空天地一体,能在各种复杂条件下提供战略预警和保持战场透明的侦察预警监视力量;一支拥有软硬杀伤手段和综合防护技术、具有对敌各类信息系统实施有效压制摧毁和具备综合信息防护能力的信息作战力量;一支适应战略投送和空军机动作战、空降作战需要的战略空运力量。七种作战能力,即同时遂行一场大规模高端空中进攻战役和一场大规模高端空天防御战役所需要的能力,具体包括:一是较强的中远程空中精确打击能力;二是抗击敌信息化条件下空袭的防空反导作战能力;三是覆盖空军作战空间的信息支援能力;四是空地结合的电子战和网络战能力;五是空中战略投送能力;六是空降作战能力;七是适应大规模、高强度持续作战的综合保障能力。

把握空军建设发展的重点,是确保实行“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其主要内容是:

构建全疆域一体化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全军天基信息资源,进一步提高空中侦察、预警、指挥平台的质量和数量,研制列装先进数据链,按实战标准和要求推动天、空、地多维信息系统组网。大力发展战略战役预警系统、作战指挥系统,扫除雷达盲区,加快雷达组网,形成以首都为中心、覆盖全部国土及周边广大区域的战略预警系统,形成覆盖高中低空、远中近距离的空战指挥信息系统,从根本上解决探不远、看不清、控不着的问题。

发展中远程空中精确打击系统。加快建成以四代机为骨干、三代机为主体的中远程空中精确打击系统。一是要精干。注重质量,优化性能,力争与世界强国空军基本保持同代技术水平。二是重远

战。有效作战半径应达到境外 3000 千米,使平台半径或平台半径 + 火力半径达到第二岛链,为扩大防空区域、尽远拒止敌空天进攻提供能力保障。三是成系统。按照作战与保障、平台与弹药协调配套发展的要求,努力发展多功能四代机、空中加油机、远程侦察机、预警指挥机、无人机,以及空射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等制导弹药,着眼未来作战需求筹划发展隐形战略轰炸机以及空天作战飞机、临近空间打击武器、机载激光武器等空天一体装备。

打造新型防空反导体系。兼顾全国防空和多方向作战需要,建立成网而有重点的防空反导体系。一是适当弥补空白。现代防空体系建立再多的地面站点也难以做到天衣无缝,况且防空与进攻手段相比投入资源要大得多。应通过适当增加指挥站点和多使用诸如预警指挥机等新手段,尽量弥补地面监视和指挥控制的空白区域。二是筹划首都等重点地区的反隐形战机、无人机系统和末段反导系统。相关研发、试验和部署应整体筹划、迭代推进,力争尽早形成一定规模的实战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成覆盖全部国土的防空反导体系。

发展战略空运系统。战略空运能力是战略空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军机动能力的基础支撑。从世界范围看,战略空运能力是战略空军的基本能力要素。我军应着眼未来远程快速空运、空投和空降任务需求,大力发展大中型、远航程、多功能运输机,力争使战略空运能力在不长时段内实现历史性跨越,确保平时和战时能够实施远程快速大规模空中投送机动。

建立“三线控制”的布局。调整优化空军力量部署和战场建设,逐步形成以基地为支撑、覆盖全国、有效外向辐射的空防布局。能够以领空为绝对安全区,实施可靠控制;以领空实际控制线至第一岛链及周边主要国家为有限控制和安全合作区,对敌对势力实施预警侦察、巡逻警戒、远程拦截、有限打击,与友好国家开展空天合作;以第一岛链至第二岛链为远程监视和有限威慑区,对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基地进行严密监控,保持必要的威慑状态。

四、空军的战略运用

随着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发展,按照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需求,空军战略运用的空间、时机、方式和指导原则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空军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祖国统一并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空中安全保障;在我国全部领土和战略利益相关的海域上空实施积极的攻势防御;在做好实战准备的基础上,与其他武装力量一起构成整体军事威慑态势,遏制战争爆发,控制战局发展;注重发挥空军快速机动灵活的长处,形成整体作战威力,有效应对不同方向、不同样式的空中威胁。基于上述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空军的战略运用具有以下要求:

攻防兼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践表明,空袭与反空袭作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贯穿战争全程,关乎战争胜负。优势一方初战即以非对称空中进攻瘫痪对手作战体系,使弱勢一方难以组织有效防空行动。当代空中作战,越来越强调攻势主导、以攻助防,以凌厉的空中进攻达成作战目的。美、俄、法、以色列等国均在积极发展空天进攻力量。目前,我周边一些国家也在发展进攻型空军。印度《2020年空军构想》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能够携带核武器的远程多用途战略空军,实现由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战略性威慑防空型”转变。我国空军的战略运用也需要突破国土防空的局限,空中进攻、防空反导、空降作战和信息作战紧密结合,攻防兼备、以攻助防,通过战役战斗的空中进攻达成战略防御目的。

空天网一体。空天网一体是当代世界空军战略运用的发展趋势。2005年美国空军在其《使命宣言》中提出,要“随时强势出击——在天空、太空、网空飞行和战斗”。2007年美国空军成立网络战司令部,其任务是使网络作战与空中、太空作战充分融合。随着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发展,我国面临的战争威胁也越来越具有空天网一体的特点,这就要求我空军适应空天网跨区域融合趋势,着眼应

对空天网一体化威胁,加强天基信息应用,提升防御高度,将传统的防空作战拓展为防空反导防天作战,将传统空中进攻作战拓展为空中、临近空间、外层空间的一体化打击,积极遂行网络空间作战,有效完成空天网一体化攻防任务。

远程使用。远程使用是世界强国空军发展的共同目标。美国空军强调“全球闪击”,力求1~2小时能打击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目标;俄罗斯空军强调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数千千米之处的战区作出快速反应;印度空军强调地区型战略打击,拥有“从波斯湾至马六甲海峡潜在战略影响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空军的战略运用范围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应当以领空为绝对控制区,以第一岛链为有限控制及安全合作区,以第二岛链为远程监控、灵活反应区。与此相适应,空军需要更多地实施远程预警、远程侦察、远程制空、远程打击、远程投送、远程保障等行动,加快从国土防空到全疆域运用的转变,实现全国部署、全疆到达、全域反应,行动能力有效覆盖我国全部领土和战略利益相关的海域上空。

快速反应。快速反应,先机制敌,是信息化条件下空军运用的一个基本原则。我空军无论是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无论是实施作战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都需要充分发挥自身机动速度快、机动范围大、较少受地面交通条件和地形条件影响等优势,把作战力量迅速、准确地投送到任务区,高效率完成行动任务;能够快速从执行战略任务转换为执行战役战术任务,或从执行战役战术任务转换为执行战略任务;快速从防空作战转换为空中进攻作战;迅速从一个战区转场至其他战区作战;快速从境内飞临境外实施必要军事行动,甚至借助空中加油实施不落地的跨国行动,切实成为我军遂行多种性质多种规模应急行动的可靠战略性力量。

联合夺控制权。战时空军的战略运用,应按照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与其他军兵种密切配合,将夺取和保持战场综合控制权作为空军作战的重心,有效实施以夺取制空权为核心的一体化攻防作战。通过积极的空中攻防作战行动,摧毁、压制敌方防空作战体系,确保

己方防空作战体系稳定;剥夺、限制敌方空中行动自由,确保己方空中行动自由;或以空中进攻直接达成战略目的,有力支援三军联合作战,赢得作战胜利。

新的历史条件下,空军战略运用的基本方式主要包括:

战略侦察预警。在空天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空军侦察预警应由战役、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延伸,由对空侦察预警向对空对天一体预警发展,将常态化、一体化的空天战略侦察预警作为空军运用经常性的重要方式。

空天威慑。一是组织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显示空军战略能力和战略决心。近年来,空军积极参加灾害应急救援和联合军演,向外界展示了空军的战略能力。未来应在远海训练、战略巡航等方面有所突破。二是在空天一体、防空反导上有新的突破,积极参与空间军事斗争,逐步发挥以空制天的威慑作用。

防空反导。平时,防空除了传统的防备敌飞行器的入侵和袭扰,还要适时组织实施重大活动的空中安保,严密防备和处置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空中恐怖活动,参与国家领空管理。战时,严密组织实施防空反导作战,重点防打隐形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抗御外空打击。

空天进攻。一旦战争爆发,天基信息支援下的空中打击将是空军的主要战略运用方式。不仅要周边临近地区作战对象实施战役规模的空中进攻,还要积极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实施特种作战和空降作战,夺取制空权、制信息权,以空制地、以空制海。未来条件成熟时,还要使用地基、空基平台实施防天、反天、制天作战。

战略投送。一是空军作战兵力的远程投送;二是运用各种力量保障我军其他应急力量的远程投送。未来空天飞机发展成熟,还可将天基力量投送作为空军战略投送的重要方式。

空天安全合作。空军应积极开展对外军事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军演、联合反恐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这不仅可以使空军以和平的方式走出国门,还可以发挥空军在稳定周边地区安全态势中的作用。

第四节 第二炮兵战略

第二炮兵战略是筹划和指导第二炮兵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和策略。作为军种战略,第二炮兵战略从属于军事战略,同时接受国家核政策、核战略的指导和约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加强第二炮兵建设,使其真正成为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强后盾,就必须不断创新发展第二炮兵战略。

一、第二炮兵的战略定位

第二炮兵以陆基战略核导弹和常规导弹为基本装备,在国家军事力量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第二炮兵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部队

战略导弹核武器射程远、速度快、威力大,对战争和国家安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影响,是典型的战略武器。导弹核力量对世界上任何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言,都是主要的战略力量,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作战使用权高度集中,作战活动受到严格控制。第二炮兵自1966年7月1日正式组建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战略力量,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掌握。第二炮兵建设、发展和运用的重大问题、重大活动,都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决策。这种基于战略核导弹武器本质的规定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实质性改变。

(二) 第二炮兵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核爆炸具有超强的杀伤破坏效应,导弹则具有飞行速度快、难以有效防御的特点,两者结合,使导弹核武器成为主要用于威慑目的的战略性武器。第二炮兵在组建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我国唯一的战略威慑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太空等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战略威慑

领域,战略威慑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威慑手段达成。但不论是从核与非核威慑手段的内在作用机理分析,还是从核与非核威慑手段的实际效用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核威慑无疑仍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基干,在遏制大规模战争、有效制衡主要战略对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目前,第二炮兵是中国核力量的主体,也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三) 第二炮兵是我军常规远程打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对军事力量的远距离有效控制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远程控制成为我军常规军事能力发展的重要方向。20世纪90年代初,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二炮兵开始组建地地常规导弹部队。经过20年的发展,第二炮兵常规导弹力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作战能力不断提升,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与其他常规武器相比,地地常规导弹武器具有打击距离远、命中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反应迅速、完全依托本土作战等特点与优势,是目前我军实施远距离作战的主战兵器。在未来我军远战兵器多样化、远程作战能力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常规导弹武器在与强敌对抗中,仍然有其比较明显的优长。第二炮兵作为我军实施常规远程打击的重要力量,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四) 第二炮兵是我军作战能力拓展的重要依托

近年来,围绕空间、网络等领域的竞争和对抗日趋激烈,军事能力向这些领域延伸发展成为必然趋势。第二炮兵装备的弹道导弹,实战中基本上都穿越外层空间。围绕战略导弹的攻防、突防与拦截的对抗,是典型的太空作战行动。而经略太空、实施太空作战的重要基础与基本前提,就是能够将航天器送入太空。第二炮兵装备的导弹运载工具,经过简单改造,即可用于航天器投送。从世界航天发展情况看,通过地基导弹实施对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攻击,在未来一个时期是可行与可靠的太空攻击手段。第二炮兵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建设,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太空能力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硬件条件以

及人力、智力资源等,具有发展太空能力、实施太空作战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是我军作战能力向太空领域拓展的重要依托。

二、第二炮兵的战略任务

第二炮兵的战略任务随着国家安全形势以及国家利益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变化。中国的导弹核武器是在霸权国家频频对中国发出核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起步的。在第二炮兵正式成立之前,中国地地导弹部队的主要战略任务,是尽快掌握使用导弹核武器,形成核实战能力,以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反对核大国的核威慑。从第二炮兵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着力于做好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准备。这一时期,第二炮兵的战略任务主要是,通过不断增强核实力,遏制敌对国家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随时准备在遭到敌国核袭击后实施有效的自卫反击,捍卫国家安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洲际核打击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发挥导弹核武器的威慑作用,遏制核战争爆发,在第二炮兵战略任务中的地位凸显。第二炮兵战略的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90年代初,第二炮兵开始组建常规导弹部队,实施常规威慑和常规作战成为第二炮兵使命任务中的新内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着“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第二炮兵职能使命也有了新的充实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是发挥“四个作用”:

适应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第二炮兵应充分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砝码作用,为我国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作出应有的贡献。冷战期间,中国核力量“四两拨千斤”,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独特贡献。新形势下,中国核力量的这种独特的“平衡器”作用仍然有效,是我军履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使命的重要体现。

适应我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与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第二炮兵应充分发挥体现我国国际地位的支柱作用,为树立大国形象、履行大

国责任、维护国家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核武器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科技水平。核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国际威望的塑造以及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等,都是其他类型武器所难以达到的。核武器一直是我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今后仍然是彰显我国国际地位、形象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第二炮兵应充分发挥维护我国安全环境的后盾作用,为有效应对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威胁和挑战作出应有的贡献。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营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必须有效遏制战争,特别是防止爆发大规模战争,这对战略威慑手段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核武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盾牌”,第二炮兵作为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在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和挑战中,应当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适应战争形态的演变和军事斗争准备的现实需要,第二炮兵要充分发挥遏制战争威胁、赢得防卫作战胜利的战略“重拳”作用,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应有的贡献。第二炮兵装备多种型号、可有效打击不同距离上多种类型目标的常规导弹武器,是我军常规作战的“尖兵利器”,对强敌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

为了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第二炮兵主要担负以下战略任务:

遏制敌人对我国使用核武器。在应对核战争这种最严峻的安全威胁时,核武器超强的杀伤破坏力决定了核力量的威慑作用。中国从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起,就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地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二炮兵始终将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作为战略使命。只要世界上主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中国和平发展就面临着来自世界霸权国家严峻的军事挑战。有效遏制敌对国家对我国使用核武器,仍然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这也是第二炮兵有效履行新时期历史使命的集中体现。

实施战略核反击。当中国遭到敌方的核袭击时,第二炮兵将依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有效地实施核反击作战,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实施核反击,既是第二炮兵实战运用的基本方式,也是实施有效核威慑的基础。只有真正具备了核反击能力,确保在遭到对方核袭击情况下,能够组织起有效核反击,给对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核毁伤,才能真正达到慑止核战争爆发的目的。因此,遂行核反击作战是第二炮兵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关键内容和重要任务。

实施常规导弹精确打击。运用常规导弹武器实施精确打击,是第二炮兵参与现实军事斗争的主要途径,是发挥第二炮兵战略“重拳”作用的具体反映。

三、第二炮兵的建设发展

依据第二炮兵新时期的战略任务,结合核常导弹武器的自身特点,第二炮兵建设发展在总体上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协调发展

第二炮兵既装备核导弹武器,也装备常规导弹武器。理清核常之间的关系,实现核常协调发展,是第二炮兵建设发展的基本要求。

推进二炮核力量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核力量是第二炮兵的全部,第二炮兵就是战略核导弹部队。装备了常规导弹武器之后,核力量作为第二炮兵的根本和基础的地位,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第二炮兵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部队”的性质,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的地位,以及在捍卫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发展中发挥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的作用等,均与第二炮兵的核力量密切相关。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毛泽东作出关于“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就不可能有中国在国际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家安全形势。所以努力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固本强基,是第二炮兵建设发展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任务。

强化二炮常规力量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二炮兵常规导弹力量在现实军事斗争需求的牵引下快速发展,在捍卫国家主权

和安全的现实军事斗争实践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也是第二炮兵快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国内形势未来发展趋势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安全环境依然复杂,现实军事斗争形势仍然严峻,第二炮兵常规导弹实力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强化常规导弹力量建设,增强常规导弹部队实战能力,进一步发挥第二炮兵在现实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是第二炮兵建设发展的重点。

发展新型作战手段。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等,使太空、网络等领域的斗争、对抗越来越激烈,对军事能力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立足、依托导弹武器自身特点和优势,发展新型作战手段,将第二炮兵作战能力向太空等新领域拓展,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第二炮兵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 以提高核反击效能总揽二炮核力量建设发展

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的核力量运用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核反击作战是中国核力量实战运用的唯一样式,核反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中国核威慑的效能。所以,有效增加能够用于核反击的导弹武器数量,提高核反击实战效能,既是第二炮兵核力量建设的基本目标,也是具体筹划、决策核力量建设发展的原则依据,统领第二炮兵核力量的建设发展。

在中国核力量总体上保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提高第二炮兵核反击效能至关重要。一是增加洲际射程导弹武器比重。中国与主要战略对手、核反击对象的地理位置关系,决定了洲际射程导弹武器应该是二炮导弹核武器的主体。增加洲际射程导弹核武器的数量,是有效提高第二炮兵核反击效能的重要途径。二是突出核能力发展重点。在对方核袭击时有效保存自己,是实施核反击作战的前提和基础。能够有效突破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是造成敌方实际核毁伤效果的必要条件。所以,第二炮兵核力量能力建设应突出生存能力、突防能力等发展重点。通过发展、应用快速机动发射、滑翔、多弹头等技术,通过导弹武器的更新换代,从整体上提高导弹核武器的

生存能力、突防能力,增强核反击效能。三是加强配套建设。核反击作战环境复杂,限制条件多,整体性强。部队人员、武器装备、作战阵地、保障诸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对成功实施核反击有着重大影响。只有平时统筹兼顾,有重点地整体推进、配套发展,战时才可能实施有效的核反击作战,达到预定的核反击效果。

(三)重点发展常规导弹部队优势作战能力

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是对各种参战力量、作战能力选择、优化、整合的过程,要求各参战力量必须具备且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独有的或者占明显优势的军事能力。第二炮兵常规力量建设,应立足于常规导弹武器及其作战运用的特点,以充分发挥常规导弹武器作战优势为导向,切实提高和增强常规导弹力量独有的或者有明显优势的军事能力,以此带动第二炮兵常规力量的长期持续发展。

一是扩大常规导弹力量火力控制范围,重点发展和装备有效射程1500千米以上的常规导弹武器。二是提高常规导弹武器的突防性能,根据周边部分国家(地区)和主要战略对手加紧推进导弹防御能力建设的状况,保持第二炮兵常规导弹武器独特的突防优势。三是提高常规导弹快速反应能力。通过无依托快速发射,提高常规导弹打击的时效性,为导弹武器在不同战略方向上的使用创造条件。四是提高导弹武器精度。目前,导弹命中精度仍然是影响常规导弹实战运用范围、打击目标类型等的主要因素,因而提高导弹命中精度是常规导弹武器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四、第二炮兵的战略运用

第二炮兵的力量运用以国家核政策、核战略、军事战略为依据,力求有效发挥核、常导弹武器的优长。

集中统一指挥。导弹核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无论是威慑运用,还是实施核反击作战,对以战争为核心的军事斗争全局、进程和结局等,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所有重大核威慑行动,任何规模的核反击作战,无疑都属于重大战略行

动。第二炮兵核导弹部队作战使用的决策权,只能属于中央军委。威慑方式,核反击规模、时机、目标等与核威慑、核反击作战相关的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由中央军委决定。第二炮兵常规导弹力量虽然也用于实施战役级甚至战术级作战行动,但其行动的影响往往是全局性、战略性的。第二炮兵常规导弹力量实战运用的规模、时机等,也都由中央军委决策。

与其他手段配合。核反击威胁的可信性,是影响核威慑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核反击是在遭到敌方核袭击、国家整体处于特殊状态下的战略性行动。所以,在威胁进行核报复、核反击时,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也应配合行动,以显示我实施核反击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核报复威胁才可信,核威慑才有效。核反击作战时,第二炮兵核力量应与常规力量、海基核力量等密切配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核武器效能,达成战略目标。第二炮兵常规导弹力量在参加联合作战时,只有在打击目标、打击时机、打击持续时间、毁伤效果等方面,与其他军种参战力量密切协调,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常规导弹力量作战的优势,提升联合作战整体效果。

核力量重在威慑,后发制人。核武器具有令人难以承受的杀伤破坏效应,是典型的威慑性武器。能够实施有效核反击,是有效核威慑的基础。威慑运用是核力量运用的主要方式。第二炮兵提高核反击作战能力,扎实进行核反击作战准备,首要目的是慑止敌对国家对我使用核武器,增强核威慑效能。实施核反击作战是核威慑失败后的进一步行动。基于核武器的本质特性和威慑作用机理,一个国家只要掌握了核武器,具备基本的核反击能力,即使在平时,在不明确核威慑对象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所以,核力量的建设发展过程,往往就是核力量威慑运用的过程。中国从一开始就重视并注意发挥基于核武器存在本身的这种威慑作用。第二炮兵核力量的威慑运用,包含着或者说主要是核力量的平时建设与发展,是建设与威慑的有机统一。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核力量的实战运用中坚持后发制人,只有在遭到敌方核袭击时,才实施核报

复、核反击作战。防敌核突袭并在对方核袭击中生存下来,确实保有还手之力,是第二炮兵核实战的重要行动样式,也是遂行核反击作战的关键环节。

常规导弹力量用于精打要害。受常规导弹毁伤效能、导弹武器数量规模、常规导弹打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适于使用常规导弹打击的目标类型是有限的,二炮常规导弹力量能够打击的目标数量也是有限的,有些目标使用常规导弹来打是不经济的。所以,第二炮兵常规导弹部队主要用于关键方向、关键时机,用于打击要害目标。在联合作战中,常规导弹武器主要用于打击那些其他类型兵器打不到、打不了,但同时又对我军有重大威胁、对作战进程有重要影响、对战争全局起支撑作用的目标。如在联合火力突击时,使用第二炮兵常规导弹部队先期突击敌方的侦察预警系统、电子对抗系统、防空反导阵地、航空兵基地等目标,瘫痪敌方作战体系,压制敌方作战力量,为我军其他军种实施后续作战行动创造必要条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利用导弹的独特优势,使用导弹武器打击敌方军用卫星等空间网络、信息系统节点,在更大范围内影响敌方作战体系,震慑对手,为我争取战略主动、尽快达成战略目的创造条件。

第五节 战区战略

一、战区战略的性质与战区的职能

战区,亦称战略区,是指较大规模军团的作战空间,后来逐步演变为执行地域性或方向性作战任务的军事实体,成为一级军事指挥机构。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对战区的定义为:“战略区的简称,按战略任务划分的区域。”作为筹划和指导战略区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方针和策略,战区战略随着战争发展和战区演变逐步形成。现代战区战略,特别是世界大国的战区战略,已成为国家军事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区战略是依据国家军事战略意图,在各个战

略方向上经略区域军事安全,拓展和维护区域军事利益的方略。也可以理解为关于各个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战略。其性质:一是具体体现和服从服务于军事战略意图,与国家战略目的相一致;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体现不同战略方向的特殊性;三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地缘政治诸多因素,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四是具有指挥区域内诸军种联合作战功能,是筹划指导区域内诸军种联合军事行动的军事战略。

明确战区职能,是制定和实施战区战略的必要前提。战区战略要依据国家军事战略意图,在不同的战略方向上经略区域军事安全,拓展和维护存在于该区域的军事利益。因此,战区作为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指挥机构,其根本职能是经略区域军事安全,拓展和维护区域军事利益。战时,战区负责指挥协调区域内的作战行动。平时,战区负责经略和塑造周边环境。与之相适应,战区领导者必须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懂军事,而且要懂政治、外交;不仅要熟悉、了解国内情况,而且要了解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文、社情等情况。这样,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完成好战区所担负的各项战略任务,为战略全局的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制定战区战略的必要性

在我国军事战略体系中,各军种的战略和战区战略的范畴及相应内容有一个发展过程。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通常把主要的根据地和主要的战场作为战略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在不同战略方向上设置了大军区,担负国家军事战略赋予的主要任务。有的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军区,联合承担某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战略任务。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我军在战略指导上侧重于本土防御和准备实施内陆纵深防御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着力点是本土防御,军事战略的基本选择是诱敌深入,即通过把敌人放进来,经持久消耗作战转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最后实行反攻或进攻的大规模内陆纵深防御

作战,以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实施本土防御和大规模内陆纵深防御作战的特点,决定了各战略区在最高统帅部集中统一指挥下,根据本战略方向、本战略区情况,执行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计划,所担负的作战对象、作战目标和作战任务等也具有高度同一性。可以说,各战略区是全国统一大战场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各战略区根据军事战略的意图,把统一的战略方针、战略计划分解为本战略区、本战略方向的行动方针、行动计划,分头贯彻并完成,因而尚无单独制定一个战区战略的客观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重大战略判断,明确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要求。1992年以后,江泽民进一步作出大规模入侵基本可以排除的判断,提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和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这一时期,我国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准备应付大规模入侵转到准备应付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新的基点上来,这是国家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转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周边环境的复杂变化,决定了我军准备应付的局部战争复杂多样。一是军事对手多元,二是军事任务复杂,三是军事行动和作战方式多样。随之,边境、空中、沿海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凸显,边疆尤其是海洋方向的战略地位日趋上升,边海防卫由原先应对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的“信号灯”,逐步转变为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利益拓展的“前出依托”。客观形势的新变化表明,我国各个战略方向的现实军事斗争与未来作战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外向性,呈现“方向拓展”的特点与趋向。所以,战区战略在我国军事战略体系中需要有适当位置。应当看到,自从军事斗争的基点放在打赢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以后,就有了制定战区战略的现实需要。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的不断拓展,必将进一步呼唤我军战区战略的出台。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军事战略应当拓展视野,从守疆卫土转向在

更加广阔的地域空间捍卫国家利益的发展。这种转变,一方面使得国家军事安全的“分层性”特点更加突出,国家军事安全与战略方向(区域)军事安全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另一方面使得各战略方向的“方向拓展”特点更为突出,战略方向的军事行动依托边疆海防,影响境外,辐射公共空间。军事战略应用于不同的战略方向,要适应各个方向(区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故而应明确各个战区(方向)上的战略。

三、确立符合国家利益拓展的战区战略

战区战略虽然要体现各战略方向的特殊性,具有相对独特的内容,但作为军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贯彻军事战略的方针和原则。因而,各个战略方向所执行的战区战略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这就意味着在制定战区战略时,需要首先从军事战略高度运筹与解决战区战略的某些基本问题。

战区既是战争全局中的一个局部,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的整体。划分战区时,通常要考虑到能应对战争多样、复杂和变化的情况,在行政和经济上要有相对的完整性,在军事上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在国家战略的宏观指导下,在军事战略的统一部署下,充分发挥本战区的优势,独立遂行所担负的战略任务。战区在地理上要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作依托,在空间上应有一定的容量,并随着军事战略指导重心的前移而不断拓展。

制定战区战略必须依据国家生存利益和国家发展利益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要解决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好维护国家拓展利益的问题。一是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备和战胜外敌入侵为首要任务,而不以扩张领土和谋求对周边国家控制权或地区控制权为目的。二是贯彻控制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建立战区战略重心,适当前移军事安全线,有效控制周边局势,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三是从维护周边和平稳定的目标出发,树立攻防兼备的作战

思想,不仅要有效震慑和阻止强敌的军事介入,而且要有效震慑和阻止其在我国周边“玩火”。四是为我国经略周边和海洋提供战略支撑,做好为控制周边热点升温,维护海、陆战略通道和境外人员财产安全而实施境外军事行动的准备。五是做好用军事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准备,控制争端升级,为政治解决提供支撑。

战略方向是划分战略区的基本依据。应当从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上,从国家利益拓展的方向上,判明现实与潜在对手是谁,分析未来对谁作战、在哪里打仗、打什么仗。在明确了战略方向之后,战区划分问题便迎刃而解。战略空间是划分战区的必要条件。要综合考虑各种条件,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地区容量等。既考虑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及战略地位,又要考虑各战略方向的作战部署,力求在战略全局上构成完整的作战体系,使之既有利于各地区独立作战,又能增强与保持整个战局的稳定性。划分战区通常以大的山脉、江河、海峡为界。确定战区范围还应考虑相邻战区的地理条件和战略任务,使之有利于相互支援和协同作战。总之,战区的划分既有传统的继承性,又要根据形势条件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战略空间和布局

着眼现代战争和军事活动的空间特性,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空间需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统筹军事力量部署、战场体系建设等,进而形成有利的战略布局,是军事战略筹划指导的重要关注点。

第一节 战略空间的时代特性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全方位拓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战争威胁来自多维空间。战略空间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崭新命题,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命运。

战略空间是一个民族、国家抵御外部干扰、侵略,维护自身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区域,其外沿既取决于国家利益的拓展范围,更取决于军事能力所能投射的距离。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与外部力量的斗争以及内部的融合,逐步形成一个统一体,形成相对固定的地理边界。国家的战略空间,以本国领陆、领海、领空等主权管辖范围为基本,并依维护安全和发展需要而适当延伸辐射。国家领陆、领海、领空的自然延伸,必然有一部分区域与主权管辖的临近区域有直接的联系。国家在开发利用本国的领陆、领海、领空时,不能不受到相邻的陆地、海洋、空域的影响;邻国对陆地、海洋、空域的开发利用或在陆地、海洋、空域上进行军事活动,也势必影响到本国的安全与发展。

战略空间随着人类经济、科技、战争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拓展,在不同时代,战略空间有着不同的范畴和特性。正确认识战略空间的时代特性,是筹划战略布局的起点。概括地讲,当今时代战略空间具有以下特性:

立体多维,空前拓展。农业时代,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战略空间局限于陆地空间的范畴,海洋的资源供给和对外交通功能仅得到有限的开发和利用,更多情况下是为拱卫陆疆提供天然屏障。工业时代,随着航海技术和海洋文明的不断发展,战略空间逐步向海洋拓展;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战略空间又从二维平面空间扩展到三维立体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科技和人类空间开发利用活动的突飞猛进,太空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高边疆”和综合国力新的增长源,成为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新兴战略空间。从人类空间拓展的历史看,新空间相对于旧空间具有天然优势,“捷足者先登”,先到者先受益,时间差就意味着空间差,这已成为一种规律。因为在这些新兴空间还没有形成游戏规则,先入者就能占据有利位势,就能掌握规则制定权,主导该空间的未来,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进而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星球大战”的倡导者丹尼尔·奥·格雷厄姆说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①

有形空间与无形空间相互交织。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用于军事目的的阿帕网诞生以来,信息技术迅速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民用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国际互联网不断发展完善,众多国家竞相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人类文明加速步入信息网络时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重大新兴领域,成为人类生活、生产乃至战争高度依赖的第五维空间,正在历史性地塑造新的社会系统、力量结构、生活方式、价值

^① [美]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张健志、马俊才、傅家祯译,第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观念和战争形态。网络空间作为由信息网络及其所承载的信息构成的人造虚拟环境,横跨传统与非传统两大领域,涵盖现实与虚拟两种维度,引发物质与精神两界联动,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渗透性和融合性,与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全面深度交织,能够突破地理和时间因素制约,以光电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空前广泛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主权空间与全球公共空间高度关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超出传统的领陆、领海、领空范围,不断向海洋、太空、极地、网络等全球公共空间拓展延伸。而远程侦察预警指挥、远程快速投送兵力、远程精确打击的广泛应用,也使得维护主权空间安全必须具有在全球公共空间进行攻防对抗的军事能力。在各国主权空间已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竞相开发、利用和控制全球公共空间的时代。美国国防部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全球公共空间是国际体系的连接纽带,“全球安全和繁荣取决于空中和海上货物运输的自由,同样也取决于通过海底和空间的信息传输自由”,保持全球公共空间稳定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未来敌人将很可能拥有用于夺取或破坏制空权、制海权、制天权和制网权的能力。全球公共空间是人类共有的资产,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南极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外空条约》《月球协定》等国际性公约都确认,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一切区域及其资源,不论深海、外太空或南极,都属于世界各国所共有。开发、利用、保护好全球公共空间,防范对手从全球公共空间对本国主权空间发起攻击,越来越成为各国战略筹划的重要因素。

平衡性趋弱,不稳定性有所上升。战略空间的筹划和经略,与国家的战略利益、战略能力、地缘位置、战略文化、国际战略格局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战略空间的大小,是综合国力强弱的外在表现。只有建筑在综合国力基础上的战略空间,才是有效的、稳固的,才能使综合国力与战略空间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否则,战略空间

就是不稳定的。世界近代史上,殖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争夺承载资源和市场的战略空间,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战略空间呈现高度的流变、伸缩特性。冷战时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尽管在中间地带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反复拉锯争夺,但在双方力量达到基本平衡后,各自的战略空间保持了大体稳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北约东扩、美国进军中东,全球战略空间又经历了一次急剧改变。进入21世纪,除大中东地区战乱不已外,全球其他地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经略空间的方式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施策的间接控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全球战略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全球战略格局出现新变动,全球地缘战略竞争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世界特别是亚太范围内战略空间的不稳定性将有所上升。

第二节 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

战略空间是着眼维护国家安全和应对各种威胁,军事力量及其效能所能抵达乃至控制的空间范围。古今中外的军事实践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战略空间拓展史,拓展战略空间往往作为维护和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途径与手段。中国历代王朝总体上注重经略战略空间,在维护国家安全、奠定疆域版图、保持地区稳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应着眼维护国家和平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需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创造有利环境,夯实基础条件,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

一、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是战略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从国家和战争出现之后,人类社会战略空间的拓展总是随着战略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有时成为战略实践的根本性标志。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军事能力的不断增

强,依托本土拓展战略空间大体经历了平面拓展、立体拓展、从有形空间向无形空间拓展三个历史时期。

在地球物理表面平面拓展的时期。地球物理表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战略空间,也是相对容易开发、利用和控制的战略空间。从战争出现到 20 世纪前的漫长岁月里,由于受科技水平、军事能力的限制,战略空间拓展局限于地球表面的陆地和海洋,由此也演绎出侵略与反侵略、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波澜壮阔的人类社会演进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非洲的古埃及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还是东方的中国、匈奴、突厥、蒙古帝国,他们都曾围绕拓展国家利益,或扩大疆土幅员,或维持周边稳定等各种战略目的,主要围绕陆地(西方一些国家也围绕海洋)进行过战略空间的拓展。

由地球表面转向空中和太空的立体拓展时期。随着 20 世纪初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和力量的发展,空中和太空对人类生存、安全和发展日益产生重大影响,对战争胜负也产生关键性作用。世界主要国家都把谋求空中和太空的战略控制权,作为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这就促使战略空间拓展进入由平面拓展向立体拓展的新时期。主要军事强国都高度重视航空航天科技发展,不断加强军事航天力量建设。美国准备 2015 年组建天军,俄罗斯准备 2020 年组建天军,其他一些国家也加快军事航天技术发展和力量建设步伐,促使太空空间拓展向更高、更远、更深的宇宙空间推进。

从有形空间向无形空间拓展的时期。20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运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战争形态也迈进了信息化战争时代。信息网络空间不但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对未来的战争胜负也起到关键性作用。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信息网络空间夺控,把它作为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促使战略空间的拓展从可见的有形的地理空间向无形的信息网络空间演进。如何着眼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实现对信息网络空间的有

效掌控是我军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数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都较为注重在陆上周边地区寻求战略拓展空间。夏商周从黄河中下游流域逐渐向周围的夷、狄、戎、蛮地区拓展,秦在闽、越地区的拓展,汉、唐、清在西域地区的拓展,元在吐蕃等地区的拓展,明在西南地区的拓展等,都为捍卫国家利益、奠定疆土版块、维护藩属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积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立足国土防卫的战略需要,以我国大陆本土为战略支撑,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利益。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着眼维护国家和平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需要,采取国际维和、反海盗、战略预置等多种形式,积极拓展必要的战略空间,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拓展、促进世界和平、提升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不断变化,随着国家和平发展进程的加快,随着我军军事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在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方面将会有更高的战略需求。要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依托本土、稳定周边、掌控近海、进军太空、重视信息”的战略思路,将当前主要在本土和近海的战略空间,逐步向相关海区、太空空间、信息网络空间推进,形成以本土为依托、以两洋地区为重点、以太空和网络空间为关键,有重点、分梯次、相互支持与衔接的战略空间。

(一) 向两洋地区拓展

两洋地区主要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与其相邻的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南极洲等的濒海地区,总面积占全球的50%以上。其中两洋总面积为25460万平方千米,占全球海洋面积的71%。该地区是未来影响我国家战略发展和安全的关键区域,也是我进入大西洋地区、地中海地区和北冰洋地区的中间地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外向发展,外交、经贸、投资、资源能源、文化和媒体传播等领域的活动逐步走向全球,国家利益将极大地超出传统的领陆、领海和领空范围,而两洋地区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平台和媒介。今后,还将创造条件立足

两洋地区,参与大洋资源开采和空间利用,推进两极地区开发。挑战总是与利益相伴而生,国家利益拓展必然面临新的安全威胁。我国受到来自周边地区特别是海洋方向上的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之海上主权和权益频频受到侵犯,危机加剧很可能引发冲突与战争,需要形成强有力的两洋布局,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危机。因此,应着眼维护国家利益拓展,捍卫海上权益,依托本土,合理、适度地向两洋地区拓展战略空间。

(二) 向太空拓展

以地球为参照,太空可分为近地空间、远地空间、行星际空间及其他空间等。太空空间十分广阔,具有潜在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区域,是用以整合军事力量体系、应对强敌威胁、形成新型战略威慑能力的重要空间,也是今后国家发展和军事转型应始终抓住的新的战略制高点。随着太空军事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大力加强军事航天力量建设,不断拓展其部署空间,扩大其应用领域,强化其功能作用,加紧形成实战能力,一个范围更广、关系更复杂的太空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图谋制天权,妄图独霸太空,已经初步建立其太空布局。尽管我在太空空间上有所开拓,但无论是力度还是强度都还不够。今后,我国面临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将会日趋增大。应根据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围绕国家利益拓展和军事转型建设的战略需求,有计划分步骤地向近地空间、远地空间拓展。

(三) 向信息网络空间拓展

当前,信息化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达10%以上,今后这一比例可望继续提升。同时,我已成为信息入侵的主要国家,受到的网络袭击密度和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网络空间安全日趋严峻。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竭力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垃圾邮件、系统漏洞、网络窃取、虚假信息等,不断对我实施信息网络渗透和攻击。个别大国正加强其关键计算机网络和敏感信息的监控与保护,同时加

紧与盟国磋商和联合,以形成针对我国的网络进攻联盟,必要时将对我国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我尚未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如果对信息网络保护不力,就容易受到袭击,引发灾难性后果。我军应把防范与遏制可能的网络攻击作为重点,发展网络攻防新型力量,努力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二、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拓展战略空间的有力支撑,而战略空间的拓展又是增强与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条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要统筹规划,综合运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结合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本土适度拓展战略空间提供基本保证。应当把握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防御。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质的军事战略。这种质的规定性,要求未来的空间拓展必须用于防御目的,必须以维护和平为指向。未来战略空间的经营,应始终从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拓展、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出发,走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拓展之路。

依托本土。本土是国家战略空间拓展的可靠依托。中国拥有广袤的陆地国土和辽阔的海疆,拥有庞大的经济、科技、文化、资源等力量,并且蕴含着极大的发展潜能。本土依托越是紧密,战略空间拓展才能越有力。要在国家加快经济、科技、工业建设步伐的同时,着眼国家利益拓展的空间区域和方向,有针对性地加强军事建设、部署和预置,有规划、有步骤地实现战略空间的拓展。

加强协调。着眼推进战略空间拓展,有效强化各战略空间的联系。在战略空间拓展的准备与实施过程中,应高度重视陆、海、空、天、网空间活动的协调配合。加强各空间力量建设和发展规划方案的衔接,取长补短,通盘规划,力争实现优势互补。围绕拓展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强化对其他空间领域的服务和保障意识,以协调一致地行动。

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加强军事建设、推进前沿存在、搞好战略预置、促进军事合作等手段,维护好已有空间,逐步向新的战略空间拓展。积极推进前沿区域存在,包括显性前沿存在和隐性前沿存在,重点是面向海洋空间和太空空间。坚持军民结合推进战略预置,为拓展战略空间提供可行的途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展与周边国家以及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注重发挥国际法的作用,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为拓展战略空间服务。

分期落实。统筹规划拓展战略空间的方向、任务和措施,以当前重点应对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需求为抓手,以长远目标为牵引,区分轻重缓急,按照不同阶段,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实。

在依托本土逐步拓展战略空间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提高远程侦察、预警、指挥、打击、投送和保障的能力,发展先进新型的攻防手段和保障力量,为经营战略空间提供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深化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有关国家,以及东部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有关国家的合作,建立必要的海外补给点,以多种形式形成有限力量存在,维护战略通道安全,为经营战略空间创造条件。三是基于国家政策方针和国际法,加强海洋、太空、极地、网络等国际公共空间及其公共资源利用的相关法规研究,为经营战略空间提供法律保障。四是着眼未来在广阔范围内实施军事行动的需要,建立集中统一、灵敏高效、层次明晰、快速反应的新型联合指挥体系,为经营战略空间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第三节 优化战略布局

优化战略布局,是应对战争威胁、维护国家利益拓展,适应国土防御向前沿防卫转变的需要,对于营造战略态势、达成战略目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战略布局是为达成战略目的而对战略力量、资源等进行全局性

配置的活动,其目的是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战略布局在空间上有境内、境外之分,在时间上有当前、长远之分,在内容上有工业、农业、能源、战略资源、武装力量、后备力量之分,在领域上有陆、海、空、天、网络之分。军事方面的战略布局,是以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应对战争威胁为根本目的,着眼于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对军事力量、国防设施等所作的全局性部署。可以区分为防御性和进攻性战略布局,也可区分为国土型、区域型、全球型战略布局。好的战略布局便于发挥己方的整体威力和构成有利的战略态势,是保证战略行动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战略布局伴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不仅战略布局的区域越来越广,战略布局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战略布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战略实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略布局是战略实施的开始阶段,它依据战略指导而展开,为战略的全面实施创造条件,同时,也是战略指导的重要体现。如美国近两年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调整,就是依照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的,反映了美国要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战略意图。战略布局虽然是战略实施的开始阶段,重点是为尔后的战略实施创造条件,但它本身也是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战略布局的调整也是构成战略威慑的重要内容。美军2010年年底在关岛增加轰炸机和侦察机数量,2011年年初在日本冲绳临时性部署F-22型隐形战斗机,就是向东北亚地区的有关国家实施战略威慑的举动。

战略布局的核心是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争取战略主动。在战略实施中,战略布局的主要作用是塑造战略态势,为后续的战略行动创造条件。所谓战略态势,是指军事行动过程中,敌我双方在总体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和战略机动等方面形成的状态与形势。战略态势的优劣是发展变化的,可通过对关节点的控制,构成战略实力对比新的关系。如果己方的战略实力与威胁方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控制节点,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这种优势。如果己方的战略实力

与威胁方相比有一定差距,通过控制节点,则可以缩小和消除差距,甚至变不利为有利。

战略布局的关键是形成核心能力。战略布局对军事力量的分配与调动,不是一种简单的组合,而是围绕生成或增强具有领先性和差异化的核心能力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战略布局追求的是己方军事力量的充分发挥,以便改变劣势、形成优势。

战略布局的重点是通过军事力量的分配、调动,控制关节点。战略布局落实到具体的时空里,体现在现实的事态上。其实现方式,就是围绕战略目标,依据战略布局的总体筹划,对军事力量进行分配与调动,实现对相关区域的控制。能否有效控制关节点,是战略布局成败的关键。

世界各国筹划战略布局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因素:一是国家面临的威胁。主要针对面临的现实威胁,对受威胁的方向和强度展开战略布局,以阻止威胁方有效使用兵力或制约其威胁意图。二是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依据现有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筹划实施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己方军事力量的作用,形成与对手对抗所需要的战略行动能力。三是国家的地理因素。主要依据国家的地理位置、环境状况来筹划进行战略布局。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实现对战略要地的控制。通常,陆权国家的战略布局,所选择和控制的战略要地主要是陆地上的以及临近陆地的海上要地;海权国家的战略布局,所选择和控制的战略要地主要是海上以及临近海洋的陆地上的要地。各国的战略布局有其各自的特色,但都要综合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加以权衡确定。

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军事科技的进步和军队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筹划战略布局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强调战略布局的灵活性。应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威胁,战略布局需要有更强的灵活性,不仅能够应对确定的威胁,还要能够应对多样化、多元化的威胁。二是强调战略布局的立体性。空间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战略布局由陆、海平面向由陆、海、空、天、网络立体空间发展,争夺对太

空、网络的控制已经成为战略布局的重要着眼点。三是强调战略布局的整体性。军事力量布局要与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相协调,各个方向的战略布局、各个区域战略布局要构成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根据战略方针的调整,着眼安全威胁的变化,把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主要战略方向和重要战略方向。这种战略布局在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扼制可能的的外敌大规模入侵,保障国家军事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影响我军军事战略布局的主要因素,如安全威胁、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军事能力、战争形态、地缘条件和战略思想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形势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传统安全威胁出现的新动向,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影响上升,安全威胁联动性的增强,要求我们着眼新的安全形势,前瞻性地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提高应对主要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的能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提高应对连锁反应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二是国家利益正逐步超越国界,呈现多领域、全方位、大纵深拓展趋势,海洋利益、空间利益、信息利益、海外利益等在国家利益全局中的地位凸显,要求军事战略布局跟上国家利益拓展的步伐,既要把主要关注点放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又要高度重视国家发展特别是利益拓展带来的新需求,为国家和平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和保障。三是世界新军事变革不断发展,战争形态演变的速度加快。作战手段日益信息化、多元化,指挥控制日益网络化、智能化,打击行动日益远程化、精确化,全系统全要素整体对抗逐步成为现实,未来战争将进一步呈现大立体、非接触、体系对抗特点。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着眼现代战争特点,主动适应战争形态演变,改变传统的“陆战型”“近战型”“国土防御型”的力量布势,突出联合、远战、攻势思想,按照破击体系、夺控三权、联合制胜的要求,科学统筹侦察预警、指挥控制、作战力量、战场

设施和综合保障的建设与部署,进一步优化军事力量布局,以应对信息时代战争的现实威胁和长远挑战。

调整优化战略布局,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经济科技实力日益增强,交通运输、信息网络、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战略性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为进一步优化战略布局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强军目标,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我军战略能力建设步入跃升期,特别是一系列重大科技军事专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使武器装备信息化、远程化、机动化作战能力不断提高,为优化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强国强军目标,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合作的范围不断拓宽、项目不断增多、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空前扩大,为在更大的战略空间优化战略布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围绕打赢未来战争和支撑国家利益拓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应立足我国我军实际情况,推进“四个转变”,构建“功能多样、多维一体、内外结合、整体协调”的新型布局。

一是由注重安全向维护安全与支撑发展转变,形成“功能多样”的战略布局。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成为新时期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战略布局由注重安全向维护安全与支撑发展转变,建立功能多样的复合型战略布局。既要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又要能维护国家在海外、太空、网络等空间和领域的权益,支撑国家利益拓展;既要能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使国家和平发展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在平时,能形成战略威慑态势,使强敌不敢贸然与我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周边国家不敢漠视我国家利益和意志,“台独”分裂势力不敢突破我战略底线;发生危机时,能快速反应,有效控制事态恶化和蔓延,防止小乱酿成大乱、危机演变为冲突甚至战争。在战时,能迅速在作战地区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夺取和掌握战

略主动权,保证我军圆满完成遏制和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任务。

二是由以陆为主向大立体布局转变,形成“多维一体”的战略布局。未来战争交战空间大、涉及领域广、对抗体系化的特点和国家利益全方位、多领域、大范围拓展的形势,要求我们在军事战略指导上进一步改变“大陆军”的观念,将战略布局由地向天、由陆海空等有形空间向信息、网络等无形空间扩展,形成涵盖陆地、海洋、空中、太空、网络等空间的全方位、大立体、多领域力量布局。这种力量布局,一方面要呈立体网络化,实现多维一体。依托一体化信息系统,将各战区、各军兵种、各领域作战力量链接成一个互为支撑、相互增效,运转有序、整体优化的大系统,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实现火力、机动力、信息力、保障力等各种作战要素的充分融合,形成联合制陆、制海、制空、制天和制信息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弱梯次配置,尽力发挥我本土优势及其辐射效应。从内陆到周边、从近海到远海、从领空到外层空间,都要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梯次部署作战力量,使之既能在境内实施作战,又便于在境外遂行任务;既能维护国家安全,又便于保障国家利益拓展。

三是由本土防御向前沿防卫转变,形成“内外结合”的战略布局。在新形势下,我制衡强敌、慑控周边、反独促统,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需要突破国土防御的思维定式,适度向外拓展防御空间,构建前沿防卫、内外结合的战略布局。一要适度靠前部署作战力量。着眼应对战略对手“空海一体战”的威胁,着眼在周边更大空间范围特别是海洋方向维权维稳,着眼未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可能进行的大规模作战,将主要作战力量的部署由内陆地区适度向沿海沿边地区前移,将战略防卫的前沿逐步向外延伸。二要构建依托本土、辐射周边、走向两洋的海外战略支点,为海外军事行动提供支撑,或作为部署海外军事力量的前进基地,在相关地区发挥政治军事影响力,与本土战略布局形成内外兼顾、远近衔接、互为支撑的态势。

四是由条块分割向统分结合转变,形成“整体协调”的战略布

局。现代战争空间广阔、战场流动性大,我战略对手和作战对象多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复杂多变的特点,要求战略布局的筹划从区域筹划、条块筹划向整体筹划提升,统筹军兵种和战区建设,统筹战场体系、驻防力量建设与战略投送、战略预备队、战略预置建设的关 系,增强战略布局的整体性、协调性、灵活性,提高战略布局的整体效益。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各战略方向的社会地理条件和特定军事需求,明确其平时和战时的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细化责任区,进行针对性强的战场建设。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战略方向之间相互策应的要求,划定相应的功能辐射区,充分发挥部队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形成预先部署与临机部署相结合、固定部署与机动部署相结合、实兵部署与能力预置相结合的机动布势,使各战区、各战略方向和各军兵种能够相互配合,保持战略全局的相对平衡与稳定。

优化战略布局,涉及面广,非常复杂,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总结我军多年战略布局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优化我军战略布局应突出三个重点、坚持四条基本指导原则。三个重点:一是调整陆上各战略方向战略布局。着眼在更大范围营造维稳维权的战略态势,统筹陆上各战略方向战略布局,形成有较大战略纵深、相互依托、力量能够向外延伸的战略布局。二是完善海洋方向战略布局。统筹捍卫领海、维护海洋权益、遂行远洋机动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需要,优化海洋方向战略布局,形成有效支撑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的战略布局。三是构建太空方向战略布局。着眼未来空间防卫作战,建立集太空发射、测控、支援、防御和战略威慑于一体,高立体、大纵深、多层次的太空作战力量布局。四条基本指导原则:一是战略布局必须与国家经济布局相结合;二是战略布局必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三是战略布局必须战略驻屯、战略机动与战略预置相结合;四是战略布局必须多维布势、陆海兼备、内外一体、外向辐射。

第十二章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进入 21 世纪,我军现代化建设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为胜利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的强国强军目标,我们必须适应维护和平、保障发展和支撑国家利益拓展的时代要求,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着眼全面提升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战略能力,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贯彻能打仗、打胜仗的战略要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第一节 优化军事力量体系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发展,形成了以陆战力量为主,以海空力量为辅,以有限核力量为后盾的军事力量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机械化半机械化基础之上,整体上属于陆战型、近战型和国土防御型,面临着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基本矛盾。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拓展国家利益的新要求,遵循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与军队建设规律,加快信息化建设,推动战略转型,加强战略设计,优化体系结构,转变能力生成模式,提高战略能力。

一、突出联合、远战、多能战略功能导向

军事力量的体系结构决定军事力量的战略功能,调整优化军事

力量的体系结构必须以军事力量的战略需求为牵引。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和作战形式的发展趋势,按照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战略要求,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军事力量体系结构调整优化,需要突出“联合、远战、多能”的功能导向。

第一,更好地体现联合作战要求。未来信息化战争,是建立在各种作战要素、各种作战单元、各种作战力量综合集成基础上的体系和体系的对抗,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协同性联合作战正在向一体化联合作战发展。目前,我军在总体上还是以陆军为主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军兵种之间主要呈支援和协同关系,军兵种力量建设尚未突破机械化战争时代的传统模式的束缚。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需要按照聚合诸军兵种力量一体化使用、注重发挥整体作战效能的战略要求,遵循诸军兵种的作战空间从交叉走向融合的客观趋势,在保持军兵种基本架构的基础上,适度淡化军兵种界限,突出基于信息主导、综合集成、网络支撑的一体化特性,建立健全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保障的体制机制,在加强诸军兵种力量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诸军兵种之间以及各军兵种内部力量板块之间的横向联系,从体制、机制、法制和技术等维度推进诸军兵种力量的互联、互通、互动,逐步建立起基于信息系统的一体化力量体系。

第二,更好地体现立足本土遂行远战的要求。发展中远程精确作战力量,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的普遍选择,美军更是强调发展常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我军应在强化本土防御力量的基础上,根据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各自优长,发展具有远战特性的力量板块,重点拓展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远战功能,加快培植临近空间、太空、网络等领域能够超越地理障碍、直接威胁敌作战体系重心和关键节点、对敌造成战略震慑的新型作战力量板块,并将其有机融入整个力量体系之中,逐步建立陆、海、空、天、网多维一体的远战体系,不断提升中远程联合作战的综合能力,能够遂行境外作战包括远海防卫作战和有限太空、网络攻防作战任务。

第三,更好地体现完成多样化任务的多能要求。随着信息化水平

的发展和武器装备作战效能的提高,未来我诸军兵种应继续适度缩小数量规模,进一步提高机动灵活性。各军兵种内部力量编成注重模块化,为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创造条件,为不同军兵种部队实现快速重组、快速黏合、快速形成针对不同任务需求的联合作战力量奠定组织结构基础,确保既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多种空间、多种样式、多种强度的局部战争,又能遂行社会危机处置、国内外救援行动、境外军事维权、国际军事安全合作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综合考虑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特殊要求,按照军地结合、平战兼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军地两种资源,适度加强应急专业力量建设,使之成为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骨干力量,并有机融入现有力量体系结构之中。

二、把握空天、海上、核武、网络力量建设重点

世界各大国在巩固核力量战略基石地位的同时,竞相发展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作战力量,全力抢占 21 世纪国际军事竞争的战略高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军调整优化力量体系结构,既要遵循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建设规律,统筹协调发展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信息攻防、立体机动、全维防护、综合保障等力量要素,也要按照固强补弱的原则,把握好空天、海上、核武、网络等建设重点,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个力量体系的优化,使其结构更趋合理、功能更趋强大。

强空天。着眼抢占未来军事斗争战略制高点,捍卫我国空间安全以及确保我进出空间的自由,发挥军事航天系统在我军联合力量体系中的枢纽作用,加速太空和临近空间力量系统建设。近期应加快发展天基信息保障和支援系统,以天强陆、以天强海、以天强空、以天强核。远期着眼防范和遏制可能的空间军事对抗,发展可靠、管用的空间防卫作战力量体系,形成一定的空间战略预警能力和有限的综合制天能力。在加强防空反导力量的基础上,增大空中进攻力量比例,优化空中作战和支援力量比例,突出空中战略突击手段建设,形成以战役规模的空中突击力量为主体,以一定规模的空中远程打

击和投送力量为“拳头”，以初步具备实战能力的临近空间力量为高端的新型空中作战力量体系。

重海上。协调发展海洋方向的陆、海、空、天、网多维力量，逐步形成一体化的近海防御、远海防卫作战力量体系，着力把我国打造成地区性的海上力量强国，能够有效威慑和拒止强敌军事干预，能够有效满足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需要，能够有效控制近海态势，能在远洋遂行一定规模的多样化军事行动。

精核武。着力推进有限核力量的信息化，进一步优化核力量结构，强化核力量安全防护，增强核力量的快速反应、预警发射、体系突防能力，确保核威慑和核反击作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同时，搞好核常协调发展，加快常规导弹力量建设。

拓网络。着眼确保国家和军队网络安全，必要时遂行网络防卫作战，对敌网络系统实施软硬复合打击，加大整合发展网络战力量的力度，同步建设网络维护、网络进攻、网络防御三类部队，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网络作战手段，建立集侦、攻、防、控于一体的网络作战力量体系。

三、加强战略投送力量和战略预备队建设

我国幅员辽阔、疆界漫长、领土和海洋权益纷争长期悬而未决。随着国家利益不断拓展，战略空间不断扩大，涉外军事行动不断增加，过去“分区驻防、分兵把守”的模式已难以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兵多不胜养、兵少不足卫”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更加突出。因此，发展战略投送力量，加强战略预备队建设，使我军在国家陆地、海疆、空域及境外一定范围内具备大规模、多方向、高速度的应急反应能力，提高战略弹性，保持行动自由，不仅有利于打赢未来战争，而且有利于和平时期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从长远看，这对于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优化军事力量结构，推动军队转型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建设信息化主导下的多维战略投送力量。相对于日益多样

化的军事任务和日益扩大的军事行动空间,我军现有战略投送力量建设明显滞后,投送方式单一、投送手段有限、投送规模不足、投送保障落后,已成为制约部队快速机动、快速反应的“瓶颈”。要把发展战略投送力量作为全面提升我军机动能力的突破口,一方面依托快速发展的国家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立军民融合、军地一体的战略投送力量体系,另一方面加大军队自身战略运输力量建设的力度。适当发展大型军用运输机、军用直升机,大型综合运输舰、登陆舰和补给舰,逐步形成一支规模适度的陆运、水运、空运等多种投送方式相结合的战略投送“拳头”力量,建设信息成链、通信成网、保障精确可视、多元多向的立体投送力量体系。

高度重视建设精干、高效、合成的战略预备队。战争实践表明,在决定性的地点和决定性的时节使用战略预备队,是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的关键之举。当今时代,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在战略指导上突出首战,强调速战速决,但这并不等于战略预备队的地位和作用下降。相反,近期一系列局部战争表明,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可以速战但难以速决,战争进程仍然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战略预备队仍然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就要求我军在大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一线部队建设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战略预备队的建设,确保能够在未来局部战争的关键时刻投入使用,起到压倒对手、控制战局、转化态势、扩大战果、赢得胜利的重要作用。此外,军队平时承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具有爆发突然、蔓延迅速、涉及面广、联动性强、后续影响大的突出特点,往往出现一个方向多种事态并发或多方向同时有事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某一方向的基本力量往往难以单独应付,需要跨战区及时投入足够管用的增援部队。从近些年我军一系列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看,战略预备队作为战略性的机动兵力,是遂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中坚力量,能够在第一时间投入使用,并迅速控制事态发展。加强战略预备队建设,不仅有利于战时应战,也有利于平时应急,既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本需求,也是遂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

要保证。因此,我军应把战略预备队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推动战略预备队从机械化时代的“大而重”向信息化时代的“灵而轻”转型,走轻型化、模块化和联合运用的发展道路,努力建成“常备应急、快速反应、全域机动、突击控局、多种能力”的新型精锐力量,全面提升其信息化条件下的立体快速投送、立体火力打击和立体突击作战的综合能力,并将其部署于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以随时执行各个方向的支援作战和临时赋予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

四、建立高效的信息化支援保障体系

支援保障体系是军队为遂行任务而建立的各种保障性力量与设施构成的有机整体,是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高效的支援保障体系,是有效完成各项保障任务的基本前提。信息化条件下,无论作战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对支援保障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在需求牵引下,支援保障手段日趋多样,专业分工更为精细,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体系化特征进一步凸显。把支援保障力量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统筹推进作战力量和支援保障力量建设,成为确保能打仗、打胜仗的内在要求。我军应紧紧围绕提升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坚持以信息化为基本方向,加快建立高效的信息化支援保障体系。

信息化作战保障体系。首先是作战保障体系,这是军队为遂行作战任务而建立的各种专业保障力量构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情报、通信、电子(信息)对抗、核生化防护、伪装、军事气象(水文)、军事测绘、空中(战场)管制等要素。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已经成为基本作战样式,进一步加强信息化作战保障力量建设,形成功能完备、综合集成、全域保障的信息化作战保障力量体系,是提高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环节。一是加强作战保障指挥信息系统建设。不断运用先进信息采集、传输、分析手段,进行作战保障指挥信息系统的升级与改造,完善连接各个作战指挥保障要素的一体化作战保障指挥平台,实现无缝链接,

确保各种作战保障数据信息及时准确传输与高效处理使用,进一步提高军队一体化作战保障能力。二是提升各保障要素的信息化水平。作战保障力量专业类别多,保障领域涉及陆、海、空、天、网、电多维空间,要对体系作战形成有力支撑,必须加强各要素自身信息化建设水平,通过采用先进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各要素完成专业保障任务的效能。三是加强新型作战保障力量建设。适应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作战手段的革新,紧密结合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发展,在不断健全传统作战保障力量建设的基础上,建立新型作战保障力量,重点建设网络作战保障、太空作战保障、远海作战保障等力量,确保作战保障力量具备全维全域保障能力。

信息化后勤支援保障体系。后勤支援保障体系在现代战争中十分重要,它是军队为顺利遂行任务而建立的各种后勤专业保障力量构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财务、物资油料、卫生勤务、运输和后勤工程等保障力量。着眼提高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后勤保障能力,根据军队后勤现实状况,统筹各方面后勤保障力量与资源,建立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信息融合、精干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及时准确地保障军队作战和建设需求,是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基本要求。一是加强后勤保障一体化指挥建设。着眼军队进行军事斗争准备以及遂行战略任务后勤保障需要,注重采用各种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加强后勤保障一体化指挥建设,建立纵向贯穿各层级、横向联通诸军兵种的后勤保障一体化指挥平台,实现后勤指挥机构与各要素信息系统的无缝链接;坚持平战结合原则,改变按行政业务分工编组的传统做法,突出指挥编成、职能区分和信息流程的优化精简,构建联合、模块、互通的扁平状信息系统。二是构建完备的后勤基地网。以战略后方基地为依托,结合各军兵种战略任务与部署,进一步完善各军兵种后勤基地建设,形成完备的后勤基地网络,采取逐级支援与越级支援相结合的方式,对战区和主要战略集团实施基地化后勤支援保障。三是完善后勤支援保障力量建设。按照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针对军队遂行战略任务需求,充分运用军队专业后勤保障力量,视情

动员并组织地方后勤保障力量,建立精干、高效的后勤专业保障力量、后勤预备力量以及其他机动保障力量,为军队遂行战略任务实施不间断、全过程后勤支援保障。

信息化装备支援保障体系。装备支援保障体系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中不可或缺,它是军队为顺利遂行任务而建立的各种装备保障力量构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装备调配、维修、改装、技术保障等力量。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是集中精锐武器装备实施的多维空间一体化联合作战,作战节奏快、强度高,武器装备消耗大、损毁多,必然要求建立健全信息化装备支援保障体系,及时高效完成装备保障任务。一是加强装备支援保障信息系统建设。着眼提高军队平时与战时装备管理、使用、维修的效能,以国家和军队信息网为依托,综合采用现代通信技术、军事物联网技术,进一步加强装备一体化指挥平台建设,实现多渠道装备保障态势感知,准确获取、处理、分析装备保障信息,为装备指挥机构及时和正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实现装备保障一体化、精确化。二是构建科学完备的装备保障力量。着眼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性能特点,适应信息化战争装备保障要求,坚持系统集成、结构优化、效能跃升的原则,合理调整军队装备保障力量结构,形成通用保障与诸军兵种专用保障相结合的装备保障模式;加强军民融合保障机制建设,在注重提升军队自身装备保障能力的同时,通过采取与地方军工企业签订装备保障协议、制定保障章程等措施,建立健全平时或重大军事行动中军民联合应急保障机制,提升装备综合支援保障能力。三是加强装备保障战略投送能力建设。综合运用陆地、海洋、空中投送手段,建立军民融合、功能互补、适应性强的装备保障战略投送力量,采用战略预置、计划投送、应急投送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强大的装备保障战略投送能力。

第二节 发展军事战略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关键在于提升国家军事战略

能力,确保能够预防和应对各种重大威胁、危机和战争,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当前需要发展的军事战略能力主要有:

一、战略指挥与管理能力

战略指挥与管理能力,是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战争及其他军事行动进行谋划、决策、调控的能力,具有统揽全局、宏观运作、综合调控的特点,体现战略能力运用艺术与科学的辩证统一。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能力:

战略情报获取、整合与判断能力,是对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和威胁因素的预先发现、准确告知和实时掌控的能力,包括战略情报获取能力、战略情报整合能力、战略情报判断能力,是战略谋划、决策和调控的依据。战略情报获取能力,按获取手段分为人工情报获取能力和技术情报获取能力,按搜集部门分为政府情报获取能力和军队情报获取能力。战略情报整合能力,是对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获取的战略情报进行汇总处理的能力,要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权威情报整合与研判评估中心,实现情报系统合作协调、综合处理、情报共享。战略情报判断能力,是对经过整合的战略情报进行分析比较,给出判断结论的能力。

战略咨询能力,是战略咨询机构与专家辅助党和国家进行重大决策的能力。现代条件下,影响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不断增多,综合性和前瞻性增强,决策难度不断增大,需要不断提高战略决策咨询支持能力,充分发挥战略咨询机构和专家的决策咨询作用。

战略决策能力,是处置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重大事件的战略决断能力。战略决策是党和国家战略指挥层的主要职能,并与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体制密切相关。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基本特点规律、全面掌握国防和军队建设情况,以及对武装力量高效指挥、对危机管理资源有效掌控的基础之上,做到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准确把握战略方向,紧紧抓住战略枢纽,牢牢掌握战略主动。

战略调控能力,是在组织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应对国家安全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围绕既定战略目标与决心,实时掌握战略态势变化,科学组织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的能力。需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指挥机制,包括权威的协调指挥机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处理重大问题时能对党、政、军各职能部门的力量进行全面协调和有力控制。

二、军事力量联合作战能力

军事力量遂行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联合作战能力,是军事力量执行国家意志、履行使命任务的总体战斗力,是国家军事能力的核心。着眼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威胁,提升联合作战能力主要应着力于以下六个方面:

情报获取能力,是为满足作战需要,进行信息搜集、分析处理与传达利用的能力。鉴于我国军事力量遂行使命任务的实际需要,未来一个时期技术侦察预警范围应覆盖全境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等地区。在战场态势感知方面,能对主要作战对象形成相对优势,并能掌握主要战略对手可能针对我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行动情况。

指挥控制能力,是对所属军兵种作战力量,在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的行动实施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能力。未来我军要形成高效、稳定的指挥控制体系,具备对各战略方向和第二岛链海区内的联合作战、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海上巡弋防卫作战进行有效指挥控制的能力,以及对战略武器系统实施可靠指挥控制的能力。

快速机动能力,是为夺取和保持主动或形成有利态势而有组织地迅速转移兵力的能力。主要包括战略投送能力和战场机动能力。从未来我武装力量可能担负的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看,我应具备向东南沿海方向、西南方向、第一岛链内的重要地(海)域投送武装力量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逐步具备向非洲、中亚、中东、拉美等我进口石油产地投送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武装力量的能力。

综合打击能力,是依靠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支持,使用陆上、海

上、空中、太空武器平台乃至新概念武器,以中远程精确火力毁伤为主要方式,以电子进攻和网络攻击为重要手段,全天候打击预定目标的能力。我精确火力打击手段,应能突破敌各种防御系统,对其陆上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实施有效毁伤,近期内有效覆盖第一、第二岛链,并逐步扩展,中远期应覆盖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部分地区。

多维防护能力,是有效抵御敌在陆、海、空、天、网多维空间对我实施杀伤、破坏以及各种恶劣自然条件侵害的能力。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要求我在提高对敌核生化武器防护能力的同时,着力强化对敌多维侦察监视、精确打击、信息进攻的防护能力。未来我军综合防护能力建设的目标,是确保在各种战场环境中和不良自然条件下有效遂行作战任务,特别是能为对强敌作战时“看得见、联得上、打得准”提供有效保障。

整体保障能力,是基于网络化、数字化保障体系,对诸军种在境内外遂行联合作战及其他军事行动统一实施作战保障、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的能力。主要包括:能在复杂电磁环境和恶劣自然条件下,提供实时、准确、可靠的情报、通信、测绘、工程等作战保障的能力;为高强度、大消耗的联合作战提供持续的后勤、装备保障的能力。未来我军军事行动可能在远离战略腹地的边境地区或远离大陆的海洋岛屿展开,也可能在境外实施,要求我能在各战略方向、针对不同作战对象,有效保障各种样式与规模的联合作战,特别是能为对台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提供远程、快速、精确、持续的整体保障。

三、国家对军事行动的支撑能力

国防动员是联系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军事实力提升的纽带和桥梁,国防科技与工业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动员与国防科技工业能力是国家军事能力的基本组成要素。适应新的战略形势和战略任务,应当协调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能力。

快速高效的国防动员能力,是国家在平时调动人力、物力、财力、

科技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临战和战时将军事潜力转化成军事实力的能力。我国的国防动员能力,应能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需要,确保必要时能在主要战略方向快速遂行局部战争任务,以及能有效支持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国防动员能力紧密关联的是国家战略储备能力。战略储备水平应能支持实施一场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并能有效应对可能面临的持续军事、经济封锁。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国防动员体制,建立健全国防动员的法规制度,确保国家潜力与国防实力的转换。

国防工业生产能力,是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及其他军用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行动需要的能力。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主要表现为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生产的种类、产量、质量以及持续能力。我国国防工业应能在二三十年内实现跨越发展,逐步形成大型机、精确制导武器、大型水面舰艇等主要武器装备及保障装备的体系化、规模化自主生产能力,所生产的武器装备不仅技术战术性能先进,而且质量可靠,并具有较好的经济可承受性。

第三节 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基本着眼点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根本要求是以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将适应机械化技术特征、体现机械化战争制胜机理的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为适应信息化技术特征、体现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实现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的跨越发展。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要把握好“信息主导、科技推动、改革牵引、融合发展”几个环节。

一、信息主导

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基础,是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方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

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内涵及其生成方式。战斗力的增长方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由机械化时代增加兵力兵器数量规模的扩张式增长,转变为依靠信息网络融合各类作战要素、作战单元的聚能式增长。在交战双方体系对抗中,信息流调控物质流和能量流,信息链支撑指挥链和打击链,夺控制信息权成为掌握战场综合制权的前提和基础,网电一体的信息作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作战样式,通过新的杀伤机理发挥着传统作战样式无可比拟的作用。作战制胜不再单纯取决于投入作战资源的数量,而演变为夺取和建立信息优势,进而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最终取得战争胜势。

信息要素作为战斗力倍增器的功能空前凸显,战争制胜机理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必须遵循信息化条件下军事建设的一般规律,同时立足我军机械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信息化建设紧迫任务的客观实际,走以信息化为主导,以机械化为基础,信息化和机械化复合发展的路子,以信息力的发展,带动火力、突击力、机动力和防护力的整体跃升。围绕融合态势感知、指挥控制、软硬打击、多维防护、综合保障等系统,着眼体系内信息纵向和横向无缝链接与顺畅高效流动,以综合集成为基本途径,自上而下整体设计与自下而上逐级集成相结合,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打牢综合电子信息系统建设这个基础,突出数据链和技术标准化建设,逐步完善信息网络栅格,为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抓住态势感知系统和指控控制系统两个关键进行重点建设,以求在广大战略空间内实现全域多维的精确感知和精确指控,进而实现精确打击和精确保障。

二、科技推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基础。在世界新军事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进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基本的着眼点就是把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信息

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进步上来,自主创新,跨越发展,为未来军事力量体系培植新的高精尖力量增长点。

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基石,是军事战略能力实现跨越发展的前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特色力量体系,提升军事战略能力,不是光靠有决心和加大投入就能自然取得的,没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没有强大的国防科技竞争能力,也就难以为力量体系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拓展提供物质技术支撑。我国“两弹一星”就是在遭到国际科技封锁的情况下依靠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实现了力量体系由常到核、由地向天的重大跃升,也极大地提升了我大国地位。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在高科技特别是军事高科技领域仍将遭受一定程度的国际封锁。为缩小我国军事力量体系与世界强国军事力量体系的整体水平差距,就必须突出原始创新,强化集成创新,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力争在一些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选取对我军事力量体系转型发展和军事战略能力提升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进行重点攻关,加大对空间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动力与传动技术、材料技术、网络技术、隐身与反隐身技术、高超声速技术、先进核武器技术的攻关力度和科研投入,争取尽早取得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并视情加快实战化进程,加快融入原有军事力量体系,早日形成实战能力。同时,要站在未来战略制高点上积极探索发展新领域、新概念、新机理技术,开展国防科技的战略预置,力争与世界军事强国整体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力争在某些领域实现敌无我有、敌有我优,为我国未来军事力量体系建设提供新的战略性技术牵引,开辟新的技术发展途径,也为未来克敌制胜提供切实管用的战略手段。

三、改革牵引

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进,强力牵引着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要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深入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要把推进军队改革上升到国家

意志的高度,要把军队改革融入到国家改革的整体进程之中。经济社会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军队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要通过调整军队组织形态,解放战斗力,发展战斗力,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是革故鼎新的辩证统一,需要通过改革来清除阻碍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重大矛盾和“瓶颈”问题。

在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和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世界新军事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世界主要国家着眼信息化条件下新质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积极推进军队信息化转型,加紧重塑军队组织形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军先后在解决数量规模过大和武器装备技术水平落后两个突出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制约我军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一些制度性、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需要将改革的重心,由原来调整压缩数量规模转向调整优化体制结构,以实现强军目标为牵引,围绕军队建设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战斗生成模式转变这个主线,以建立健全战略管理和联合指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为突破口,开展系统的制度创新,理顺关系,调整职能,优化结构,力争早日建立适应信息化战争联合作战要求的军队组织形态。深化改革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向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聚焦,向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要求聚焦,把是否有利于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否有利于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作为根本依据。

四、融合发展

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以军队为国家军事力量主体,以国家经济社会对国防和军队的支撑为根基。军队战斗力的高低,以及战斗力生成的效益,既取决于军队自身的数量和质量,也取决于军队与国家经济社会整体的融合度。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军事力量体

系,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提高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需要按照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总体部署,加快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融合式发展。要着眼实现国家经济实力 and 国防实力同步发展、协调增长,把军民融合由主要集中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拓展到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由行业、部门层次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使得社会经济与国防经济、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民用人才与军用人才的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信息化战争中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联日益紧密,总体战的特性更加显著,呈现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纷纷加大军民结合的力度,从政策和法规上不断推进军民两种资源的一体化和相互转化。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强调战争之最深厚的伟力来源于广大军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始终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产业布局的深刻调整,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发展,军队与国家、军队与地方、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军民结合、寓军于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努力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计划,把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之中,使军队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保持一致。结合新的世情、国情和军情,着力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逐步形成在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更好地依托和利用不断发展的国家经济社会资源,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全面提升信息化战斗力提供强大支持。

军队应充分发挥军事需求主导作用,更加主动地将国防和军队

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更加注重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军事需求,把经济布局调整与国防布局完善结合起来。要抓住影响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和法规建设,逐步形成上下衔接、完善配套、操作性强的规划计划体系。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有利于集中统筹的领导决策、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经费管理机制。要完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政府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等政策制度。要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提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质量。坚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巩固和发展军民团结,奠定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强大基础。

主要参考书目

-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摘.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3
- 2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选读.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
- 3 毛泽东军事文集.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 5 邓小平军事文集.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6 江泽民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 8 粟裕文选.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 9 李际均. 新版军事战略思维.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12
- 10 糜振玉. 中国军事学术史.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8
- 11 军事科学院. 战略学.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 12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战略学.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 13 吴九龙. 孙子校释.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 14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 15 钮先钟. 战略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16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中国古代经典战争战例.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2

-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6卷).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 18 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 19 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革发展30年.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 20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军事科学院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 21 若米尼. 战争艺术. 钮先钟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22 利德尔·哈特. 战略论.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23 索科洛夫斯基. 军事战略. 北京:战士出版社,1980
- 24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 军事战略.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
- 25 阿彻·琼斯. 西方战争艺术. 刘克俭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 26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战略瘫痪论.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 27 詹姆斯·多尔蒂等.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 阎学通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28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第二版). 严春松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后 记

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格局进入深度调整,世界新军事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战争形态加快向信息化战争形态演进。中国紧紧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党和人民赋予军队新的历史使命,要求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强国强军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在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军队职能使命的历史性拓展,面对军事斗争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我们迫切需要创新发展富有时代气息、体现中国特色、指导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理论。

2010年军事科学院决定立项开展新版《战略学》的研究和编写工作。2011年,这项课题又被列为全军军事理论重点课题,由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现称“军事战略研究部”)承研,部长寿晓松担任课题组长、主编,吸收院内外十多位专家和学术部研究人员展开研究和撰稿工作。经过两年来的提纲研讨、专题研究和初稿撰写,于2012年2月形成了个人修改稿。寿晓松于6月和8月两次进行统稿,最终完成了全书送审稿,并于2012年10月分送专家征求意见。经院科研指导部批准,于2012年12月14日召开评审会,通过了专家评审鉴定。会后,寿晓松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再次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在第一章增加了战略学的涵义、研究对象、理论构成、主要任务等内容;在第十一章增写了战略保障建设的有关内容;对专家们

提出还需要适当加强的一些内容,如战略预置、动员、机动、数字化部队等,分别在第十、十一、十二章中作了进一步强调。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又充实了有关内容,使这部书稿的基本指导思想、主题主线更加明晰,全书质量进一步提高。2013年4月,刘成军院长、孙思敬政委批准《战略学》结题并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军事科学院领导和机关的关怀支持。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何雷、军事战略研究部部长赵丕、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部长张世平、《战略研究》原主编邓晓宝以及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主任范震江、教授马保安,参加了本书的评审鉴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战争无常势,战略有创新。战略研究永无止境,永难穷尽。当前在战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以一斑而窥全豹,难免有局限有疏误,立论是否精当,也有待实践的检验。真诚希望能在战争战略领域的研究探索和军事改革的大潮中,给人们燃起一点思维的火花,也衷心期盼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战略学》编写组

2013年10月

责任编辑：孙兆利

封面设计：倪春昊